



亚 | 洲 | 道 | 路

上海论坛2014嘉宾采访录

——谨以此献给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



www.shanghaiforum.org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在 上海论坛 2014 上，我们招募了 30 位左右优秀的复旦学生担任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采访。他们用专业、投入和自信记录下这些智慧之声。这本采访录，就是他们与嘉宾交流观点、汇集智慧的结晶。」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诚挚地感谢每一位莅会嘉宾和每一名学生记者。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与更多关心亚洲发展的同仁们，共享思想与智慧的力量。」

2014 上海论坛记者团名录

姓名	专业
陈依佳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陈旂雪	新闻学院
陈宇婷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程若茜	中国语言文学系
程彤辉	新闻学院
段伊戈	经济学院
关赫楠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Ik-soo Yoo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金忆茗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Johan Gade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4 上海论坛记者团名录

姓名	专业
Laura Natrop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梦馨	新闻学院
李想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梁丹怡	经济学院
刘璐茜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书文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马妍娇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潘瑞	经济学院
沈大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施晓蕾	新闻学院
隋译娴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孙丽	公共卫生学院
孙亮宇	新闻学院
王彦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震宇	新闻学院
魏晓岑	经济学院
相惠莲	新闻学院
谢馥梵	历史学系
谢光钰	历史学系
徐倩宇	新闻学院
许可	新闻学院
薛姣	经济学院
姚毅	经济学院

目 录

智者对话

- | | | |
|-----|--------------------------------------|--------------------------|
| 001 | Robert J. Shiller
- 张军 | 关于“泡沫”的争论与世界经济中的泡沫 |
| 007 | Michael Grubb
- 吴力波 | 寻找低碳发展的新动力 |
| 013 | Graham Mather
- 尹翔硕 | 从全球视角看上海自由贸易区：我们需要想象力与耐心 |
| 020 | 沙祖康
- 吴心伯 | 亚太形势和中国的亚太政策 |
| 027 | Yves Mersch
- 许闲 | 人民币国际化：迈向更优的资本配置 |
| 031 |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 丁纯 | 信心和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

高端访谈

- | | | |
|-----|------------------------|---------------------|
| 039 | Barry Naughton | 中国应迎接风险大胆改革 |
| 044 | 陈振光 | 上海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需关注软实力 |
| 048 | Christopher K. Johnson | 互动解密：形成过程中的中美关系 |
| 053 | Dan Greenbaum | 保持人们对环保的关注 |
| 058 | 段茂盛 | 中国碳市场设计与实践 |
| 062 | Gavin Willis Jones | 中国应取消对生育的所有限制 |
| 067 | 贺力平 | 政府要更多地做“裁判”，而非“运动员” |
| 071 | Hugh White | 亚洲协调构想——西太平洋新前景 |

077	James Markusen	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不确切的名称
081	李炜	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
086	梁卓伟	寻找应对全民健康挑战的制衡点
089	吕建中	中国很难简单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094	孟庆跃	医保制度成本应该让老百姓负担得起
098	潘家华	根据国情做出的减排承诺才有意义
103	Peter Daniels	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108	邱丽萍	上海与香港，有竞争才有进步
112	唐国强	亚太经济合作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116	Wei-Jun Jean Yeung	中国应该为所有青年提供免费或者低成本中学教育
123	吴明泽	中国政府应该放权，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127	谢湧海	与狼共舞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131	杨宜勇	中国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
135	张车伟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
139	中兼和津次	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
144	周其仁	不要越俎代庖的城镇化

关于“泡沫”的争论与世界经济中的泡沫

编辑整理：Johan Gade，魏晓岑



Robert J. Shiller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座教授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采访人：**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认为泡沫就是非理性的投资者主导市场，并且价格升得过高。我喜欢把它称为一种社会潮流，就像我们在其他领域中看到的潮流一样，比如服装界。」

张军：去年您和尤金·法玛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您是泡沫理论的创造者而法玛则认为金融市场中不存在“泡沫”的概念，您认为诺奖为何会授予你们两位观点相互抵触的经济学家呢？这意味着什么？当你得知你和法玛同时得奖有没有感到吃惊？

Robert J. Shiller：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评奖的时候我并不在场。但他们曾经这样做过。197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两个观点相

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缪达尔。哈耶克的思想与法玛有点相似，他甚至比法玛更极端——强调自由市场。而缪达尔更强调人民福祉，他认为让贫困人民继续受苦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从道义上讲我们必须将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我认为委员会的想法是，这种争论本身就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我们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答案。

短时间内没有人能回答自由市场假说到底成不成立的问题，但听到人们讨论这一问题总是好的。委员会为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提供在斯德哥尔摩免费待上一周的机会，并且可以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

在这一周中，我和法玛有了很多聊天的机会。在我们一对一谈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隔阂。我们都同意股票市场是可预测的，尤其是长期的走势而不是明天股票市场会怎么样。只是我们两个对这一点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看法。他并不喜欢“泡沫”这个词，而我创造了“泡沫”的另一种定义。“泡沫”这个词是在1720年之后才开始明显流行起来。当时欧洲的国际股票市场出现了巨大震动。没有人知道“泡沫”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它就那样流行起来。

我们认为泡沫就是非理性的投资者主导市场，并且价格升得过高。我喜欢把它称为一种社会潮流，就像我们在其他领域中看到的潮流一样，比如服装界。例如，在1960年左右人们都开始穿蓝色的裤子，并且它一定得是蓝的！人们跟随社会潮流，这是一种人类的本性。在股市的泡沫中，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都会去买股票。他们给你一些听起来合理的理由，经常是一些新的故事，但你要意识到，这些故事通常是应股市的发展而编造出来的，而非有根据的故事。而给股票估值需要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但一般人不会这样做。这些投资者相信一些经常可以听到的观点，然后就对其做出反应。

张军：有效市场假说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基础。对这一点您怎样反驳？

Robert J. Shiller：法玛因为创造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个术语而出名。所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尽管它并非100%正确，但它仍然很重要。法玛是发现市场中的泡沫的专家，但他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方法。法玛认为他的成功并不能说明市场是无效的，只是他考虑了风险因素，一直以来人们仍然是完全理性的。这与他的行动不相符，我

们必须让他解释这件事。在我看来，按照法玛的理论，市场的确是可以预测的，只是这种可预测性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人们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法玛便针对这个向投资者提供特殊服务。顺便说一句，其实我很欣赏尤金·法玛，就像欣赏不同政治阵营的对手一样。我会认真读他的研究，因为他在做研究方面很聪明。

张军： 那他对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Robert J. Shiller： 法玛曾经写过一篇行为金融学的综述。而我在近25年来一直在积极推动行为金融、心理金融学的发展。他告诉我他对于自己在行为金融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很骄傲，因为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提交上来的行为金融学的文章——事实上，他曾经做过其中很多篇的推荐人。而他被引用得最多的论文也是这篇关于行为金融的综述。他并没有将行为金融学驱赶出理论界的意思。他对我温暖态度与我对他的一样。

张军： 我记得你曾经在环球金融杂志（Global Finance）上面写过一期专栏，我也碰巧是这一杂志的专栏作家。我记得你那时候的题目是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科学？

Robert J. Shiller： 哦对，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将真正的人员与普罗大众加以辨别，就像医学一样。有很多人都声称他们可以治病，他们声称自己有神奇的法术或者能力，我知道中国也有很多民间偏方，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些东西，但可能这并不都是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58年被设立，奖项被命名为“经济科学”，但现在很多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并不是科学家，很多人考虑了政治因素。然而现在经济学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人走得太远了，以至于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是伪科学。有些人只是写下毫无意义的复杂数学方程式，就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很多人建立的是无法被实证检验的理论。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是真正的科学还是伪科学。很多人会抱怨说诺贝尔奖不应该设立经济学奖，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但我认为这不对，经济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应该严肃追求的学科。因为它在研究中包含了人的参与。经济世界很复杂，有很多种搜集证据的方式。有一个问题就是人

们对证据有所选择，他们趋向去忽略那些很明显的、无法被科学方法证明的事实。这也是导致金融危机中的泡沫形成的一部分原因。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如此有权威性，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投资者可能过度兴奋或者过分推高了价格。通过与人们聊天、听他们的回答得来的证据不被关注，因为它们不是科学的。我喜欢和人们聊天，比如出租车司机。

张军：我记得你前段时间去了哥伦比亚，并且在那里与出租车司机探讨房价问题对么？

Robert J. Shiller：我问出租车司机，你们知道房价问题么？他们告诉我，现在的情况简直太疯狂了。我去迈阿密，与那里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他们认为将来的结果将会非常糟糕，他们建造的房子多过需求。然后我回到佛罗里达，发现那些人仍然在办公室里写公式，没有人对于房价问题发表看法。这让我怎样把那些出租车司机的想法说出来呢？我自己认为可能出租车司机对问题的理解更准确。

张军：你认为现在有太多资金流入金融市场，而现在人才的情况也很相似。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年轻精英们进入金融领域，而在中国也相似。你对此有何看法？

Robert J. Shiller：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泡沫。历史上曾经在金融从业人员上面也有泡沫，而它在1929年危机结束之后也破裂了。工资急速增长，大批人们进入金融行业。但我自己是现实的科学的大力支持者，比如神经科学、物理学等等。年轻人不应该都去学习经济学，应该有更多人来研究这些学科。当今世界的一大变革将来自医学。他们研究人类大脑的构造，然后提出经济学方面的观点。他们搜集神经科学数据，然后将之用于经济学。经济学不是孤立的。如果回到17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研究主要由哲学家完成——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他们都是哲学家。我儿子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有时候他回家跟我说他所学的内容，我觉得跟我在经济学研究中所看到的東西很像。神经科学现在正在高速发展。未来很难预测，但我要说神经科学将会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耶鲁，很多学生同时对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都很

感兴趣。曾经有学生跟我说，整个经济学都是建立在人们“效用最大化”的思维模式上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在人类的大脑中应该有一部分发挥着这个作用。他想要找到这个部分。这将是一个需要十到二十年来完成的项目，而我估计他是找不到的。

张军：现在人们对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形势都很关注，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你对于刺激政策实施之后美国房价上的泡沫形成感到担忧么？

Robert J. Shiller：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它有很多方面。美国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GDP增长很稳定。1929 年大萧条和二战对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这之后美国经济一直保持每年2%的稳定增长，这一稳定性是十分显著的。当然除了2007-2009 年之外，因为金融危机使整个经济水平下降。

张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它们的经济发展差别更大。它们可能会保持10-25年10% 的强劲增长，然后经济增长就会减缓甚至衰退。而美国则可以长期保持2%的增长。对这一现象您怎样理解？

Robert J. Shiller：衰退总会发生，你不可能永远保持那么强劲的增长。中国正在从高速发展转为以温和的增长速度发展。我听说中国现在很关心环境问题。最近有一本书很流行，匹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它的可读性很强。这本书描绘了贫苦人民的漫长历史。它对于不平等的观点像马克思一样，与财富的积累相关。其实这本书在美国备受推崇很奇怪，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太喜欢马克思。作者强调对富人征税，来减慢财富的积累速度。我们必须征税，否则不平等将变得更加严重。而且我们应该对税收有所计划。我认为在当今世界的不公平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没有劳动技能的真正的工作阶层正在承受极大的痛苦。另一个关于当今世界的事实是，年轻人都会环游世界。他们并不会把一个国家看作自己的祖国，就像在伦敦，在一场签会后一个女孩拦住我，她跟我说这个房间中没有人是英国人，他们来自中国、印度、德国……我也不是英国人，那为什么我们会坐在一起讨论英国的事情呢？这就是人类的趋势。我觉得在未来的50年，世界将会是这样：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将会环游世界，但仍将有些人被留在当地，而他们将变得贫穷。我

对此并不开心，但这很可能会发生。

张军：最后，关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减慢。有人说这是因为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上监管太多。政府想要把房价中的泡沫挤出去，但这可能会花费10-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会受到影响。对此你怎样看？

Robert J. Shiller：由于你们独特的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不同。并且市场经济在中国只发展了30年，你们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经济衰退。

寻找低碳发展的新动力

编辑整理：姚毅



Michael Grubb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可持续资源研究院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教授，《气候政策》杂志主编。



采访人：**吴立波**

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个人的愿望之一是希望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化的共识，15年前我们有了《柏林协议》，之后才有了《京都议定书》，也许几年后我们会看到《北京议定书》的出现。」

吴立波：Michael 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全球最权威的气候期刊《气候政策》的主编，同时您也是研究气候变化特别是政策方面的大家。那接下来让我们从最热门的话题开始聊起吧。您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峰会上有可能达成国际共识吗？能从您的角度来谈谈对这次峰会前景的看法吗？

Michael Grubb：我觉得目前还不太确定。首先全球气候谈判达成共识是极其困难的，毕竟这牵涉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而每个国家的改革进度和相

关政策也是不同的。但我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峰会比对哥本哈根会议更加乐观。因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主要讨论京都议定书是否会继续使用。从本质上来说这两者是不同的。就像一辆脱了轨的火车无法做任何事。巴黎峰会的情况十分不同。我相信大家已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但可悲的是大家的期望也越来越低。因此，没有人是真正希望出现一个全球碳排放协定的，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吴力波：所以并不会减缓全球变暖的绝对目标吗？

Michael Grubb：我们并非要构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我的意思是针对工业化国家的减排，甚至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可，比如美国。我敢肯定，这次巴黎峰会上，一定会有许多国家将努力实现其目标排放量，但并不一定背后都是因为法律约束力。另外，在巴黎峰会上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广泛共识。这次的主要参会者想要借此达成减排协议。并且美国正处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的第七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会采取这样适度强硬的策略，部分原因想给换届带来一个挑战。因此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中国也很想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一致。尽管目前欧盟方面处于弱势，但也希望借此达成协议。这些全球主要参与者需要在政治上排除万难才能得到解决办法。最后关于此次峰会我想谈的是，通常在国际谈判中，这样的全球性峰会代表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突破，各个国家希望并肩合作来探讨协议的细节和必须推迟的方面。我个人的愿望之一是希望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化的共识，15 年前我们有了《柏林协议》，之后又有了《京都议定书》，也许几年后我们会看到《北京议定书》的出现。我希望并不全由巴黎峰会来包揽所有功劳。

吴力波：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这次巴黎峰会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我也同意您看好这次达成共识的观点，我本人因为参与了IBCC第五次政府评估，最近几天我们将会对第三小组的SPM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我们也觉得政治压力真的很不平衡。从中方角度来看，昨天潘家骅教授也提到过，中国政府所做的许多努力并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不仅是决策者，还有一些科学家，他们也试图忽略某些部分。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

那么多的该领域的英文刊物。即使是在英文期刊上发表提高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本地碳转化或者是改善环境监测制度相关的文章，国际社会也不会平等对待。某种程度上让中国学者有点郁闷。

Michael Grubb: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信息传播太慢，因此在一定区域政策发展和科学探索上时间会有先后顺序。尽管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仍然会发现其他地区在发展上会落后两三年。而语言则是另一个障碍。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人们思考方式的问题。我自己生活在北美洲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氛围中，也有放慢发展的速度来获得共识的倾向。但我们可以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第三个问题，也不是那么难以对付，即气候变化的政策变得非常政治化，虽然不是所有地区都如此，但在美国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强大的利益集团常常试图阻碍美国气候谈判的进程，比如废除杀伤性武器。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中国采取的行动来进行的。他们往往对来自中国的积极信号闭目塞听，因为会有损美国的立场。我谈到的只是一个小而强势的利益集团。对于中国许多的作为他们都会阻止其发生在美国。最有力的理由是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做什么，美国做这些有何意义。因此他们不愿接收外界好的讯号。不过学界绝对会尽量避免这些尴尬，这才是科学的原则所在。

吴力波：是的，我认为上海论坛也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鸿沟。

Michael Grubb: 我个人认为，西方传统观念会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我还发现如今人们对我刚在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事情惊讶不已。这次我与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引人入胜、开诚布公的会面。我周围的人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并没发现中国的文化。您刚刚谈到的一些问题西方也在试图去理解，因此只有靠时间来克服这些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障碍了。不过我们会加快脚步的。

吴力波：我们昨天聊到了您出版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我也大致地拜读了一下，当我看到“三个皮特的探讨”这一章时，觉得对现在的中国

十分重要，毕竟中国是正在转型阶段的新兴经济体。要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我们正在努力解决双轨制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试图放开市场监管，从西方社会吸纳市场机制和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尽量保留一些市场不进行改革。但现在中国政府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改革特别是能源领域。一些人认为我们只需要引入市场机制，然后政府就不用监管了。但另一些人依然担心这项机制能否在中国有效推行。您提到能源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相应的管理方式都表明市场虽然十分重要，但也不应是唯一的手段。西方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我们可以如何利用三个皮特的概念来进行能源管理改革吗？

Michael Grubb: 好的。我很高兴听到您认为这本书很有用。我很好奇中国的学者是否有机会就此进行研究。我不能保证这对中国有多少用，还需要中国的研究人员来思考之后才能决定。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基于我过去研究气候变化的经验，我不太满意西方传统解释：只需要引入竞争机制，然后为破坏环境买单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从我个人从政的经验来说，这远比大家认为的复杂，并且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政府的行动经常会被学者认为效率低下。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市场和价格只是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仍留下许多缺口。也有些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工具。我觉得许多人生活在严谨的经济环境中，没有意识到许多环节是需要科学来解释，并被恰当地结合到一起的。这也正是我想做的。

吴力波: 我觉得中国的学者和决策层真的需要弄清楚关于能源和资源管理的各类机制。如今我们正视图打破旧的体制，但当我们建设新的体制时必须从全盘来考虑。我认为您在欧盟所提供的经验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十分有益的。关于能源结构调整方面我还有一些疑问。其实英国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英国在放宽能源市场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同时也是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的先驱，许多国家也效仿英国。对于中国或亚洲国家来说，能源结构也十分重要。许多国家会对石油产品提供大幅度补贴。我们该如何调整能源结构呢？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行绿色税收制度，另

一方面又必须减少化工原料的补贴。因此根据英国或欧洲国家的经验，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逐渐有效调整价格体系，从而既能保证我国能源安全又能改善能源结构呢？

Michael Grubb: 英国对煤炭生产有一定的补贴。不过现在人们可能不会记得，当时出现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英国是一个促进低碳经济的国家。就在三十年前，英国被称为煤之岛和油气之海。不过，国内煤炭成本较高污染很大，能效也不太高。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她想让英国不再依赖煤炭作为产能。这也成为帮助英国国内能源转型的一个因素。当然企业私有化通过引进网络系统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并且降低成本。但减少能源补贴以及规定能耗价格一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很难让人们为能源环保付更多钱，这需要一个好的说辞来让人们接受。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环境，另一方面提高能效也可以减少我们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必须承认的是在许多重大改革过程中，会倾向对某些行业进行保护，毕竟阻碍使改革的过程一直都很困难。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达到的目标。也许英国只是比较幸运地在新一代天然气热时开发了北海地区天然气，也确实有助于降低能源价格。

吴力波: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北海的天然气也在减少，对不对？我注意到，英国也试图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进口天然气。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大单，确实给许多人带来希望，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政府的长远规划，仍然把燃料结构转型的重点放在核电和天然气上。看看这个2020年和2030年的计划，核电会成为除了水电之外的第三大发电能源。但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大众仍然担忧核电的安全问题。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Michael Grubb: 英国的情况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和民间社会一直强调，我们需要核能、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作为三个主要能源。这是某种政府的解释，碳捕获仍未如人们期望般进展，但这在英国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煤炭生产。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核电和可再生能源，要求能源市场进行实质性改革，因为这两种能源都是资本集约型市场的解决方案。特别是，核需要很长的期限进行融资。因此，政府现在已经达成了一项新的

核电站来改进，也有欧盟相关的配套设施。能源价格最终比人们五年前的预想高了很多，超过两倍。当然，在欧盟和英国所谓的核复兴会慢很多。至于中国，我不敢评论，因为都是国家的选择。从我的观察来看，核能比大多数人预期的供给更困难，价格也更昂贵。

吴力波：到目前为止，运行核电机组在中国并没有那么贵。也许是因为中央政府给核工业提供补贴和减税政策。如果您看一下电价，核能甚至比天然气更便宜，这就是中国的情况。但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安全问题。在建的核电站使用的是第三代发电机组，它比正在运行的机组昂贵的多。俄罗斯与中国政府虽然签署了天然气合同，但在业务方面，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它只是一个政治信号。

Michael Grubb：这对中国是非常有用的附加能源，因为天然气比煤炭更清洁，并且核比天然气更清洁。

从全球视角看上海自由贸易区： 我们需要想象力与耐心

编辑整理：陈宇婷



Graham Mather

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



采访人：**尹翔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虽然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转型时期暂时的产物，但自贸区已越来越显示出其长久性及其对整个经济体的示范性。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内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自贸区的重要性，对它的批判会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少。」

尹翔硕：您是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主席，请问您的组织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呢？

Graham Mather：世界自由贸易区协会已成立有12年之久，它的功能是提供一个关于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意见交流平台，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大型会

议。2011 年是在上海举办的，同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诸如开罗、巴黎也举办过。我们偶尔会举办小型的地区会议或与国际权威机构、世界关税组织进行对话。这个协会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尹翔硕：您参与这个活动多年，一定对世界各地的自贸区都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全球各种自贸区的发展吗？

Graham Mather: 自由贸易区的理念发源于1世纪诸如吕贝克、汉堡这样的北欧城市。在那里商人们希望自己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商业贸易的意见成为城市里的主流倾向，同时也渴望摆脱神圣罗马帝国君主和贵族的统治。所以城市开始有了明显的分界：一类是传统好战的城市，充斥着领土扩张的热情；一类是自由城市，它们组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减少贸易壁垒的共同市场——汉萨同盟。到了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三个阶段的自由贸易区。首先是单纯的集中交易货物的区域，类似码头，很少受关税的制约，商人们在这里进出口自己的商品。接着是类似中国经济特区这种更复杂的贸易区。到了第三阶段，迪拜港等城市自由贸易区兴盛起来，这种自由贸易区拥有金融交易所、国际金融中心、网络城、大型国际医疗保健城，少控制、低税率、更自由的管理方式被更多地运用到项目建设中。

尹翔硕：您认为自贸区可以进行分类吗？

Graham Mather: 自贸区是一个划定的特殊区域，享有特殊的经济制度，和国家中其他地区比起来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所有的自贸区都可以被划分为上面所提到的三种类型。

尹翔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自贸区？您认为自贸区在全球经济和各个国家的经济中有着怎样的功能作用？

Graham Mather: 当一个国家开始建设自贸区时，它就在传达一种信号，里面包含着多种信息。对于国外的直接投资者来说，这个信息就是“欢迎”，好比贴出了欢迎商业来往的告示。其次，它表示这个国家会减少贸易壁垒，

可能是关税层面上的壁垒，也可能是两国经济合作上的壁垒。它表示两国可以加速合作。建立自贸区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它会带来一系列的活动，比如科技园区，或者专门人才的汇集，又或者在一些更老的自贸区是出口和出口加工的汇集。人们虽然不确定整个国家经济体是否能很好地运转，但他们喜欢自贸区提供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

尹翔硕：各个国家的自贸区都是同样的重要吗？怎样的自贸区更成功？是由区域定性的还是由其本身的类型定性的？

Graham Mather：我认为自由贸易区更多是由其所在区域定性而非由其本身类型定性。比如，尼日利亚的主要自由贸易区都建在油气生产区，这些自由贸易区非常成功，为贸易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伊朗模仿了这种方式，也将在油气生产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自由贸易区的重点会放在日用商品、电子商品、网络产品上。我认为很难笼统地为所有贸易区定性，但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自贸区项目的建设都是从大型经济体中发展出来的。中国通过建立自贸区加强其经济的发展，说明自由贸易区有其存在的理由并将一直存在着，印度也拥有上百个不同种类规模更小的自贸区。这都在传达一个有趣的信息，虽然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区是经济转型时期暂时的产物，但自贸区已越来越显示出其长久性及其对整个经济体的示范性。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内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自贸区的重要性，对它的批判会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少。

尹翔硕：您觉得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特区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中国仍然需要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Graham Mather：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试验示范区，其重要性是十分显著的。它意义深远且会给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一个自贸区是国家领土范围内拥有制度特权的小区域。从整个国家经济体来看，这样的安排存在一种固有的不稳定性和不对称性。自由贸易区之外的公民也希望享有同样的权利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趋势。上海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全世界第一个被设计为政策实验区的自贸区，而这些政策有一天也会被扩展和复制到中国国家经济体的

其他地区。这是一种非常有创造力且有效的方式，它规避了可能造成的紧张矛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构想，它使得自贸区和国家经济体都充满了潜力。

尹翔硕：当自贸区不能有特权或者政策优惠，自贸区如何履行其试验的职责？其中的困难是什么？

Graham Mather: 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政策的实验区和它享有特权的性质是不同的。比如，在自贸区内，作为一个试验性的样本，保险公司银行的所有制将被考察几年，如果行之有效，将被运用到全国范围内。这是在一个划定区域通过实际实施考察效果的做法。在为自贸区设计时，国家不会设计它们不想运用到全国经济体中的政策。就算自贸区里可实行商品零关税、金融服务零关税，难道全国也可以零关税？既然不行，那么这样设计就是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里长期实行不同的制度，那么国家的经济将会变得不正常、不稳定。将自贸区内和国家经济体结合起来考虑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田和世界上其他自贸区未来发成功的关键。

尹翔硕：我们能否在自贸区采用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并首先在周边国家实施？

Graham Mather: 标准化和掌握时机对于资本自由化非常重要。如果自由化进程过快，资本将以不可控的方式流入自贸区，这将带来危险。我们还需注意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管、资本管控和准备金要求之间的关系。这其中的风险肯定会逐渐减少，但只会是减少而不可能是完全消除。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减少风险，催生出一个繁荣的金融服务业市场，而不破坏审慎监管，以免重蹈美国和伦敦历史上酿成灾难的覆辙。

尹翔硕：您对于央行上海总部在5月22日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有何看法？

Graham Mather: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

则（试行）》是资本自由化过程中走出的第一步。这个政策只限于已在自贸区建立并登记注册的企业，政府很显然想对这些账户的使用进行严密的监管。我认为这是银行监管的标准化步骤，我相信政府会做好这些工作，我也相信从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今后复制该政策的地区来说是十分核心的启示。所以我认为这是“试验”的真义所在。我曾与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给北京的建议是“耐心”。中国还有许多时间，没有必要操之过急，企图在一夜之间就完成转型。虽然可能会有人批评说在过去的8个月中，上海自贸区没有很明显的进展，但我们可以忽略这些批评，放松，耐心点。也有人会说这是可怕和令人担忧的，我的同事的意见是保持耐心和镇定。让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是条非常机智的、不错的意见。

尹翔硕：您对于上海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有何建议？您认为上海自贸区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Graham Mather：我认为上海自贸区面临的困难是由其所受期待较高带来的。高期待会带来很多压力。要做到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将金融服务业与已有的管理系统顺利地整合起来是一项非常需要技巧的任务。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副市长在上海论坛中提到我们面临着挑战，我认为这是严峻的挑战，但它们也是很好的挑战——是应该出现的挑战。所以正像世界银行提供的建议所说的，我们应该做到有耐心、镇定，循序渐进。在英国的政府系统中，批评往往是另一种。在英国，我们往往认为我们做决策过快了，我们还没有考虑周全，我们还没确认共识，如果世界改变了这政策还有效吗？政府里的局面会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对于明显看重可预测性和长期收益的海外投资者尤其是一种警示。现在中国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不要一味盲目向前。

尹翔硕：您认为政府所有的自贸区和非政府管理的自贸区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Graham Mather：我曾向上海政府建议，可以考虑在未来合适的时机采取政府所有合同管理的方式。可以先在实验区试试，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试行之后看看试验的结果。但是我认为拥有较宽松环境的私

营部门中产生的创新来源于政府所有和私营管理的完美结合。

尹翔硕：您如何看中国的金融发展发展和其与自贸区的关系？

Graham Mather: 自贸区的精神就在于减少贸易壁垒和关税，这对于金融服务业十分重要。虽然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但我们没有针对全球金融流通制定规则的世界金融组织。如果美国、欧洲、金砖五国能保持金融服务业管理上的统一步调，对于全球化是非常有益的。但我们现在的步调并不一致。我们不能走向教条主义，应更富有想象力。在未来全球的发展中，金融服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真诚的开放、多边主义的精神、来自中国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增进对话都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发展。如果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走得更近了，我们将看到人们是不是需要中国，我相信他们是需要的。

尹翔硕：您认为上海自贸区对于其他地区自贸区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Graham Mather: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自贸区虽然越来越多，其形式却越来越僵化，一旦建立了自贸区，就不会根据区外其他地区和全国的政策进行调整。我认为这是不幸的，但我相信有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支持，上海自贸区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真正看作试验田的贸易区。这会对全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上海成功了，其他国家政府会这么想“我们也有自贸区，我们采纳他们的经验吧！”，或者“为什么我们不试试这个想法，看看能不能效法中国？”。所以我认为，实验区这个想法不仅本身在理念上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对于其他也拥有自贸区的国家来说，会带来莫大的鼓舞与欣慰——中国通过自贸区达到了对全国经济体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认为上海自贸区不会失败，它将复制、被跟随。

尹翔硕：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个自贸区？您对这些自贸区的期望是什么？

Graham Mather: 据目前使用得较多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概有3500个自贸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比较小的经济区。享有比较重要经济地位的自贸区至少有1000个。考虑到自贸区发展议题的学术重要性，目前针对自贸

区发展的学术研究还相对薄弱，这是一个年轻经济学者可以一举成名的研究领域。但国际组织也发现，去给该议题下定义并收集相关数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世界银行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好的。所有的现象表明自由贸易区正在为国家的GDP发展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随着贸易区数量的增加，区内项目建设的想象力越来越重要。我预测世界上自由贸易区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并且希望它们可以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最想看到的是上海自贸区的经济政策转变为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到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区域性的政策如何演变为全国性的政策。

尹翔硕：我想您的组织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平台，一定会扮演更多的角色。

Graham Mather：有一个叫做“世界自由贸易区组织”的新组织刚刚在迪拜成立。这个组织被设计为一个游说团体形式的，有常任秘书处并且会更系统地与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对自由贸易区进行个性化分析并推动它们的发展。我非常希望它能够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将成为世界舞台上又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体，有利于自贸区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推广。

尹翔硕：您对上海论坛有何寄语？

Graham Mather：能参加上海论坛我非常荣幸，主题会议意义深远，有独创性、富有想象力，与会代表都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和有影响力的同行。我认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有想法的人们聚在一起，从中长期的角度、以思想开明的态度探讨问题。人们在这里直接表达他们的想法，没有模棱两可，这种对于表达自己理念十分勇敢的态度对论坛做出了贡献。

亚太形势和中国的亚太政策

编辑整理：刘璐茜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复旦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名誉院长



采访人：**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认真回顾、总结以继续前进的阶段。我们现在在形成正确的利义观，我们需要讲义，也需要讲利。」

吴心伯：沙大使，早上好，感谢您接受上海论坛的高端访谈，今天我们访谈的题目是当前的亚太形势和中国的亚太政策。首先我想请您评价一下当前亚太地区的总体形势。

沙祖康：亚太形势要分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从经济形势来讲是好的，这个好是相对其他地区来说的，特别在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亚太地区继续保持了经济上的活力，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从政治关系上来讲，我觉得总体也是好的。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在各方的配合下，亚太成立了很多机制，APEC，10+1，10+3等都逐步进入运作的状态，增加

了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了解。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三，从安全形势来讲，这一点特别突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现在还比较紧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另外我们和菲律宾还有越南的关系应该说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出于这几个因素，政治、经济，包括一些领土纠纷，综合起来讲，亚太相对于西亚北非，相对于其他任何地区来讲，我们总的来说，还是和平稳定的。

吴心伯：现在国际上讨论亚太形势，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所以讨论亚太问题当然离不开中国因素。可能今后中国因素会在亚太地区的形势和发展塑造中越来越突出。那么您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亚太发展形势中的中国因素？

沙祖康：我觉得中国从世界范围层面来讲的话，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一方面是指规模，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就像总理说的那样，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走过了发达国家近三百年所经历的历程，我完全赞成。所以中国自身的发展带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这在国际社会是一致公认的。从前景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以持续下去，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功臣。但这里有很多的条件，取决于我们内部改革、经济转型等等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当然这里会有很多的曲折。从外部来讲也取决于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另外从邻国来讲，还要能够增进邻国对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理解。这需要大家的配合。双方，特别是中国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吴心伯：就是说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互动，它不是单向的，也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的重大利益和核心利益。那么您觉得在当前中国的亚太政策里，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哪些问题？

沙祖康：应该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政策是很正确的。大家都知道，在上届政府期间，我们提出了睦邻，善邻，友邻，富邻的政策，应该

说这个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亚太地区，我们可以打开地图看一看比如说，中日问题。实事求是来说，我们的关系现在不是好的，出现了中日复交以后的低谷状态。还有朝核问题，十几年来我们三个坚持：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朝鲜问题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坚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实事求是来说，我们确实做到了坚持，但坚持的效果怎样？朝鲜原来是个无核武器的国家，充其量是个有发展核武器、成为核国家的强烈愿望的国家，但十多年的坚持以后它成为了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朝鲜问题引发出来的大量问题：日本借口朝鲜问题要修宪，要加强国防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某种意义上也借口朝鲜问题，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它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服务；韩国是出于正当的关切，其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影响客观上也激化了朝核问题。毗邻的国家里，俄罗斯也是我们的邻国，当然我们关系很好，但日俄关系不能说是最好状态。再往南到东南亚，这是我们最近出现的问题，首当其冲是菲律宾。这个问题越闹越大，我们的关系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而且有越来越恶化的倾向。菲律宾问题也使东盟内部出现了分裂，有的国家不赞成、不支持菲律宾甚至反对，有的同情菲律宾，有的支持菲律宾，像越南。从东盟这一片来看，我们的关系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往下走，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显然也是恶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几十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对华人华侨这样的行为。这种变化是很出乎中国意料的。从中国来说觉得很委屈。从南亚那一片来说，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我们和印度关系有很大的改善，跟巴基斯坦是一直关系很好，当然这也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东亚、东南亚、南亚，我觉得都存在问题，再看中亚，我觉得这一块有很好的改善。

所以环顾四周形势，有积极面，但也有很多消极面。我们应该好好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睦邻、善邻、友邻、富邻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在政策的落实上还需要改善。新政策也要基于原来政策的基础上，是原有政策的总结和提升。我总觉得，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正确的。中国还是应该认真地、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实事求是地对我们政策的推行进行认真的反思，哪些是可以继续改善的。谈不足是很忌讳的，尤其是在外交事务中。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自己犯过外交错误，这是国家尊严问题。但是从中国内部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反思，而且要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加以落实。

另外还有外部因素，中国和那么多国家打交道，有的关系不是中国想变好就能变好，我觉得还需要外部的配合，那么就需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针对性地实行一些政策和方法。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我们虽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能力还是有限。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强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可能独当一面。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我们讲“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亲，我们哪些地方还不够亲？为什么？诚，我们还有哪里可以改进？惠，那我们还要富邻善邻，哪些地方可以做到惠邻？要多予少取。因为在亚太来说，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不存在多予少取的问题，而且还应该反过来，多取少予。亚太地区国家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有最发达的国家，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还有最不发达的国家，海洋沿岸的国家，小岛国家，内陆国家；有结盟国家，不结盟国家等等怎么个“惠”法，这个是要有区分的，要落到实处。“容”的问题，包容文化要好好研究，同时我们也要独立自主。中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它首先服务的对象应该是中国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睦邻善邻友邻富邻政策也好，亲诚惠容政策也好，从根本上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但是怎样服务好，我觉得不能光靠自己，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必须要进行国际合作，尤其是要和邻国合作。那么我们的政策还要细化，分含义、分类别进行新的操作。鲁迅先生说过，我们应该残酷无情地揭露自己。我们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认真回顾、总结以继续前进的阶段。我们现在在形成正确的利益观，我们需要讲义，也需要讲利，我们外交的观念上也有很大的转变，都很有战略性。从政策的设计到具体操作，我们都在做，我感到很受鼓舞。但最近年纪大了，我多么希望能再年轻十年，走上一线，再做贡献。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现在存在很多问题，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快速的发展所产生的。我们的快速发展没错，但因为我们发展快，连续发展时间长，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应当感到高兴，前进中的困难和停滞或是后退的烦恼性质完全不一样。

吴心伯：那么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亚太政策，现在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历史遗留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利争端问题，我们陆上有14个邻国，我们已经与其中12个邻国解决了领土争端，主要是通过在外谈判判

中互让互谅，那么您觉得我们解决陆上争端的这些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被解决我们在海洋上的问题？

沙祖康：领土问题，不管是陆地还是海洋，大家都很重视。这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家产，后代解决不好也对不起祖宗。那么中国人是这么说，外国人又何尝不是这么说呢？这个问题上应该要换位思考。地球一亿年前，你说是谁的？它没有主啊。其实从世界历史有的记录以来，以欧洲为例，它的边界什么时候固定过？从来没有，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说实在的，也充满内战。首先，领土问题是敏感的，很容易煽动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一点大家都接受，没有异议。在中国敏感，在对方也敏感。第二，领土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看到现在美俄关于油气的问题，当时你看看很好的，但你打开历史书看看，它原来是中国的地方啊。我说这话千万不能有丝毫的误解，认为我们还要把它收回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只想提一个问题：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它是可以调整的。边界一直都在变化。六七十多年前外蒙古还是中国的，对不对？这样一来，在过去领土和领海的争端没有办法解决，只有通过战争，谁胜了就是谁的。所以海洋法啊、国际法啊都是近百年来才有的事，而且是由西方主导。

所以今天世界发展到这个阶段，特别是核武及其运载工具的发展，一旦发生战争，它的后果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人类的毁灭和地球的毁灭。因此应该排除用战争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你说局部战争，你怎么能确保它不扩大呢？你能控制对方能控制吗？所以中国提出要和平解决争端，这个是有道理的。这不是投降，也不是中国政府软弱。用战争手段解决领海或是领土问题，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非和平手段排除了，那么只剩下和平手段。解决办法只能是互谅互让，有取有舍，只有这条路。但有的时候你愿意和平解决，互谅互让，对方不愿意。我们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来维护和平，但同时我们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来准备好对方不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为了达到和平地解决，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来向对方表示：只有这条路可走。如果你要采取非和平手段，对不起，你自己再合计合计。

所以我讲要有两个百分之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加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不能有丝毫懈怠。所以习近平主席说，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目的是什么？防止战争，来增进和平和协商解决的能力，也让对方

考虑选择这样的道路。

吴心伯：那么我们在亚太政策和周边外交中，美国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常常会让我们周边的安全环境和周边政策变得复杂起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在我们的周边外交中处理好美国因素？

沙祖康：我和美国人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是赤裸裸的，是实实在在的霸权主义，不玩虚的，凭着自己的肌肉横行霸道。美国不是生下来就是超级大国，他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才会有独立战争。他还经历了内战。那时候它也是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他是超级大国，也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审时度势，在一战二战当中，从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用最小的牺牲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因此他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归功于正确的策略、政治家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要换位思考，今美国千方百计想保持和延长它的一超独霸、鹤立鸡群的地位，但是历史沧桑剧变，中国的发展引起了美国发自内心的恐慌。美国为了保住其地位，有意扩张，遏制中国。美国是个非常实在的国家，它有梦想，但也非常现实。美国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能力跟不上。而且现在全球化也在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仍然是一马当先，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相对来说还是下降了。美国在当前国际局势中还是相对克制的，比如在叙利亚化武问题上和朝核问题上，它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和风险对美国采取最有利的措施。

美国有它的担心，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传统。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没有扩张的基因——我们确实没有啊，不然要扩张早扩张了，郑和下西洋就占领别国了。中华民族确实特别爱好和平，是一个善良智慧的长者形象，特别友善包容，讲仁义道德。我觉得我们缺乏霸气，我们是王道。太平洋把我们中美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主席说太平洋足够大，能包容我们两个国家。基于以上看法，我觉得中美两国完全有合作的条件，另外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全球化、信息化、核武发展等等，我国及时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也没有选择，它只能接受，因为这个政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当然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地区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这点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开启了基于中国文化的、与西方不同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其他国家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我们

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政策是基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各自长项和短板的认识，以及共同利益的需要。不管美国总统改选，政府怎么换届，唯有美国的利益是坚持不变的。中国也坚定维护中国的利益，这一点是不变的。我们不应被政府更迭困扰。我看中美关系是一种又爱又恨，爱恨交加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恨；爱多少，恨多少，要看具体情况。中美关系能好到哪去，也能坏到哪去；好了，就会变坏，坏了，就会变好。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有这种智慧。这一点，我们应该有自信。

吴心伯：好，非常感谢沙大使接受上海论坛的采访。今年是您和夫人第一次参加上海论坛，能不能对上海论坛今后的发展提出您的期望，让我们今后工作做得更好？请您寄语上海论坛。

沙祖康：上海论坛办了九次，积累了很多经验。准备非常专业化，问题选择非常有针对性，讨论有深度，当然还可以改进。大体上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参与和组织了几十年国际会议，我组织了潘基文称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大会——2012年在巴西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峰会。我有资格来讲，上海论坛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如果真要寄语，我只能这样说：上海论坛办得很好，我坚信会办得越来越好。

人民币国际化：迈向更优的资本配置

编辑整理：梁丹怡



Yves Mersch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



采访人：许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
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而我认为风险的双向性也是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图之一：你若是要国际化，就得承受更多的波动。」

许闲：首先我想感谢您能来到复旦大学参加上海论坛。今天，我向您提的问题将主要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这个主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Yves Mersch：我觉得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十分愿意参加上海论坛、十分渴望重回上海的原因。我想亲眼看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而上海又在人民币国际化中

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久前，上海实现了直接在人民币和欧元之间进行的国际贸易。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因为这一发展是符合人民币走出去这一梦想的。请让我说说我为什么相信世界期待人民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贸易量占到了世界总贸易量的9%，仅次于美国；并且，已有预期显示到明年，中国三分之一的外贸将会以自己的货币进行。

许闲：好的，感谢您的回答。我们都知道欧盟在推行欧元上是十分成功的，您认为中国可以从欧盟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吗？

Yves Mersch：我认为，在有一个领域，欧元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中国货币走向开放，该领域就是深化和整合市场。欧元区当局希望欧元区能够实现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他们希望深化资本市场。最近我们看到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的增加以及债券到期时间的增加。为了辅助它们的发展，我们需要非常有效的支付体系基础设施，而在这一领域，我认为欧洲可以和中国分享它的经验。而且，对中国而言，在依赖美国这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产品和有关它的知识外，再学学欧洲的经验，会十分有趣。并且，想必你们也会看到欧元的支付体系在危机之中表现出了它坚韧的一面。所以，我认为在这一领域，今后会看到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强强合作。

许闲：中国国内目前有许多言论颂扬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带来的机遇，但我今天想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问问您觉得人民币国际化在近期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Yves Mersch：我之前已经在一些会议中说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一定人民币国际化是伴随着挑战的。我们不能有这种预期，即国际化不会提高资本市场的波动。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而我认为风险的双向性也是将人民币国际化的意图之一：你若是要国际化，就得承受更多的波动。汇率的波动也会带来更加准确的商品价格，进而扩大市场在一个纯中央主导的经济体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最终会带来更好的资本配置。而得到更有效分配的资本将会增加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以中国为例，我认为这种双向风险会带来产品市场的多样化，

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更平稳过渡，我想这同样是政府的目的之一。

许闲：好的，那我接下来想问，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呢？

Yves Mersch：人民币国际化将更好地整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它将实现贸易以及对内对外投资的便利化。并且，我昨天也提到，中国吸纳的国外投资和中国的对外投资都增长迅速。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世界资本分配的不均，并且更好地平衡中国的国内经济。

许闲：谢谢。我们都知道法兰克福是欧洲的金融中心，而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您认为中国货币的国际化会给这两座城市带来一些机遇吗？

Yves Mersch：任何国际化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正如中国有自己的一些金融中心，欧洲也有许多不同的金融中心，各自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从某些程度上说，不同的金融中心之间是联系紧密的。在欧洲，法兰克福有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卢森堡也和中国许多银行有合作，巴黎也表示它愿意更多地参与到人民币国际化中。当然了，还有伦敦，虽然它在欧元区外。我甚至要补充说，除了不同国家的金融中心需要合作，还应该在学术界发展更多的联系。我知道复旦大学和世界范围内其他优秀的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其他大学也是如此。例如卢森堡大学就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大学建立了合作。我认为这体现出贸易、金融和学术界往往是最先建立紧密的国际合作的领域。

许闲：您对于中国和欧洲学者在有关金融领域的话题上可以展开哪些方面的交流有什么建议吗？

Yves Mersch：我认为中国和欧元区在金融上最相仿的方面在于金融结构。由于我比较密切地关注有关金融稳定性的问题，我发现中国经济的融资问题主要也是靠银行系统解决的，资本市场亦是如此。在处理这种对银行渠

道融资依赖可能会导致的结果上，我想中国和欧洲更倾向于以一种传统的方式看信贷总量，而这种传统的方式在美国已经不复存在。我认为，在这一领域，未来中国和欧洲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诸如金融稳定性、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展开更多交流。

许闲：感谢您的建议。由于我是一名保险系的教授，所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会和我的专业有关。请问，欧洲国家的保险业是否和欧洲央行之间有紧密合作呢？

Yves Mersch：我认为在未来，保险业以及养老基金行业需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目前，在银行去风险化的过程中，它们在更多地面临如何管理期限错配的问题。另外，它们将在如何保证长期内融资能力上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保险业和养老基金业可以介入、辅助长期内对内对外融资。我认为，在中国，情况可能也会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包括了保险和养老金。我认为，未来，非银行融资在为整个经济融资上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对它们严加监管。

许闲：谢谢您今天精彩的回答！

Yves Mersch：也非常感谢您！

信心和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编辑整理：Laura Natrop，姚毅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校长



采访人：丁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

「我认为荷兰竞争力的秘密是它不光看量化的竞争力指标，还看质量指标。比方说，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丁纯：我们都知道，您领导着荷兰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这所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医学等学科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得主也曾攻读过贵校的经济学专业。您可以对贵校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您对我们学校的情况很了解。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荷兰有14所大学，伊拉斯姆斯大学是其中的一所。

这些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都很优秀，而且都排名全球前200名。一个国家的所有大学都很优秀，这其实是值得惊叹的。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为伊拉斯姆斯大学感到骄傲。100年前，三位企业家发现了荷兰对贸易专科类学校的需求，于是创立了本校。之后，这所大学逐渐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大学，但与业界的联系依然很强，所以我们一方面研究经济、商业、法律和政府治理，另一方面研究卫生、公众健康等等。这是伊拉斯姆斯大学最负盛名的两个优势领域。此外，您提及了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的校友Jan Tinbergen，他是我们的骄傲。

丁纯：在中国，我们经常讨论教育问题。您能和我们分享您的教育理念，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的理念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首先，如今荷兰将近50% 的适龄学生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是说，18-23 岁的荷兰人中，将近一半的人正在攻读专上教育，包括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注：专上教育，又称作第三教育，指中学教育后接受的教育。）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虽然荷兰是一个小国，但仍然值得思考的是，这么高比例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出类拔萃。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大学是应该区分化，录取一些人、淘汰一些人，还是应该更具包容性？荷兰的教育政策包容性很强，这不同于中国或英国，这两国教育的筛选功能更强。在荷兰，一旦你完成了中学教育，原则上你就得到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我刚刚提到，如果你的国家一半的人口去上大学会怎么样？他们不可能同样优秀，所以过去20年荷兰的大学一直试图提高学生的考试通过率。很多学生其实无力完成他们的本科或研究生教育，因此我们流失了很多学生。所以我们在伊拉斯姆斯大学所做的是，我们深入地调整了我们的课程，让学生将大学一年级视作“筛选年”。虽然我们在入门的门槛上并不太苛刻，但我们在入门后设定了较高的选拔条件，所以第一年你必须修满应修的学分，不然你就要离开。在荷兰，这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没有其他大学会苛刻到让学生在一年级修满所有学分。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的成绩更优秀、更专注、更守纪律，他们在期限之前交作业，并且很少补考。他们的表现比过去优秀得多，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种教育理念确实确实改变了学生。

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顾虑重重，因为由于这种教育哲学，学生们可能不敢来鹿特丹了，因为他们在这里学习很辛苦。但事实正好相反。实际上，入学第一天开始就保持出色的这种挑战吸引了学生们，因为这正是他们去其他国家的大学时所得到的体验。他们必须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断挑战自我，没有其他的路，也没得选。学生们也享受这种体验，他们迎接挑战，并且成为了更好的学生。

丁纯：所以这意味着师生必须勤奋学习。我们常说，有竞争才有活力。您有没有关于如何激发老师们创新潜能的想法，尤其是如何激励年轻老师？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当然，创新有很多方面，但让我列举两例。首先，教师当然需要更加国际化，这意味着我们期望他们出国交流的次数比以往多得多。我们希望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这对年纪大的教师可能比较困难，但对年轻老师来说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将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整合到课程中，我们期望他们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所以我们颠覆了教学方式。在过去，一节2小时的课上会有900个本科生。但现在我们给课程录音，学生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听录音，甚至是在他们带着iPod 跑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学习。当他们来到教室时，他们不仅仅坐下来听讲，也与其他同学充分参与到每个课堂话题中，因为他们从其他学生那里学到的和从教师那儿一样多。不过教师们依然有他们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的理念是让学生更多地参与，但这意味着老师们也要调整自己的思维，并在传达讲课内容时更具创新性。老师们一遍遍复述PPT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必须更具参与感，不光对学生，也对他们自己。他们也要参与到实际问题中，因为在鹿特丹我们有一套从问题中学习的机制。

丁纯：复旦是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姐妹学校，您能给我们的同学们一些寄语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他们很棒，他们很出色！我们现在有大约500个中国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其实来自复旦大学，并且他们如此有上进心，

如此不可思议地勤奋，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努力，而且他们对荷兰和鹿特丹的生活适应得非常好。我刚刚说过鹿特丹对中国学生而言是适合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学生通常习惯于生活的大都市。鹿特丹的城区有美好的氛围，有很多绿化，骑行族遍地，中国学生不害怕骑车，所以他们适应得很好。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确实发现他们非常礼貌，大多数都习惯于倾听老师，尊重师长。很显然，他们在一个尊重师长的氛围中长大。我们教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大胆，鼓励他们自由、自主思考，我们尝试教他们在研究中第一重要的怀疑精神。有时我们担忧当我们把他们送回中国时，他们会发现适应原有的文化氛围很困难，但另一方面，我们私下里认为他们最终成为了更优秀的研究者。但他们的确非常出色，我们非常高兴与他们相伴，并且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

丁纯：您也许知道，在复旦，我们有一个荷兰研究中心。您对我们的研究人员或活动有任何建议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首先，你们必须来荷兰访问，这对于一个荷兰研究中心的研究者来说是必须的。你们不能仅仅在中国研究荷兰的文化、语言、商业或其他任何领域。所以你们需要出访，我们会全心全意地欢迎你们。所以这是我的首要建议，来这里自己看看。很多荷兰的大学都设有中国研究组织，他们一直鼓励学生在中国待一些时间，不然他们怎么学习呢？我很惊讶地认识到中国学生对研究荷兰有兴趣，并一直对此满怀敬意。为什么呢，我们国家这么小！你们有十亿多人口，而我们只有1600万左右！所以我一直满怀敬意地认识到有人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感兴趣，并想要研究它，我们对任何对我们国家足够感兴趣的人都很欣慰，我们随时欢迎中国朋友的到来！

丁纯：在欧债危机后，现在对“智慧增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意思是要用创新来促增长。您可以评论一下近期欧洲的经济局势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资格评论，不过我愿意分享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欧洲在逐渐而缓慢地复苏。有些政客会告诉你最

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我不确定是这样。看看银行系统，他们缓慢地重新调整资本，但这仍然远远不够，他们的缓冲资本金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有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一大部分欧洲银行其实是“僵尸银行”，很多都无法通过压力测试。当然，这取决于你怎么设计压力测试。除了银行外，工业的复苏也非常缓慢。工业依然被汇率问题所困扰。它们的利润达不到人们对业界的普遍预期。最不幸的是，消费者信心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我认为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政客很多时候并未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因为他们一直告诉选民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要相信银行家。这也是Robert Shiller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上海论坛开幕式上提及的一个观点。现在所有人都非常憎恶银行家，政客通过使用比喻对这种现象推波助澜，但实际上金融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燃料，所以除非我们重新开始信任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否则经济会停滞不前。所以信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即使基本面情况很好，修复欧洲经济中破碎的信任是很困难的。

此外，欧洲一体化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进行了欧洲议会选举，欧洲有一种强大的声音认为欧盟是失败的，我们应当重新从欧盟中脱离。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声音，是一股我们需要应对的强大声浪。一旦决定成立欧盟，我们就没有回头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前行。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欧元，不能没有财政联盟，不能没有政治联盟。我们已经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但我们还没有实现政治联盟，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迈进。

丁纯：您提到，欧洲议会中怀疑欧盟的党派正迅速积聚力量，同时对欧盟的信心也遭遇了危机。我认为欧洲保持联盟状态和继续一体化不但对欧洲，对中国和世界也是好事。你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个经济领域实践者，所以我想听听您对银行业联盟的意见。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我认为银行业联盟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达成这个联盟非常重要。重复一遍，我不是银行业联盟的专家，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迅速向欧洲一体化和银行业联盟迈进。理想而言，会有一个全球的银行业监管机制，虽然我认为可能太遥不可及，至少在欧盟的层面，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过欧盟单靠自身是很难解决全球问题的。

丁纯：1979 年以来，鹿特丹和上海就是姐妹城市。您来到了上海论坛，谈了鹿特丹自由港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对鹿特丹做个简单的介绍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鹿特丹和上海一样是个港口城市。很多年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认识到鹿特丹港口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当然几十年过后，按照不同的标准，鹿特丹港口在世界上可能排名第9，第10或第11，并已经被至少8个中国港口赶超了。¹

丁纯：但在欧洲仍然是最大的。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你说对了，在欧洲仍然第一，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你纯粹用量化的方法衡量，比如船只吨位，那么中国的港口都更大。不过，荷兰的港口仍然对荷兰全国的竞争力有很大贡献。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全球竞争力指数，荷兰排名第八。中国排名第28，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提升竞争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还认为荷兰竞争力的秘密是它不光看量化的竞争力指标，还看质量指标。所以比方说，社会创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法治、对政府的信任、创新的税收和关税管制、一定领域内的高水平教育等都与社会创新有关。健康因素和环境议题也正日益重要。所有这些都使荷兰的基础设施高效而创新，这提高了荷兰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排名。

丁纯：您在上海论坛的闭幕式上谈到了上海自贸区。您能够对上海的这项试验提供一些评论或建议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试验。上海如此有趣的原因是我们看到在欧洲，自由贸易区正越来越不受欢迎。我们以前曾有过自由贸易区，但现在我们出于多种原因放弃了它，一个原因是欧盟自身几乎已经是一个自贸区了。当然这只在欧盟之内，如果你是一个非洲的农民，你不会认为有一个自贸区，因为对非洲仍然有着贸易壁垒。在欧盟区内有某种形式的自贸区，但自贸区就管制、关税和货物运输而言正变得越来

¹ 按集装箱吞吐量，2013 年排名在鹿特丹港口前的中国港口共有 7 个。

越严苛。所以由于严格的管制，我们更容易放弃自贸区，而转向其他形式的创新，例如安全的贸易通道，或者发掘整条产业价值链，而不是仅仅盯着公司证件或公司的税务、关税证明。所以这些创新帮助了鹿特丹的港口。我对上海的自贸区发展现状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就像我们在上海论坛了解到的一样，上海自贸区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它的核心不只是自由贸易，还有将上海与中国的其他地区连结起来，还有政府改革、管制改进，法治和仲裁，可靠的运作机制以及运作流程的结构，可靠的政府治理，也许还有改革的可持续性。我认为可持续性对整个中国来说正日益成为一个议题，对上海自贸区来说也是如此。

丁纯：就像你提到的一样，在这场试验中我们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在法治和监管领域。如我们原有专门关于合资企业或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可能需要修改。你对这些领域有什么建议吗？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作为一名律师，我会说有法治，一个好的仲裁机制和一个法律系统总是好的，因为它们提高了外资的信心。所以我的建议是，一方面使中国的法律达到最低的国际标准，来激发外资的信心。另一方面，利用好那些曾让中国领先的比较优势。相比那些诉讼多发的国家，这其实是我欣赏中国的一个原因。具体来说，基于信任的社会在签订协议和达成交易方面其实是很有效率的。你不需要在谈判协议时带一个战斗营的律师过来。先相互建立信任，然后谈生意，效率会很高。对诉讼更多发的社会而言，就像Robert Shiller 提到的那样，每二十个人就要有一个律师，这样的社会并不重视在信任的基础上做生意是多么重要。我的建议是在你们的社会中保持这样的信任，因为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旦信任失去了，再找回来就很难。你可以一夜之间失去它，但重建信任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另外，如果失去信任，那你会向美式社会转型，这样的社会中有如此多的律师，以至于叫辆救护车都会有律师跟着你到急诊室，问你需不需要法律服务。我认为如果今天的美国要重新设计法律系统的话，他们不会选择一个像现在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诉讼社会”。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他们事实上很羡慕你们基于信任的社会。所以我要说，保持这种信任基础，但同时要建立按国际标准来看最低的法治，这样跨国公司就有法可依。

丁纯：我们都知道，您在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都有出色的履历。作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女性，您能告诉我们这背后的诀窍吗？人们总是谈论做一名女性领导者的不易，你怎么想呢？

Pauline van der Meer Mohr：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实际上，在荷兰并没有那么多商业或学术领域的女性领导者。如果我们观察整个欧盟的话，荷兰在男女平等上其实根本并不出色，在我所在的大学，只有15% 的教授是女性。我当然希望这个数字能达到50%，但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仍然非常远。对国际商业中的高级管理职位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荷兰的确大大落后。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其中之一是，荷兰有非全职工作的风气，当女性有了孩子的时候，往往选择兼职工作，花一些时间工作，花一些时间陪孩子。结果是，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晋升得比男性更慢，例如在学术领域中，当她们拿到终身教职时已经远远落在男性后面了，发表的论文数量可能少得多。

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改变这种现象，但这种努力在学术领域中很不受欢迎，因为最后在专业任命时学者的年序是决定因素。所以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做一名女性是否有优势呢？当然有。我是说，每个人都看得到你，所以使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并不是难事。同时，你的风格与众不同，这有优势也偶尔会有劣势，因为有时人们不理解这种风格。你必须在工作中投入一些更多的精力。成功有秘笈吗？没有。成功的诀窍因人而异。

对我来说，诀窍是努力工作，每当有一个机会时，一定要抓住它，不要害羞，不要害怕承担风险。有时机遇会有风险，但你的勇气会告诉你“啊，我准备好做这些了”，也许没有，但我得试一试。随时准备好尝试，冒一些风险，找一些能支持你的人。很重要的是家庭的支持，因为如果你的家庭不支持你所做的事，你就会陷入麻烦。同时工作上的支持也很重要。我身边一直有我需要时愿意帮助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希望提供给我共事的人同样的帮助。如果发现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陷入困境，我会尝试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没有什么比发现年轻才俊更令我更感到满足、更有成就感了，不论是有才华的男性还是女性，我都会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

中国应迎接风险大胆改革

记者：Johan Gade



Barry Naughto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事务研究院中国经济学教授。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贸易、金融以及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等问题。诺顿教授著有几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包括《计划外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3 年》（1995 年）和《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2007 年），均广受好评。

「现在明显的挑战不是要降低(在技术方面的)投资——这部分没问题。挑战在于应该放松政府管制，将投资导向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只支持生产一般性科研的新客户。」

记者：Naughton教授，您曾于2004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写了一份关于如何处理经济过热问题的备忘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如果您现在要写信给习近平主席或李克强总理，提出您对中国经济最关心的问题，会是关于什么呢？您的建议又会是怎样呢？

Barry Naughton：我先从 2004 年说起。非常有意思的是，回过头来看，当时确实是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决策质量开始恶化，我遗憾地认为是因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没有听取我的建议。我认为在事实上至少这标志着一段时期的金融压抑和不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开始，这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所以，如果还需我对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做出类似的建议，我会说：中国仍然可以通过推动经济改革议程收获巨大优势。这在三中全会文件

中有提到，但仍然发展不足。特别是，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充分发挥潜能，改善股市，那么也可以改善所有资本市场。中国顺利过渡到新时代，需要新的改革来刺激增长。所以，我会说迎接风险，大胆改革。

记者：您在上海论坛的演讲中，反对使用扩张性措施来重返我们过去几十年里所经历的高速增长。那么增长速度的最低限应该是多少呢？

Barry Naughton：我认为在短期内，4%或5%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通过系统性变革使人民对未来有兴奋和热情，那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几年内有所下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实现起来不容易。

记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周期性循环。当我们进入更温和的增长时期，处理过热问题时的新挑战是什么？政府是否会感到更加棘手？

Barry Naughton：我现在不会太担心过热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而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过于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不得不清除不良资产，他们将会恐慌、抛售资产。所以，我更担心这种下行风险。

记者：在你的著作《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中，你描述了过去几十年里的技术政策和对发展知识经济的尝试。中国正处于其中的哪一阶段？我们需要做什么来继续向前迈进？您之前谈到了高科技泡沫的存在，并认为政府投资是不是未来的方向。政府正在做什么，你认为他们现在该做什么？

Barry Naughton：在技术政策方面，此时的情况与我当时写书时有很大不同。因为技术投资的重大意义在那时刚刚引起轰动，现在我再写这一章就会非常不同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因为他们确实加强了资源投入至人力资本和研发上——众所周知，大学系统的扩展非常迅速。投入方面令人惊叹，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约翰·王和其他在分论坛

上发言的专家的观点，认为中国有独特的机遇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因为增加的资源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又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直接拨款，很多钱被浪费掉了。所以现在明显的挑战不是降低投资——这部分没问题。挑战却在于放松政府管制，让投资流入更创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只支持炮制一般性科研的新客户。

记者：有学者谈论了很多关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中国转向需求驱动经济模式的唯一途径。你同意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会遇到哪些挑战？

Barry Naughton：是的，我同意。讽刺的是，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太过担心可持续性，就连同意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家们也支持非常高的社保缴费率。他们对政府在医疗保健、退休等方面的责任非常谨慎——在财政政策方面太过小心翼翼。他们太专注于确保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在未来二十至三十年里的可持续性。我觉得现在不是担心这类问题的时候。考虑到年龄结构的快速变化，不愿花太多钱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收入增长迅速，中国不再像以前一样贫穷。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投入比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要少得多。不过，我在今天上午的谈话中也简要说过，储备一些也是有道理的，以防将来需要迅速展开。

记者：中国对教育有大量投入，在你的发言中也提到了“管理预期”。如今很多年轻人以更好的教育背景毕业，导致他们对工作有了一定的期望。考虑到将来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的经济放缓，政府该如何确保提供能吸引人的职位，以满足他们的期望？

Barry Naughton：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觉得没有简单的答案。一个有趣的挑战是，对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预期差距真的存在。他们真的想，好吧，我成功考上大学，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该有好的工作在等着我。无论是好是坏，美国和欧洲的学生不这样想。他们明白要找到好工作很难，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学生知道在生命的长河里有许多不同的职业选择，即使不能立刻走上最快的捷径，也并不太坏。如果政府能与毕业生们

沟通，告诉他们世事艰难，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机会，只要自己努力争取。中国的大学教育在这个道理上教得不是很好。然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创新和创业精神是一流的，这是好事。

记者：有些人认为除非市场上有更多的创业空间和更创新、规模更小的公司，否则仍愿意坚持在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以求稳定，有些人对此表示十分担忧。你认为这是否是件值得担心的事？

Barry Naughton：是的，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点。在我常去访问的清华大学，去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毕业生比例相当惊人。大约在三分之二。我认为这确实是人力资本的浪费。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和有创造力的。当然，聪明的人在高层管理岗位甚至在政府部门，是件好事，但我认为如果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去更有创造性的岗位，可以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上海自由贸易区于去年秋天设立。有人把它与经济特区的设立相比较，而有些人在实际计划实施后表示有点失望。你认为它对中国和上海的意义是什么？

Barry Naughton：这要复杂得多，我认为自己了解得还不够，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具体实施很重要，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进度有点慢，但我并不感到失望。在金融自由化时，谨慎一些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还是采取等待和观望的态度。

记者：今天上午，你将中国的增长放缓与其它东亚经济体的经验相比较。与这些经济体相比，你怎么看中国整个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我们可以期待在中国有类似的发展吗？

Barry Naughton：所有这些其它的经济体，当他们走到向中等收入过渡阶段时，政府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大的转变。政府退后一步，对社会影响有更开放的态度，包括通过民主化；政府的政策也更加软着陆。所以如果看一下早期国家的经验，可以说这是一个规律。这是一个强势模式。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看不到这点。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细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它大概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它说，我们应该重新界定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具体成果和具体的政策领域，如技术等，我们仍然只是在谈论，还是看不到它。

上海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需关注软实力

记者：关赫楠



陈振光

先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1989 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资深会员，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地理学会理事长(1999-2001)，香港商场管理学会荣誉会员，澳门城市规划学会创会会员及监理事。现任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研究)及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副教授，博士生

导师。从事城市、区域发展及规划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 80 年代开始赴中国内地进行调查研究。

「软实力的竞争力是中国发展轨迹里必须面对的考验和挑战，它提供了一个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不同角度探索的平台。」

记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 2012 年发布的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的报告中上海仅名列第四十三位，根据您以前发表的《都市治理与上海的全球竞争力优势》，您认为上海目前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

陈振光：这个研究主要针对在 2005 年左右探索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沿海城市里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以上海为例来提供一个思路解释这个情况。上海的发展是有历史渊源的，1918 年以前上海是整个亚洲地区的领头羊，是东方的芝加哥，现在外滩还有很多那个时候的建筑保留下来。之后的 90 年代，中国在整个长江和沿海地带提出的 T 型发展战略的交叉点就在上海。上海在地

理区位上有很大优势，浙江省、江苏省和整个长江流域整体为上海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们的研究是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水平的情况下，在全球竞争力的视角下，对全球十五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对比。超越了像 GDP、失业率等一般经济发展的硬指标，我们探索的是一些软实力的数据。软实力最初提出时参照了一些西方大城市的发展经验，但是走到今天软实力的竞争力是中国发展轨迹里必须面对的考验和挑战，它提供了一个对城市竞争力进行不同角度探索的平台。“软实力的探究”这一概念很简单，比如说进行人的数目的收集，收集各个城市到博物馆、艺术馆去参观的人数等。后工业化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软实力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创新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像纽约和巴黎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它们的核心生命力来自于城市的创新力。

我们对上海工业园区进行研究，看上海如何通过创业产业园区的发展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上海工业园区的发展主要在于政府怎样去争取经济空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工业园区，再到高技术园区，最后到产业园区这四个阶段。整个八九十年代，上海进行陆家嘴、浦东和张江等经济开发区、高技术园区的发展，透过周围两省的推动作用来提升地方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没有脱离传统的经济投资发展模式，2000 年以后地方政府才慢慢开始通过创意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我对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持保留意见，上海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开放自贸区最大的问题是它没有脱离过去二十年已经发展出来的模式，可能不能立竿见影地拿出成绩。

软实力还包括社会公义公平的问题，香港 2003 年以后开放内地旅客去香港，一方面支持了香港的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十年过去，这种开放抬升了香港的本土主义，像奶粉这种基本生活需求品的供应也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我们探索的是怎样把一些如公平程度的软实力指标贯穿在城市以及城市发展的研究过程中。软实力是很难直接定量分析的，它涉及到很多细节的方面比如生活的质量，比如饮用水的卫生问题，喝了会不会生病，这些都很难去直接比较。但是比如最近一两个月，东欧的暴雨问题，就显示了它的基础设施地下排水做得比较好，即使是五十年一遇的大雨对居民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另一些地方发生这个问题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多不方便。如果没有五十年一遇的暴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软实力问题可能不会浮现，但如今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您主要侧重城市创新产业方面软实力的研究，能具体谈谈吗？

陈振光：从创新工业园区和产业带动经济的角度看，创业产业在管制比较松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举个例子，创新园区涉及到定期交租、固定的开放时间以及需要面向参观者开放种种问题，我们要在创新园区面临的问题中寻找一个解决的平衡点。创新园区不是一个时髦的概念，它在西方已经提出并且探索实施很多年了，中国的创业园区应该走中国道路，利用本身的优势去发展。还有管制问题，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念，例如西部 2010 年提出创新产业的想法，但现在还是以房地产发展为主，所以针对短中长期不同阶段，我们要研究怎样用不同的管制方式去配合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但就上海问题来说，它跟周边姊妹城市相关关系也是一个敏感问题，高铁通车后空间地理的压缩，也带来了过去三十年浦东开发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城市之间的互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间产生的问题是上海的承担能力到底有多大。

记者：香港的地理区位和金融都市的定位都和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香港的城市发展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陈振光：中国大陆的情况和香港及很多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同，发展经验很难借鉴。香港和上海最主要的不同是香港有一个界限在那里，可以强调和周围地区是两种制度模式，所以香港没有上海那么大的腹地，也没有上海那么多的农村人口负担。上海和它周边的大城市关系比较紧密，从地理区位来讲上海的郊区可能就是昆山的核心地段，从人口负担来讲类似于欧盟提出的社会连接度。人口流动到上海虽然推动了上海的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和当地产生了不小的摩擦。这种和周边城市的互动关系怎么去理顺，香港的发展恐怕不能提供很好的经验。至于公共交通等城市建设方面的解决经验香港是有的，但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经验。香港从七十年代香港人口还比较少的时候开始修建地铁，地下交通的运营成本是通过地铁站台周边的房地产发展去支持的，用站台上房地产的开发赚的钱来解决地铁更新等问题。这种经营的

模式是非常成功，全世界的地铁系统不亏本的很少，像香港这样能赚钱的更是绝无仅有的。但它同时带来的问题就是香港的发展是高密度的发展，香港的住房情况横向和同期的北京、广州对比是不太理想的。香港总面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开发用地不到百分之二十三，住宅用地不到百分之七，七百万人口集中在非常小的一块区域，使香港的住房更像是一个箱子。香港的城市发展在当时的格局下是推动经济发展、经济转型的一个手段，我们认同香港的案例，但它不一定是一种聪明的发展模式，它的发展经验也不一定适合在其他大城市里去推广，香港这个城市更像是一个机器，它盯着经济发展，没有其他使命，但上海是一个比较庞大经济组织里的一部分。尽管同样是相对密集的情况，上海跟新加坡这样的城市也不同，新加坡没有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总之，参考香港的经验之前要进行谨慎的分析研究。

记者：您能从您研究的侧面对上海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吗？

陈振光：我认为上海可以关注如何协调地把民众的不同意见融合在一起，让全民参与相关政策的决议。没有老百姓参与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没有拥有的感觉，是一种表面上发展。从中长期来说，如果能深入地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发展有参与和讨论，老百姓可能更支持这种发展。

互动解密：形成过程中的中美关系

记者：Laura Natrop



张克斯 (Christopher K. Johnson)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部主席，杰出的亚洲事务专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和外交事务部门工作了近二十年，对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各类跨国问题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中国大国关系的新风格在其内部存在矛盾。国际观察家认识到，中国有自己的利益，就像任何其他国家都有利益一样。」

记者：您能解释一下“大国关系的新模式”吗？两国不动声色地采取措施来（对抗）平衡彼此的影响力和权力，会对新型大国关系有什么影响？到底“新型大国关系”对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衡意味着什么？

张克斯：让我们先讨论第二个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是，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他明白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崛起的大国与老牌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会面不总是特别好，当然美国的领导人也赞同这点，我们确实也希望避免与亚洲发生冲突。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做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为打造这种“关系”而做出持久努力的意愿，这比所有的日常战术对抗都重要。我认为这种做法最突出的表现是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军队的命令，要求将军事对抗提升为军事关系。所以这显然是非常令人鼓舞和充满希望的。我认为通过这点我们可以看见另一方面，即中国在这种理念下的追求，基本上是操纵美国的默许以满

足中国的各种需求。王毅外长，在三月份开新闻发布会时描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即，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互不干涉他国内政，我想基本上都是在说中国的核心利益，并没有列出美国所关心的问题，如全球规则 and 标准等等。所以我认为此时这个理念还不成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现在的问题是，两国的重要人士，是否都已产生足够重视，愿意为之做一些事情。正如大卫先生在今天的中美关系分论坛上所提到的，这是一个领导者层面讨论的问题，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分量谈论这一点。

记者：亚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CICA)本周在上海举行，提出与亚洲更广泛地合作。你认为中国的战略方向为何从注重经济发展的低调姿态转向积极加入亚洲安全合作？你认为为什么亚洲需要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会议上所提出的新的安全概念？

张克斯：这有多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美国再平衡亚洲战略的看法，以及美方实施此政策的时机；中国在那段时间的博弈意味着推迟对其的内部评估。他们想顺利地领导层换届：胡锦涛主席即将卸任，他肯定不希望束缚继任者的手脚；习近平主席即将上任，注定不会逾越界限。我对中国怎样处理这种评估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像亚信峰会这样的活动反映了中国的态度：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阻碍中国崛起的主要障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习主席关于亚洲安全观的讲话也充分反映出这一观点。如果他能够在阐释并保持这种观点时表露出“我们当然承认美国的角色”的意思，那本来会大有帮助。我认为这是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习近平在全会后的公共讲话中明确表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安全，二者不可分离。这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重视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并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原因。它可能会稍微向国内安全倾斜一点，但是国际安全绝对不容忽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观点：习近平及其周围的人都认为全会以后国内安全问题部分已经就绪，应该就国内、国际安全问题发表一下意见。有趣的是，尽管中国国内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他们却能很好地处理强劲的外交政策。

记者：中国近日试图提升 ASEAN+6（东盟+六国）和 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地区分量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作为对日本加入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会谈的回应。在中国，对美国企图通过 TPP 来遏制中国的指责不绝于耳。你认为到什么程度，TPP 算是一种遏制或者至少抵消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张克斯：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们从中国 18 个月前对 TPP 的反应上开始看出来了。中国关于 TPP 的一系列反应就是在说 TPP 来破坏中国发展和遏制中国经济的。现在可以听到中方表达出更多虽然算不上正面但更中立的评论。我认为这正如对双边投资协定的期待一样，开始理解 TPP 将促使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至符合加入 TPP 标准，这正是他们为了国内发展所要做出努力的。这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入 WTO 的情形一样，当时前总理朱镕基借助外力解决当时国内环境下无力处理的困难。所以中国现在加入 TPP 的环境正在改善。尽管如你所指出的，他们明白日本这么做不是为了经济原因，而是地缘战略原因。但值得再提的是，这可以加快他们转向标准水平的进程，对国内经济有益。中国方法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他们开始强调 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与 TPP 的相等地位。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同样认识到，当他们在安全领域活动时，最好再逼奥巴马退一步。同样，美日在 TPP 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正好为中国打开缺口，并且他们还想更进一步。

记者：近日奥巴马总统与安倍晋三首相、朴槿惠总统在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会面，以期进一步拉近美国亚太地区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关系。对此，中国是如何反应的？

张克斯：我认为中国从几个角度来解读海牙三方会谈。一方面，中国一直将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同盟关系视作冷战思维的表现，因而此次海牙会谈中国必定会担忧。但是另一方面，韩国和日本要在美国的斡旋下才能坐在一起，这点应该令中国比较宽慰，因为中国最担心美日韩三方安全联盟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紧密合作。所以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方面。

记者：奥巴马近期去亚洲访问时，不仅重申要进一步拉近韩国和日本的关系，还给日本吃定心丸，全力支持日本使用集体自卫权。中国对美国的这些做法，是怎样反应的？而且，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如果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对于亚太地区将意味着什么？特别是鉴于日本敏感的历史，中国对日本的意图以及美国对其全力支持的态度将如何反应？

张克斯：中国对于安倍的安全议程十分怀疑。中国认为日本本质上是为了谋求重新军事化。有趣的是，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看清了安倍晋三的本质，安倍的重点不是经济而是安防。因而，安倍为了保住位子必须发展经济。但他本能知道其个人目标是谋求集体自卫权，因而改写了日本宪法。这样一来，安倍得到了美国的关注，因为他做了美国 50 年来一直想要让日本所做的事情，比如通过保密法律，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当然这些方面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大的隐忧。

记者：奥巴马在同一场行程中访问了菲律宾，并签署了允许更多美国军队在菲律宾驻扎的协议。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同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东亚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即使涉及到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和自身利益，美国能够行为公正吗？如果不能，在中国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或双边事务的情况下，这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克斯：我们已经在刚刚的分论坛中集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在重申同盟关系的同时保持该区域的策略性平衡？”我认为，最基本地，美国政府应该在管理同中国的关系的两种方式中做出选择。你要么与区域内同盟和伙伴合作，从外部影响中国的行动和路线，要么强调中美关系，从内部发挥影响，然后管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中国在发展和崛起，美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在两条路中做出选择。因为双方同时需要你去巩固加强，这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果我们将要在双边协议中做出特别的政策选择，不管是和菲律宾、日本还是中国，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到区域内其他选手会如何对待这项决定。假如副总统拜登前来拜访中国，并表示赞同结成新型强

国关系，这不仅会引起日本，还会引起区域内其他力量的极大担忧。主要由于他们感觉如今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剩下他们薄弱无助。美国的力量从来都是直线式，很难成为大家伙，但有时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此你就必须保持倾听，倾听自己说了什么，观察自己做了什么，因为他们会自己琢磨，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除非你向他们解释你在说什么和做什么。

记者：你怎么看西方批评中国在国际秩序上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张克斯：我认为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国际观察家们理解中国 and 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我们也必须理解各国追求自己利益是很正常的。所谓中美两国共同遵守一系列国际制度和准则，并共同领导世界的 G2（中美两国集团）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无可喜之处。中国人不会同意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这么做，中国将承担巨大的责任，浪费大量资源。所以客观地评价中国对这些事务的反应就会发现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讲得通的。很显然，我们不会赞同中国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调整我们对中国的期望值。这样的挑战不仅存在于中国与周围邻国交往中，还存在于中国对非政策中。中国在非洲倾注的资本远比欧美多，但是在软实力较量方面却比不过欧美，这点让中国很郁闷。诸如软实力，或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概念并不是中国文化固有内涵，所以中国仍在探究这些概念。相反，中国的文化崇尚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因而中国人还在学习全球公共所有这样的概念。

保持人们对环保的关注

记者：刘璐茜



Dan Greenbaum

健康影响研究所所长及首席执行官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五年内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或英国做得快，但是要做的不仅是设立法律法规，还要实施并执行这些规定，确保每个人都遵守规定。」

记者：您是健康影响研究所的所长，贵所研究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随着医疗的发展，在当今，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依然重要吗？

Dan Greenbaum：非常重要。我们目前发现，随着人们的寿命增加，会出现许多心脏疾病症状。如果他们暴露在空气污染中，心脏疾病的严重性会导致他们寿命减少数年。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我们可以治疗哮喘，但是空气污染严重时，哮喘病人非常不适。对于比较敏感的病人，即使是最好的治疗也无法阻止哮喘发作。

记者：您认为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环保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Dan Greenbaum：我认为，过去五年内，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些重要行

动，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建立 PM2.5 等细颗粒标准，在许多城市建立 PM2.5 的监测系统，公布网络数据信息的过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起步措施，能够实现更好的空气质量管理。中国政府做的第二件事是要求北京、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大城市在未来五年内采取重大措施减少现有的污染。第三点，目前中国承诺提高汽油和燃油质量，这一点能推动更为清洁的汽车在中国销售。

我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几点措施。首先，应该记住，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五年内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中国可能会比美国或英国做得快，但是要做的不仅是设立法律法规，还要实施并执行这些规定，确保每个人都遵守规定。第二点是，目前还可以采取更多行动，例如燃煤发电厂的下一代控制。“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都提出控制发电厂的步骤，但是还可以采取更多行动。

记者：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带来哪些好处呢？

Dan Greenbaum：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合作。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在发展监测系统方面有很多经验。目前在上海建立的“Air Now”（“实时空气”）系统是与美国环保署共同建立的，该系统告诉人们每天空气质量如何，是否应该留在室内等问题。另外，我认为净化空气需要许多有技术相关经验的政府官员和私营公司，中国企业有很多机会可以从中学习，和这些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最终在中国开发出自己的控制污染新技术，这是件好事。

记者：除了技术企业外，其他企业可以做些什么呢？

Dan Greenbaum：嗯，我觉得有个挑战是，政府制定更多规则要求改善现状时，许多行业和企业会抵制这些规则。他们会施加政治压力，说，这不行，太费钱了。但是有时候，有的公司能够看到，实施更清洁技术的政策实际上是对他们有利的。

记者：如果是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呢？

Dan Greenbaum：嗯，利益冲突总是有的。这一点一直很难。典型的例

子是石油行业，这一点不仅仅中国是这样，无论是中石化和印尼、墨西哥的国有石油企业，还是国际石油企业，都是这样。确实需要让他们改变自己的炼油体系，让燃料更清洁。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法在其他方面进行提高。即使是在美国，二十多年来也一直就进行这一改变争论不休。中国的好消息是，最近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同意在 2017 年前大幅度提高其燃油质量，这是很快的。

记者：巴黎气候大会将于 2015 年举行。您期待它带来什么改变呢？

Dan Greenbaum：我认为气候是个很困难的领域，因为中国和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认为美国没有实质性的努力，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一点目前在美国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更严格了，美国也首次准备对发电厂排放采取更为严格、可执行的行动。所以希望这样能让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类似国家说，好，或许我们也该考虑采取行动了，更多的是合作意义而不是竞争意义上的。

记者：您认为在美国推动改变的是什么呢？

Dan Greenbaum：在美国，我认为有三件事。科学越来越强大，空气越来越不清洁，人们比以往都更担心气候变化，同时，现在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在谈论，我们必须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了。

记者：您认为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在环保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Dan Greenbaum：我认为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可以持续提醒政府决策者，告诉他们有必要采取行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与他国有所不同，但是我了解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做的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而且也从实际上做一些非常仔细的分析，研究政府在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能够采取的最符合成本效益的行动。而且他们也在把这类的分析呈现给政府机构。有时候，外界组织和大学能够以政府官员无法做到的方式进行这类分析，因为后者更加受限制。因此有时实际上是复旦或者清华或者其他地

方的科学家在进行分析、带来改变。

记者：同时我们也发现，很难唤起公众的环保意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宣传教育人们呢？

Dan Greenbaum：嗯，举个例子，我认为当前有一点是，空气质量报告能够立马告诉人们空气污染是不好的，有助于引发人们的关注。说实话，中国政府过去五年采取行动的部分原因在于非常严重、可见的污染。同时还有民间的关注，不是非政府机构组织的，而仅仅是因为许多人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但是面临的挑战是，空气污染不是每天都那么严重的，我认为，保持人们的持续关注是更加困难的部分。第二件事是，如果在中国有一些群体，如哮喘病人，在空气不好的日子特别痛苦，要确保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渠道传播他们的故事，这样一来能够得到人民的关注。一个无法出门玩耍却要去医院的小孩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有时也比统计数据更有影响力。

记者：讽刺的是，我们边抱怨空气污染边污染空气，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哮喘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让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为自己采取行动呢？

Dan Greenbaum：对，首先，你知道，可能有时空气污染会导致人们患上更多疾病，即便他们没有哮喘。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在美国，有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老式柴油巴士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总是需要洗衣服、洗窗户和所有东西。而且我认为，人们最初认为他们必须做些事情，是因为对经济有利，能让他们有工作，但随着人们得到更多的财富，他们会更愿意说，等等，是不是用这个办法做会更好？

记者：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在不久的将来是否可以开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友好的经济发展道路？

Dan Greenbaum：当然可以了。一旦开始提出要实现这点的明确信号，就能做到。如果政府采取具体行动，说我们希望所有某几类的工厂在某一日

期前变得更清洁，该行业就会意识到要开始投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符合该规则。随之而来的是新技术的发展、创新和新思想。曾经有个时候，人们希望汽车能够够清洁，这些汽车，这些控制设备中安装了催化转换器。但是早上启动车辆时，该设备并不能良好运转，还没有热起来。那么规则建议的就是能不能够使催化转换器更快地热起来，许多制造商说我们做不到，要在催化转换器上加电热器，太复杂太昂贵了。但是有一家公司，也就是本田，说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催化转换器，把它安装在离发动机更近的地方，使它更快地加热起来，这几乎不需要增加多少成本。一旦他们站出来说他们做得到，那么许多其他的制造商也开始说，哦，如果他们做得到这点，那他们就会省下钱，而我们则会损失许多业务，所以我们最好也能做到。因此，有时政府建立明确规则时，私营部门将会带来最有效率最有用的污染控制方式。污染是浪费，是被扔掉的东西。而效率是防止污染，用这些东西来创造电力、产品等东西。因此，聪明的企业会在整个运营过程中找到更有效率的方式，而不是仅仅在管道端口控制污染。

中国碳市场设计与实践

记者：李想



段茂盛

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同时于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第二学士学位，任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委员，主席。

「中国碳市场的建立初期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只要我们设计的机制是正确的，总有趋向于完美的那一天。」

记者：碳市场分为履约市场与自愿市场，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的份额是否有所改变？哪一种市场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

段茂盛：一直以来履约市场都是比较大的市场，自愿市场一直都比较小。比如我们现在的碳试点就属于一种强制性的履约市场。自愿市场有一定的发展前景，但是总的来说空间较小。如果企业缺乏强制的压力，那么他去参与碳市场的动力完全来源于自己的积极性和对节能减排的认识，但约束力有限。所以履约市场一直是碳交易市场中的一个大头，无论在欧盟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在近期也不会发生改变。

记者：您曾经担任过 CDM（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主席，请问 CDM 机制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中国有哪些贡献，对中国碳市场的建立提供了哪些帮助？

段茂盛：从 CDM 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对中国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无论对企业还是政府，CDM 帮助他们增加了一种资金的来源和收入。比如我们国家使用来自 CDM 的企业收入建立了一个 CDM 基金。根据 CDM 基金管理中心的网站发的年度报告，截止 2013 年底，该基金总量已经超过 100 亿，而政府从企业的一部分项目中收取的资金都能有 100 多亿的话，可想而知企业在其中的获利肯定更高。

但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在非资金收入方面对我们的贡献。我们这几年企业、个人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提高了，一方面是归功于我们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归功于 CDM。CDM 可以渗透到各个角落去吸引别人关注气候变化的项目，从而使别人有动力去主动了解气候变化的问题，其中企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次我们搞试点，试点里面遇到的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没有数据，而数据是经由各个企业自己统计起来的，这就要求企业内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统计体系。很多企业在做 CDM 之前，它内部的管理体系其实是非常差的，比如我们一些节能项目、钢铁厂、水泥厂等等，但是一旦加入 CDM 之后，这些企业便被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统计体系去核算能量的消耗和排放等各项指标。所以 CDM 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提高了内部的管理能力，这种管理能力在我们试点的时候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的能力，碳市场的试点抛开质量不谈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第二，我们现在有很多核查企业的机构，以前做 DOE（CDM 机制中的审核机构）的这些机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在 CDM 咨询公司中担任核查员的个人在碳市场的建设中运用了在 CDM 中所积累的经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外还有很多原先做 CDM 的服务机构，与企业有很多接触，推动了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优化，在核查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都只是 CDM 针对试点地区的帮助。对于非试点地区来说，将来我们要建全国的市场要求每个地区都要有相关的部门，而我们 CDM 项目在非试点的地区分布更多，所以无论在试点市场还是在全国的市场中 CDM 都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记者：相比美国、欧盟、韩国、新西兰等国的碳交易市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具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能从先例中吸取哪些经验？

段茂盛：先说能够吸取哪些经验，首先一个碳市场的要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建立一个碳市场总要先设立总量，再规定哪些企业、设施要参加进来。其次确定怎么样去分配指标，是免费还是强制，如果免费则通过哪种手段。另外还要明确怎么样去统计、核查它的排放，怎样去做最终的评估，如果违约怎么处理，还包括建立起一套财务制度来支持整个交易体系。这些基本要素各个不同的碳市场都具备，差异存在于具体问题上，比如排放上限。欧洲的排放上限很清楚，欧洲各国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第二承诺期的缔约方，他们已经有一套指标，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排放上限，就可以把京都议定书的上限直接分到 ETS（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上，而中国就需要先制定一个排放上限，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第二就是指标的分配，用到的方法都差不多，但合不合理，工业界能不能接受，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情况。因为一个企业不仅仅面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还需面对节能等各种政策，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要考虑到企业能否满足不同政策的要求，简单的说，政策之间不要打架。比如电力部门，发电厂上网电价是政府控制，发多少电是年度计划定好的，假如设一个绝对量的排放上限根本不可行。如果政府给了企业很多约束，但是没有可行解，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面临的特殊情况之一。

另外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非常复杂的，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对于国有企业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处罚权在中央政府那里，这也是试点中碰到的很大的问题。无论是试点还是将来要建立起来的全球市场，怎么样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是我们亟需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面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在别国的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某项政策，能否适用于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记者：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制度缺失是否会使得违约成本变得很低进而引发市场的混乱？如何解决？

段茂盛：现在中国进行了七个试点，其中有六个启动，只有北京和深圳有法律依据。两地的人大常委会出了一个决定，可以对违约企业进行一个违规部分 3 至 5 倍的罚款，从这两个地方来说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其他五个如果没有在人大层面立法，地方政府即使可以去罚款，也不能想罚多少罚多少，

需要根据中国的《行政许可法》。该法规定让地方人大常委会审定罚款的数额，大多都是 3~15 万，对于企业来说没有什么影响。这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在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件事。所以中国就有很多发明，比如说在很多试点的地方，节能的主管部门和 ETS 的主管部门是同一个部门——发改委。如果你不去遵守我关于 ETS 的相关决定，我就不允许你申请在节能部分的优惠资金，即通过别的手段进行制约。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国企业的特点，采取一种合适的措施，不能照搬欧盟。但这并不是说要满足于没有法律基础的现状，而是要在现有的情况下做得更好。

记者：从宏观上来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碳交易市场还相对独立，今后是否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市场？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做哪些努力？

段茂盛：这个是一个一直被讨论的问题。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时候其实只有欧盟的 ETS，通过 CDM 这个统一的规则来连接，基本上是一个间接的统一全球市场，而现在就更多倾向于各干各的。因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京都议定书或者在公约下达成关于市场机制的协议，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但是从 2007 年的巴厘岛会议之后一直没有达成这个协议，所以就各自为营。在全球层面，自上而下的手段已经失败了，在联合国那边到现在为止没有谈成，但是 2015 年我们会在巴黎谈一个关于 2020 年之后的一个协议，如果谈成，那么自上而下的手段就复活了。如果谈不成的话，就要考虑怎样把分散的市场联系起来，不过这个过程是痛苦而又漫长的，各个地方的规则都不一样，不是三年五年能够完成的。

记者：国际上对于中国碳市场的评价如何？

段茂盛：从国际上来说，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进展，正面的评价非常多，但同时有些人指出现存市场有很多缺陷，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中国碳市场的建立初期不可能是完美的，欧盟的碳市场建立了 10 年仍然是不完美的，但只要我们设计的机制是正确的，没有大的漏洞，让它先运行起来，再不断地通过实践去完善，总有趋向于完美的那一天。

Gavin Willis Jones：中国应取消对生育的所有限制

记者：刘书文



Gavin Willis Jones

新加坡国立大学 JY Pillay 比较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在社会学系任职。他最近的研究关注婚姻和生育的决定因素、老龄化问题和城市化。

「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较低，最佳选择是取消所有限制，监控事态发展。」

记者：90年代早期，您已经注意到亚洲持续的人口结构转型，今天依然在继续。您当时是怎么注意到这一转型的？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您能概述一下这期间的人口结构转型吗？

Gavin Willis Jones：如果你当时追踪这些国家的生育，那么人口转型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并没有很多数据来源。例如，如果想要追踪生育率，就需要出生登记。有些国家有，但是很多国家没有。所以没有良好的出生登记，研究生育的唯一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普查，如人口与健康普查或者统计。由于其每隔几年进行一次，在间隔期间，便不知道事态的发展。人口学家在了解现状方面总是有点落后。

亚洲的生育率基本都在下降，这或多或少是普遍模式（除了非洲部分地区）。过去十年，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长期来看能够取代现有人口。但是中国的人口并没有下降，因为年龄结构还没有完全符合生育趋势。因此中国的人口持续缓慢增长，但是年轻成人人口一段时间以来都在下降，预计劳动年龄人口整体将从大约2020年开始下降，总人口数量届时也将开始下降。

记者：从您的早期工作来看，您提到，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是特例。您能具体谈谈这一点吗？

Gavin Willis Jones：中国之所以是特例的一点是，尽管中国的平均结婚年龄一直在上升，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甚至泰国和缅甸）之间的差别非常大。中国的结婚年龄虽然有上升，但是是在二十几岁的阶段上升的，几乎所有女性在三十岁之前都结婚了。而其他东亚国家，许多女性的结婚年龄都被推到30岁以上，约30%的30岁初女性是单身，日本、泰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目前也有10-15%的女性四十几岁依然单身，这已经是在其生育年龄的晚期了。这与中国非常不同。其中一个原因似乎是中国父母觉得如果他们的女儿在三十岁之前没有结婚就是个大问题，而在其他国家，人们已经习惯了很多女性在三十几岁的时候依然单身。有趣的是，尽管儒家思维方式可能处处影响着中国人，但是移民到其他亚洲国家的中国人并没有遵循国内的模式。许多人到年纪很大了才结婚，或者甚至不结婚。香港和台湾同样也有非常多的晚婚情况。所以，我认为这与在中国是有关的，因为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中国人的结婚模式似乎已经有所改变。当然，除了文化之外，这一现象也与经济情况（工作机会、教育等）有关。

记者：去年中国用二胎政策取代了独生子女政策，即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其家庭的独生子女，那么他们可以生两个孩子。您对此有何看法？

Gavin Willis Jones：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是有限的，只有在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时候才能生二胎，不是每个人都能生二胎。我想这个变化是不是因为政府意识到低生育率会引起问题，例如劳动力人数的减少。他们非常谨慎。许多人担心如果放开生育，生育率就会飞速上升。不过，我认为这并不会发生。许多证据表明，至少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和较为富裕的地区，许多人不再想要两个孩子了。在一些乡村地区，如果完全放开生育规定，生育率可能会有所上升。我认为中国如果完全取消限制政策，生育率会小幅上升，不会大幅度上升。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记者：有些学者之所以主张限制每对夫妻生孩子的数量不仅仅与生育率有关，而且与“人才库萎缩”有关，因为开放自由生育将会拉大精英夫妇和农村夫妇所生育孩子数量的差距，数据证明，接受较高等教育的夫妇倾向于生较少的孩子。这样一来，人口素质就成了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Gavin Willis Jones：如果我们看到教育程度较低和农村地区生的孩子数量较多，那么我认为要做的就是提高他们的条件，改善他们的教育，而不是限制他们生孩子。至于人才库的萎缩，新加坡也担心这一问题。

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 1983 年说过，新加坡可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人才库的萎缩”。他非常担心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不婚不育。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无论孩子是谁，都要给他们机会发展。如果他们更多地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那这并不一定会限制人才的发展。穷人也可以有聪明和有潜力的孩子，尽管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确实可能提供环境让孩子发展得更好。我们要做的是提供环境使所有的孩子都能发展。如果限制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少生孩子，而鼓励受教育人群多生孩子，那么这是具有歧视性的。

中国的低生育确实是个问题，政策早就该改变了。开放政策，让人们随心所欲地决定生孩子的数量，似乎是最佳的办法。我认为生育率不会过高。至于谁会多生，让我们拭目以待。政府的工作是应该试图让孩子们成长环境更为公平，不论他们的父母是谁。可能听起来有点理想化，但是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您的研究提到，欧洲在结婚和生育率严重下降之后又有了回升。您认为中国是否会面临类似的回升呢？您认为在中国，生育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Gavin Willis Jones：出现回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目前在欧洲，只有小幅度回升的证据。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速度效应，即如果一直晚婚，那么到某一年，即使人们生育的孩子数量是相同的，但是生育率还是会上升。这是时间方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似乎是欧洲的情况。除此之外，如果看一看人们生孩子时的情况。在生育率较高的欧洲国家，法律规定的设

置使在职女性更容易协调工作与家庭，她们的丈夫或伴侣在育儿方面倾向于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东亚国家，想要追求职业发展且接受了教育能够获得良好的工作机会的女性依然面临平衡孩子和事业的问题：她们必须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工作，因为传统上丈夫的角色不在这些方面，且工作环境也对家庭不是那么友好。所以我认为东亚如果不改变这些情况，生育率就不大可能上升。此外，尽管一些国家采取政策提高生育率，例如提供父母产假（例如新加坡目前给母亲提供4个月的产假，给父亲提供一个月的产假），但是这与斯堪的纳维亚岛的国家相比起来依然较少，这些国家的产假更长，对职业父母提供更多的保育服务，工作地点更为灵活。东亚国家正走在提升生育率的正确道路，但是他们依然要做很多工作。总而言之，我对东亚大幅度提高生育率并不是很乐观。人口规模一定会下降的，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会大幅度下降（日本、韩国、泰国、台湾等）。

然而，人口数量下降并不一定是个灾难，总是有办法适应这种变化的。例如，人口规模下降至少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被移民抵消，尽管这些国家不想移民。（不过，目前日本的态度似乎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认为移民将成为重要因素，我在论坛上也曾长篇讨论过这一问题。在中国，来自国外的移民并不是很多，但是国内的劳动力大量流动，未来五年的新政策将颁发1亿户口，比过去的数量高出很多。有意地提高可以成为真正城市居民的农村-城市移民的比例这一政策是很好的。当然这是有限制的，但是也不能进行得太快。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大城市无法接受这样大的人口增长，但是实际上，即使是为了维持人口规模，城市也必须接受来自农村的移民，因为城市的生育率非常低。例如，如果没有接受移民的话，上海的人口数量早已下降了，就像日本一样，而且会下降得更快。对中国所有大城市来说都是这样。另外，人们应该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如果他们在别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机会，应该自由迁移并从中受益。我不是中国移民模式专家，但是“户口”系统确实似乎是歧视性的，因此可以逐渐取消这一制度。

记者：如果让您给中国提出人口政策的意见，您会给出什么意见呢？

Gavin Willis Jones：在生育方面，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限制，监测事态发展。尽管中国的人口学家对此没有完全同意，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目前的限

制取消，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要知道 2013 年的二胎政策依然是限制性的。）如果生育率小幅上升，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目前的生育率太低了。

关于城市发展政策，存在的危险是，许多大城市人口扩张的政策可能会以消耗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资源来推动这一增长。中国的人口数量很快会开始下降。尽管 50%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乡村地区，而且其中许多人可能进城，但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无限劳动力供应”情况了。年轻的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工资在增长，劳动力比以前更缺乏了。在未来，期待所有城市持续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

政府要更多地做“裁判”，而非“运动员”

记者：潘瑞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任教专业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主持翻译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著有《经济增长：席卷全球的 20 世纪进程》。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场外的监督者。扮演“裁判”的角色，要充分监控场外的四边，但不要过分进入场内当“运动员”。」

记者：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您认为金融市场应如何避免泡沫过度膨胀，更好发挥其社会服务的功能？

贺力平：即使没有金融活动，只要有市场交易就可能产生泡沫。但在有金融信贷的情况下，这个泡沫可能会做得很大。有没有泡沫、泡沫有多大，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整个社会怎样看待风险，是与社会上的认识有关，和金融业的发达程度没有必然联系。2007 年六月我国股市的泡沫很大，这就是很多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不够导致的。

其次，小微企业的发展是现在社会的趋势，金融服务应该大力扶持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和支付。小微企业有合伙制，也有公司制，若采取上市发债的方式融资，金融服务业应给予扶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不能把小微企业当成扶贫对象，要考虑市场化原则。

另外，金融业还要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工具和产品的研发应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的需要。尽管可能会出现新的风险，但金融机构不能坐享其成，而是应该积极竞争，通过创新努力克服现有问题的阻碍。

记者：目前在中国影响日益增大的互联网金融加剧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您认为应该如何管控这些金融风险？

贺力平：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金融交易工具和平台，是新生的事物，在其发展初期会有集聚效应，进入成本比较低，不排除一些欺诈行为的存在。对此应辩证地看，一方面不能采取全面封杀的手段，要让社会成员增强识别优劣的能力，建立起监管的标准，完善逐步筛选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应采取相对中间性的对策，政策也要减少过分的摇摆。

债券市场要有政府、评级机构和投资者的监管，才能规范透明得多。另外，违约其实是好事，有些债券不违约是勉强撑着不违约，反而不利于整个市场的良性运作。中国的债券也应该有市场的分化，应该有垃圾债券。等量齐观不符合自然，也不符合市场。

定位风险的“标准”需要做出必要的修改，包括信息披露的标准，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包括个人和企业信用库的建设，需要系统化条理化以便于使用。在信息管理的问题上，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场外的监督者，扮演“裁判”的角色，要充分监控场外的四边，但不要过分进入场内当“运动员”。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要防止内幕交易，建立起规范透明的机制。对于所有的社会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仅是公司的内部控制，而是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组织的管理层、决策层、权力机构、员工和服务的对象之间，都要建立起一种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关系。

记者：监管金融风险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那么从中国转型的角度看，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转变？

贺力平：政府的职能在中国一定要转变，政府和市场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主动方是政府。目前，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同时存在，有利益的地方揽权过多。比如，建了很多高架收费公路，相比之下，社区公路的维护状况却比较

糟糕。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产业政策也需要转变，政府曾经看准了有发展前途的战略性产业要扶持它发展，但却很难知道未来二十年最有前途的产业和技术，难以弄清对行业的精确定位，看不清新技术的突破、相关的制约因素，看不清成本收益。政府决策若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也和公众一样难以做出正确的权衡决策，产业政策就不能保证总是有效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的同时，对前景的估计更加模糊。政府没有了先见之明，这是由发展带来的困惑。

产业政策到此为止，因而需要竞争力提升的政策。要建立允许公平竞争的开放市场，鼓励积极创新，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的产业发展。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做研究，让大学发展好基础教育，社会才能够享受高科技发展的成果，也更有意愿资助，就能补偿起前期的研发费用。

政府要做的事情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是要抓住一些关键点。市场在发展，政府也要调整思路，让经济政策跟着发展，否则可能会成为金融自身发展的妨碍。

记者：改革与开放往往有一定的冲突。比如“沪港通”开放了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也影响了金融估值 PE 水平的稳定。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贺力平：改革和开放应该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封闭的状态下难以做好改革，只是对外开放不改革也不行。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一些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调整还不够完善，一方面是由于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开放不够。

“沪港通”是证券市场领域开放的一步，还是局部性的，这类措施是值得大力推进的。今天的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没有开放是完全做不到的。国际经济的环境是竞争性的，要比别国做得好才能成功，世界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因而要有竞争的意识。现在对香港的开放，对大陆既有竞争的激励，也有改革的促进。

记者：中国 GDP 增速降至 7%，市场上出现悲观预期，金融市场乐观发展所需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贺力平：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的因素。从周期性的角度看，前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的增长，按照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也一定有转折和低谷，未来如果有再次增速上扬也不代表一定会有持久的增长。从结构性来看，经济体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到位，包括金融领域、贸易领域、社会服务领域等，这些未解决的问题阻碍经济释放其活力，需要深化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活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平均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这是优势；其次，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较大，“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市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最后，我国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在发展，各个领域的创新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尽管还处在努力地追赶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中，但只要注重找到可借鉴运用的地方，不断坚持，我国在此方面的优势就会不断突出，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亚洲协调构想——西太平洋新前景

记者：王彦琦



Hugh White

澳洲国立大学战略学教授、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主任。他曾任职澳大利亚国防部，分管战略与情报工作，曾任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澳大利亚战略与防务政策、亚太安全问题和全球战略事务。

「亚洲协调的最终目标是阻止任何单一国家统治整个体系，同时避免大国间逐渐升级的战略对抗。」

记者：在《中国抉择》中您提出，中美两国应当视对方为平等伙伴而非战略对手，尽管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对这两个大国来说，转变观念为何艰难？

休·怀特：我认为致使两国难以视对方为平等伙伴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这要求双方在涉及自身身份认同的深层次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人对自己是领导者这一观念非常执着。他们还未开始承认，美国在未来世界的角色会与过去不同，因而视任何国家为平等伙伴对他们而言都非常困难。同样，中国也深深觉得自己是所处体系中的大国。中国在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强大国家，它自身的形象塑造深深受此影响。它渴望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自鸦片战争爆发，欧美入侵亚洲以来，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耻辱感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的这种渴望。互相容纳、接受对方为在亚洲的平等伙伴，对中美而言都意味着他们需要放弃深植内心

的有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雄心与渴望，这绝非易事。

第二，中美两国都相信他们自身并不需要让步。美国认为，中国最终会接受作为亚洲秩序基石的美国的的首要地位。中国则相信美国最终将在亚洲让步，接受中国成为首要力量。如果两方都认为对方将让步，他们自然会觉得自己不必妥协。因而只有当双方都理解了对方的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他们才会认识到作为替代选项的妥协，是避免竞争不断扩大的必要条件。

记者：美国的政治领袖常呼吁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同“平等伙伴”的差别为何？

休·怀特：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是美国的观点。它并非等同于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在此观点下之中国，愿意依据美国对国际体系的观点行事。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会支持由美国决定的秩序而非挑战美国的领导。因而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者：中美两国已经共同合作，构建了一些制度和机制，以避免两国间的误判和意外冲突，比如热线机制。您认为这类机制对两国关系有何影响？

休·怀特：这些机制本身是很有益的，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他们有助于处理根本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本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热线机制或战略经济对话等合作形式为处理日常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机制，但它们并未处理涉及其未来关系本质的深层次问题。在某些方面，它们反而激发了自满情绪。比如我的很多美国朋友认为对中关系很容易处理，因为他们有这些对话。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话提出了关键问题，即双方需要做出让步。

记者：那么，中美两国可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促使两国逐渐平等相待呢？

休·怀特：我认为政治领导是改变人们对自身看法的最根本机制。国家身份认同的转变的确可能发生。举例来说，你可以想想看邓小平的角色。他改变了中国对自身的理解，使中国逐渐改变被旧式的共产主义经济秩序所定义的自我形象，一个在 1949 年之后对中国的自我认同非常重要的形象。邓小平带领中国走了出来。同样的，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领导美国从孤立主义情绪中走出，更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我认为在两个案例中，改变的出现一部分来源于其本身的必要性，但通过政治领袖的清晰阐释，这一必要性才被呈现在中美公众的眼前。

记者：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被视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面向。一些人认为美国只是希望在亚太区域整合的过程中分享一些红利，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对中国的遏止战略。您对这一争论的看法是什么？

休·怀特：华盛顿的不同人士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有不同看法。一些华府的商界人士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贸易和经济倡议。我认为大约从 2011 年以来的几年中，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在美国的亚洲外交中被赋予的中心地位也反映出另一种观点，即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可以发挥功效，减少中国对其亚洲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一些人认为它可以让美国重塑亚洲经济秩序，可以把美国重新放置于此一秩序的中心，可以边缘化中国的影响力。如果我是中国，我不会对此感到过于担忧，因为我不认为这目的会达成，它不过是一个幻觉。但至少美国有一些人确实怀有这样的目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应当做些什么来应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呢？是否需要尽力去参加？

休·怀特：我认为若这一协定适合中国，则中国应该加入。协定本身并无好坏可言，它是好是坏取决于在经济方面它是否有利于中国。若中国可以谈判出一个令它满意的结果作为加入的基础，它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但我不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必然成型。我不认为它在美国国会会大受欢迎。奥巴马至今还未就这一协定获得国会的批准。我认为要获得这一批准异常困难。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可能会如同其他许多念头一样逐渐消失。但就算它不消失，我也不认为它会有效。

记者：当一个国家打算采取一些行动时，经济互赖可能会改变成本收益的计算，从而潜在地促进和平与稳定。您是否认为有助于加深互赖程度的亚太经济整合过程会促进此一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它在多大程度上舒缓了亚太区域政治方面的紧张情势？

休·怀特：亚太区域各国间的经济互赖对于他们未来的关系非常重要，也为中美可以建设稳定的双边关系这一乐观的看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经济互赖并不能保证双边关系的稳定。我认为在某些方面，互相依赖反而会增加竞争的风险，它让双方都更加觉得他们自己不用妥协，因为对方会妥协。我不认为互赖让战略对抗变得不可能。它为避免战略对抗提供了很好的动机。但只有当双方都认识到经济互赖不仅影响对方，也影响自己的时候，互赖才提供了这样的动机。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一认识还未真正产生。

记者：中美可以做些什么，来使经济领域的合作外溢到政治领域？

休·怀特：他们应该讨论身份认同的问题。美国的政治领袖需要站出来，告诉民众，中国的崛起如何改变了权力的平衡，如何改变了权力的分布。也需要告诉公众，中国不同于以往美国面对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政治领袖也需要向民众解释，把美国从亚洲赶走并不值得，他们应当接受美国继续在亚洲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对双方来说这都需要非常强的政治才能和领导才能。

记者：亚太地区有一些值得两国关注的潜在热点地区。朝鲜近期可能准备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在中美关系中，朝鲜扮演怎样的角色？

休·怀特：我不认为朝鲜的局势如南海或东海一样严峻。朝鲜问题并不是能使中美产生重大分歧的问题。美国有时抱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但这不是一个重要到足以让中美走向冲突的问题。

但中日在东海的问题对美国而言就非常严重。因为若中日在东海爆发冲突，日本会向美国寻求军事支持。若美国不提供支持，这会严重损害美日关系，也会严重损害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位置。因而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那些容易把美中两国拖入冲突的局势才是真正值得担心的。

记者：如您所说南海和东海局势很紧张。这是否表明中美两国在试探对方的决心？

休·怀特：正是如此。美国是否真正准备好了支持其盟友？中国在试探。美国时而向后退，时而向前进。它有时措辞很强硬，如同奥巴马总统在日本时对日本表示军事支持时那样。但有时它对此又非常谨慎。因而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传递出复杂的信息。中国在持续试探。美国一直认为，只要美国做出足够清晰的声明，中国会让步。但这将会是一个风险。美国觉得中国会让步，中国觉得美国会让步。

记者：为了避免两个大国之间这样逐渐升级的战略对抗，你提出了“亚洲协调”（Concert of Asia）的概念，“亚洲协调”与亚太区域中已经存在的各种制度有何不同？

休·怀特：“协调”模型建立在体系中各个大国间一种非常清晰的理解上，即他们之间会平等相待；并且他们不会触犯彼此的核心利益，也会尊重国际秩序的一些核心原则，例如互不侵犯。因而我认为“亚洲协调”是一件要求甚高之事。在亚洲建立一个协调异常困难，因为它不仅要包含中国和美国，也应包括日本和印度。这很难但有可行性，我认为这也会是一个最和平的结局。

亚洲协调的最终目标是阻止任何单一国家统治整个系统，同时避免大国间逐渐升级的战略对抗。诚然你可以用均势结构来避免单一国家对体系的统治。但均势结构采用战略对抗的方式来防止霸权。用战略对抗来避免任何一国获得优势地位的问题在于它带来冲突和战争的强烈风险。协调则是在避免一国获致优势地位的同时最小化冲突的风险。

记者：俄罗斯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为什么俄罗斯不能够加入亚洲协调？

休·怀特：我认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在欧洲。这不是说俄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你可以看看俄罗斯在亚洲的邻居——中国。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强的国家。再看看俄罗斯在欧洲的邻国，比如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我认为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也好，战略机遇也好，都非常倾向于欧洲部分而不是在亚洲。我不认为俄罗斯最终会强大到能够在亚洲协调中获得一席之地。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一致同意的任何方案，任何安排，俄罗斯除了顺应外别无选择。因而不认为它在亚洲是一个真正的强国。这并不是说它不相关。它显然还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记者：亚太区域中还有很多小国。中国，美国，印度，日本要如何处理与这些小国相关的问题？

休·怀特：若中、美、日、印就亚洲秩序达成一致，那么其他的诸如澳大利亚等国，除了接受他们的决定外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期望他们达成的协定对我们有利。这对我们小国而言是个风险。但替代选项则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各个大国关系不好、无法达成协议、容易彼此冲突的区域。因而所有小国都需要思考，他们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大国意见一致，互相“串通”的区域中，纵然他们的行事方式可能违背小国的利益；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大国间意见相左，互相竞争甚至发生战争的区域中。特别是身处在核子武器的时代，我认为大国冲突的前景比他们彼此合作的结局更加糟糕。

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不确切的名称

记者：陈旖雪，谢馥梵，程若茜



James Markusen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过去 25 年的研究集中在大型公司和跨国企业的选址、生产及其福利影响上，也研究分析模型、数值模拟模型及实证研究。对跨国公司多年的研究，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影响的研究在他一本著作中达到顶峰，该著作于 2002 年夏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自由企业制度的真正含义是没有人被控制。政府和国际合作可以建立规则框架，也可以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记者：人均收入水平和两国之间的差异会影响国家间的合作和关税谈判。这是否会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处于不同层次的不同国家如何更好地展开合作？

James Markusen：首先，我们要记住，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往往会把对方视为对手。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展开合作也是比较困难的。尽管会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是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仍然存在诸多争端。对贫穷的国家来讲，环境问题并没有处在优先位置上，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乎无法取得进步和发展。中国目前仍然严重依赖煤火，而煤火是碳密集型能源。我们一直在谈论全球变暖，但是现阶段好多国家还是不肯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牺牲。

知识产权的成本巨大，不论是药物还是软件，初期成本都十分巨大。发展中国家仅仅想支付边际成本，但是研制新东西往往需要约十亿美元的投入。

安全问题也是存在争论的主要领域。但是一旦某些国家愿意投入资金并且研制出拥有自主产权的东西，该国将受到尊重并且可以得到收益回报。

随着不断进行开发，不断提升技能，工资也不断上涨。这往往描绘了一幅“坏”景象，但它却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基础产品无利可图，所以最简单的产品制造行业就转向了其他国家。这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举例来说，韩国、新加坡和香港都曾是制造商，但是现在已经跃升为“白领”阶层。国家梯层越高，收入也会越高，简单商品制造就会转向下层国家，上层国家从下层国家得到他们需求的商品，上层国家制造产业转向服务行业。

记者：对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未来前景怎样？他们会继续走由世界工厂向产业升级转变的老路，还是能够找到一种新方式来发展国家呢？

James Markusen：事实上，这种转变正在发生。私人的动机在于积累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所以他们不需要政府管理。

我们简单谈一下上海自由贸易区。我的很多朋友和我都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切的名字。自由贸易区指的是一个用来制造的特殊区域：在这片区域内进口无需支付关税，然后在这片区域将加工好的产品出口。机械和电脑配件在自由贸易区内最为常见。但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和自由贸易区原本的定义相差甚远。上海自贸区更具有首创精神，这里更多的是针对银行和金融等服务业。上海自贸区能够帮助推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成熟水平的新阶段。企业可以更少地依赖跨国公司，更少地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并且可以开始应用更为成熟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件好事。

记者：目前仍然存在其他的地区经济形式，比如广州和深圳。您认为这样的经济形式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James Markusen：这些经济大多还是以制造为主，并没有涉及太多的专业知识。广州和深圳的许多工厂目前仍然在处理来自香港和新加坡的订单。这些是上海自由贸易区无法提供的，但是我仍然认为这并没有坏处。上海自贸区可以吸引来自香港、东京和新加坡的白领工作。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主

要负责生产，销售工作多在海外完成。上海自贸区可以增强中国企业在白领工作中的影响，销售也可以在上海完成。

记者：当前，亚洲也正面临产业转移。越南、印度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订单，他们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对中国工厂来说是一次机会吗？那些拥有资金基础的大企业能否成为赢家？

James Markusen：现在有一种趋势：制造业将会重返美国和欧洲，这种趋势是一下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知识产权问题、各国之间的竞争、亚洲工资水平的上涨。他们愿意支付三倍的工资，但是五倍的工资他们就不愿意支付了。在美国，制造业工资在不断上升，而服务业却保持常规水平。美国正在遭受白领工作机会不足的挑战；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变化，技术人员的需求也不再迫切，能够给年轻人的高质量工作也就出现不足的问题。欧洲的失业率甚至更高。

记者：您曾经在您的文章中提到，不同的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会影响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方式，如外商直接投资。那您认为亚洲公司会以怎样的方式投资？

James Markusen：由于亚洲在不断积累工程上的技术，这种变化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知识的发展成本高昂，但是一旦发展起来，在未来数年都可以得到高度的重复利用。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简单货物制造将从中国移到其他国家。知识和基础设施的出口效果显著，比如中国的火车。我曾经坐高速铁路火车从南京到上海，那是非常好的体验。中国现在要求保护知识产权。“自由贸易区”将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这是物质的部分，但是总部和工厂一样重要。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中国进行扩张，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记者：百度、阿里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公司，通过收购其他公司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帝国。那未来的商业世界会不会是这些巨头公司和一些挤进来的小公司共同持股？

James Markusen: 有一个术语叫网络产品，互联网和软件都包含在内。如何评价这些网络产品取决于多少人在使用它们。大公司需要网络服务，这是一种自然趋势。诺基亚和蓝莓在五六年前达到巅峰，正如现在的 iPhone 地位一样。应用程序的开发导致了这种转变。这些独立而又特殊的产品不仅销售给个人也销售给大公司。决定网络产品走向的主要因素是其服务覆盖范围的广度。所以，网络效应能够决定成功与失败。

记者：有人认为亚洲力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被夸大了，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观点的？

James Markusen: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力量”(Power)这一说法。政客们夸大了中国出口的重要性。事实上，就电子产品来说，中国所占的比重是非常低的。拿一部 iPhone 来说，中国成分非常低，差不多只有 5%，物质部分差不多占到 15%。其服务、软件设计、营销网络主要由美国控制，美国成分差不多占到 30%-35%。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非常高，但是真正的增长并没有表面这样巨大，这种增长被夸大了。过去 20 年，中国国内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家庭收入上升了，总消费量却被抑制了。工资上涨了，中国产品却没有怎样变化，出口份额还出现了下跌。《中国日报》曾经提及 7.5% 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在我看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增长目标。中国政府已经过度关注出口，中国人民应该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中国应该向人民提供更好的产品。

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去年建立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行动的一部分，自贸区的建立能够给国内公司和跨国公司带来什么机遇？

James Markusen: 上面我已经列举了“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好处，自贸区也有一些弊端。这可能会影响中央政府对稳定的宏观环境的控制。权衡是经济学的全部。自由企业制度的真正含义是没有人被控制。政府和国际合作可以建立规则框架，也可以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

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

记者：金忆茗



李炜

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分析师，渣打银行中国区研究主管。

「未来发展的五年是关键的五年来，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到五年之后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

记者：自 2009 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遭遇到了短期瓶颈，您对本届上海论坛上提出的“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结”持何态度？

李炜：这几年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中期，确实面临着一些短期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存在个别地区房价过高、抑制居民消费投资的现象。二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负债呈现高杠杆化。2009 年到 2014 年的短时期内，杠杆率增长了将近百分之百。在债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银行放贷考核尺度放松，导致坏账上升、投资收益性快速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上述两点会在短期内拖累中国经济，可能会使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 10% 放缓到 7%，甚至是 6.5% 到 7% 之间。

然而，在此之后中国仍有回旋的余地。一是中西部均衡发展，中西部占中国人口将近 60%，收入却还不及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二是城镇化率，户籍非农人口占户籍总人口比重不足 35%，但城镇人口平均消费大概是农村人口的三倍，推进城镇化能进一步提振消费。三是很多行业存在过度管理，市场活力未被充分发掘的问题。以世界银行“经商难易程度”指标来看，中国

在 183 个国家中排名第 91 位。优化政府管理模式能够充分调动民营资本，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改善企业生产效率低、资金供给缺乏的现状。

将来如果改革成功，意味着中国 7-8% 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更长时间。如果改革失败，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不改革，以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短期来看维持在 7% 的水平应该没有问题；另一个，中国的经济管理目标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注重 GDP 质量，既有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还要有环境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等。即使在 2020 年或更早些时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的人均 GDP 可能只有美国的 22%，生活标准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所以，未来追求高增长不是中国最主要的目的，追求的还是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相对健康的，一方面来自于它的储蓄率、投资率，为未来中国经济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为其对抗国际金融冲击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但是中国的投资效率亟待改善，这几年投资回报率快速下降的现象值得关注。未来发展的五年是关键的五年来，改革成功与否，关系到五年之后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

记者：今年二月，我国出口曾出现罕见的贸易逆差，您当时持乐观态度，认为今年出口不会继续下滑。四月统计数据出口有所反弹，这是否符合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走向的预期？

李炜：在未来，中国有能力成为继大英帝国之后新的全球贸易超级大国。它具备相应条件：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快速增长，进出口网络越趋广泛，其制造能力、产量、产能有其他一些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它有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优质的基础设施。从未来全球化生产模式来看，该优势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中期来看，中国出口的前景还是积极乐观的。即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近期随着经济好转和欧美经济的恢复可能使中国出口得到进一步提振。短期来看，出口现在并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反而一直产生负作用，但是维持当前的增长规模对于短期内稳定中国就业市场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基本观点是，短期增速主要取决于外需，跟中国自身的经济表现没有太大相关性。如果欧美复苏，一定能带动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复苏，同

时拉升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中长期来讲，中国通过贸易进出口和金融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当中。实际上，只有更加开放，我们的中国经济才能够变得更加有活力、更有效率，才能够实现长期的蓬勃发展。

记者：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您对引起争议的“四万亿”计划怎样评价？

李炜：政府应该和市场相结合，缺一不可。一方面，政府应主导分配公共资源；另一方面，政府应市场服务，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和运作，特别是国企。其侧重点：一、提供好的服务。不仅是社会公共保障性服务，也包括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法律、规则的保障，促进市场规则的落实。二、做好增量改革。有时候全面改革比较难，但至少能做出增量改革，在不断的增量改革中解决问题。三、保护消费者及投资者。不管是各种经济体，还是民营、国营或者外资，政府要保护好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利，当好公平市场规则的裁判员。

至于“四万亿”计划，其本身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刺激力度、持续时间等，战线拉得过长。2009年下半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适当收手，但直到2011年，通胀、资产泡沫、房地产价格出现过快速增长之后，才开始着手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这些都是事后评述，出台时并无人完全反对，事后就不能过多地去指责。在当时背景下，指望民营经济拉动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不太切实际。大家的信心受到打击之后，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拉动投资反弹。

通过这次以后，有两点教训：第一，我们在政策的灵活性、调整的时点上可以更加合理。第二，刺激手段既可以通过改革，也可以通过正规和可持续的融资手段。很多基础投资设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能都仰仗银行贷款作为融资渠道，政府还是要通过财政政策，或者通过企业债务政策支持企业的中长期投资，并在预算中给出未来偿还债务的合理规划。我们要通过这个契机，使得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变得更加理性、科学和有效，这是它积极的一点。

记者：新型业务方式正在不断推动利率市场化，今年“两会”，央行行长周小川称“存款利率最终要放开，在最近一两年内就能实现”。您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李炜：从框架设计来看，利率市场化在一两年内完成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事实上，即便利率市场化没有完全放开，银行的利差可能已经达到一个相对国际化的通常标准，即 2.2 个百分点，银行已经实现了对其存款储蓄者所能兑现的最高利率。

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更多表现在体制完善及竞争优化。比方说，如果银行可以通过利率自由化的手段竞争，一些经营效率更高的银行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存款资源，从而更高效地使用资金。而且，如果一些中小型银行能够获得更多的存款资金支持，由于其传统客户群更多偏向中小企业、私人企业，也可以鼓励我们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就充分竞争这一点来说，它对提高中国的投资效率和未来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利率市场化本身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必须配套国企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如果国企的预算、盈亏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或者仍然处在垄断性的局面，银行仍旧会出于相对安全的原因把资金更多地借给国有企业。如果改变不了国企的企业性质，包括它的退出机制和社会市场地位，那也不能寄期望于利率市场化之后，我们的资金就能够更好地投向这些高效的行业当中。另一方面，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短期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这部分资金可能还是会通过各种形式从银行获得。除非政府有它自己稳定的、可以逆周期调配的资金来源，否则银行还是会在困难时期以政府性质的借贷作为配套资金来源。

所以，银行改革只是整个中国未来经济改革当中的一部分，只有当配套改革跟上其步伐，才能够释放出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所带来的资金效应。

记者：在国际市场上，央行对使用人民币的限制还未完全放开，您对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价值有何见解？

李炜：人民币是国家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的直接反映，但从当前人民币的国际价值来看，它并不能够充分反映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已经是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作为储备货币在国际上占比不到 2%。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过去我们管理人民币的汇率：一是汇率水平，至少在 2000 年初有低于它实际价值的现象；二是，我们通过资本账户的一些限制，使得人民币不能够在国际市场当中充分自由流通，抑制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价值的合理表现。未来，我们会通过市场化，或者通过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来发掘人民币的市场价值。

如果货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公认，也代表国际投资者、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的一种认可。现在的经济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用体系之上的，包括投资、融资拆借拆出，甚至在国际地位的参与度、话语的分量都是建立在国际信用评级上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人民币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信誉的一个标识来看。

我个人还是相当看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随着中国制度不断完善，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政府、经济体愿意去持有或者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将会从之前的国内货币逐步发展成国际货币。这个过程会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作为贸易货币，我们现在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可能已经占到进出口额的 20% 左右；第二个是作为投资货币，如何深入中国的银行间市场，或者进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作为投资，这个取决于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步骤；第三个是作为储备货币，其他国家愿意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愿意持有人民币作为它的储备资产；未来如果能作为大众商品定价货币，那就更好了，比如说石油价格、粮食价格，都用人民币标价。这些实际上就是间接体现了人民币或者中国的国际地位，只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中国才能够说它真正完成了我们制定的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目标。

寻找应对全民健康挑战的制衡点

记者：孙亮宇



梁卓伟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曾担任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银行的顾问。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专注于香港特区、内地和东亚地区内具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课题。

「卫生系统有不同的方向，我把它称为制衡点，和开车时候的仪表盘控制杆一样的制衡点，比如辖区内的保险系统、三甲医院、基层医疗中心的数量，这些在公共卫生系统的制定上都是可以调整的。这几个制衡点做得有多好，将会决定未来 15 年在卫生系统上的目标高度。」

记者：您参加的分论坛主题是“环境与卫生系统持续发展的创新之路”，请您从学界政界的复合视角讲讲对于中国卫生系统发展与创新的看法，以及全亚洲要如何应对“2030 全民健康挑战”？

梁卓伟：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全球有一个千年发展目标。2000 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要在未来 15 年的健康全球公共卫生中达成这些目标。明年就是 2015 年了。千年发展目标已经满半期了。我们作为世界的一员，在 2015 至 2030 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有四个方向：

第一、控制传染病。比如 SARS，H7N9，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的慢性病其实也是由传染病开始的，比如 HPV。广东人比较多见的鼻咽癌，还有东亚人特别多见的胃肠道癌。

第二、控制慢性病。在已经发展的地区,类似于北上广有最大的疾病负担,包括每天 80 以上的死亡也是源于慢性病,可见控制慢性病的重要性。慢性病包括了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其他非传染病。

第三、环境卫生问题。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政府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坚持向污染宣战。除此之外,交通意外引发的医疗卫生问题也需要重视,这是对于城市来说特别重大的疾病负担。今年四月份的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交通事故的疾病负担特别高,比其他同类国家更高。这些就是我所指的环境卫生问题,它不是内发的、个体性的,而是外发的社会问题。

第四、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医疗问题。我们国家东西部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这对人民医疗水平的影响也很大。

当下科技发达,医疗卫生从中受益良多。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官员如何把科技资源应用到自己的辖区去,这需要一个全面的卫生系统,比如对于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外科医生,他需要专业的仪器设备,这就需要从卫生系统中获得。卫生系统有不同的方向,我把它称为制衡点,和开车时候的仪表盘控制杆一样的制衡点,比如辖区内的保险系统、三甲医院、基层医疗中心的数量,这些在公共卫生系统的制定上都是可以调整的。这几个制衡点做得有多好,将会决定未来 15 年在卫生系统上的目标高度。

记者:如何看待医联体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作用?如何强化内地的基层医疗体系?

梁卓伟:医联体的组成是基层医疗、二级医疗、三级医院(比如华山医院)。香港在医联体方面也做的不好,香港的基层医疗点是私人医院,而政府的投入主要在公立医院。现实是富有的人不愿意去基层医疗点,患有小毛小病也前往公立大医院。上海在内地的基层医疗改革中是到位的,有部分项目做得很不错。

对于基层医疗体系,关键是如何在全国更多的省份做好基层医疗的政府投入。当基层医疗做得好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前往三级医院了。相比宣传,基层医疗的供给更加重要,比如提高基层护士和医生的工资收入,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医疗人才留在基层医疗岗位。同时,基层医疗点中药品的使

用档次需要到达三级医院的水平。

记者：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舒缓公营医疗体系压力，计划在本年中推出自愿医疗保险计划，请您谈谈对于自愿医疗保险计划的看法，您觉得这个计划能够在内地推广么？

梁卓伟：自愿医疗保险已经在实施中，多年来也存在有私人的医疗保险。现在规定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项目需要由政府进行审批，政府要求私人医疗保险需要包括更多的项目，在价格上也有规定。

初衷是希望市民可以信任私人的医疗保险而前往私人医院看病，从而减轻公立医院的负担，让公立医院能够负担起无力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市民，同时减少就诊等待时间。

记者：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与感染性疾病的抗争史，从天花到肺结核、SARS、H7N9。社会各界盛赞您当时对于猪流感的危机处理，您觉得有哪些实际经验可以拿来应对全民健康挑战？

梁卓伟：对于传染病在我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 SARS，艾滋，肺结核，还有其他的内生的疾病。我们的团队希望可以在技术领域贡献国家，我们和国家的疾病防治中心也有很多合作，比如在手足口病的诊治上已经合作多年。去年由浙江大学牵头，联合清华、港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也已在 H7N9 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领域实现突破。目前各方也在拓展类似科研合作项目，比如肝病的诊治相关。

记者：您担任食物及卫生局署理局长时曾表示，为维持香港产科和儿科服务可持续发展，将打击产科中介。在内地，赴港产子一度流行，您怎么看待内地赴港产子的现在和未来？

梁卓伟：最重要的是互相了解。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对一件事需要多了解各方面人的感受。对于教育资源的占有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看清历史的话，香港人在历史上也是从内地迁移过去的。

中国很难简单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记者：许可



吕建中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能源战略与政策问题专家。

「中国的页岩气发展难以简单复制美国的成功，这条道路依然漫长。如果认为是页岩气的兴起影响了新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战略上的误判。」

记者：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新能源（光伏、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投资大幅下降，有说法认为新能源投资锐减是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后果。页岩气的普及真的会扼杀新能源的发展吗？

吕建中：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能源的多样化发展是个趋势。而影响新能源发展的，第一是技术问题，主要是技术的成熟程度；第二是经济性问题，新能源在开发过程中成本过高，缺乏竞争性，政府的各种政策补助又没有完全到位；第三就是普及程度，新能源的生产供应量十分有限，获取的便捷性也较差，而传统能源面对新能源的竞争和挑战，也在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例如清洁煤技术、煤层气、煤制油技术。在这样的进程中，扑面而来的北美页岩气革命，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发展传统能源的信心，暂时放慢对新能源的投资开发。

毫无疑问，能源之间是可以替代的，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如果说，页岩气能成为了新能源发展的竞争者，那是因为页岩气革命恰好出现在其他新能源的发展起步期。当然，中国的页岩气很难简单复制美国的成功，这条道路依然漫长。我们在推进页岩气大发展的同时，有必要继续大力扶持新能源的发展。

记者：在 2000 年，页岩气产量不足美国天然气供应的 1%，今年已经占到 40%。据国外有关机构发布的数据，中国的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排名全球第一。那么未来页岩气的普及是否会改变中国的能源供给格局？

吕建中：根据各方面的数据，我国的页岩气资源十分丰富，在这一点上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由于我们的页岩气开发起步较晚，特别是资源、技术、市场、基础设施、政策等条件，都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很难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快速形成规模产量。事实上，去年我国的页岩气产量只有两亿立方米，连美国的零头都达不到。按照国家制定的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比较宏伟的产量目标，不得不依靠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的大规模投入，明年能否实现规划目标，大家拭目以待。

多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这种状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改变。大家寄希望于借助天然气的快速发展，改善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即把煤的比重降下来，天然气的比重升上去。中国的天然气发展要靠常规气、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煤制气、进口气等多种气源，不能把宝都压在页岩气上。

记者：在页岩气开发利用方面，发改委有政策鼓励引进页岩气开发技术¹，那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中石油是否有自主研发和创新？

吕建中：引进技术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要结合所在国的资源条件、地质条件、地面条件进行改进。国外的技术服务成本很高，现在我们的技术主

¹ 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的《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 2014 年版》中，鼓励引进先进的技术包括页岩气开发利用技术。

要靠自己，但核心关键技术还是靠引进。我们正在加快技术研发步伐，但这也是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我国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力度很大，不仅仅是中石油，几大公司都在加快这一块的研发投入、组织攻关，希望能够尽快形成技术系列。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很重要的突破，例如水平井技术、分段压裂技术，还有工厂化钻井、微地震监测技术、旋转导向钻井技术等。

记者：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激励或补贴政策。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请问政策支持对于新能源开发有多大的推动效果？

吕建中：促进页岩气、新能源的发展，技术可行和经济合理两方面缺一不可。如果仅仅解决了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不合理，就难以吸引投资。特别是现在我们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页岩气开发领域，如果没有税收、价格、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就没有动力。

无论是页岩气还是其它新能源，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们与常规能源甚至进口能源相比，是没有价格竞争力的。如果你不给予政策补贴和支持，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因此，政策支持对于新能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供经济上的合理性，保持企业运作的可延续性，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

记者：有一位证券投资师认为，从技术和资金方面来看，未来五至十年中国页岩气的开采难以和美国媲美，发展需要国家战略做主导推动力。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吕建中：如果能把页岩气的开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像引进俄罗斯天然气一样，调动国家各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去推动，当然很好。前面已经提到过，去年我国页岩气只有两亿立方米的产量，离明年的规划目标 65 亿立方米差了 63 亿立方米，靠社会资本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就要重新靠国家的力量。于是国家调动央企、“三桶油”重新上，现在希望就在眼前。这就是国家把它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来推动了。

但是战略要落到实处，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比如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是有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的。我国的页岩气开发战略现在是提出来了，但由

于受经济实力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完全落地，支持得还不到位。

记者：页岩气的开采会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也存在水污染的潜在危险。中石油在开发页岩气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你们做了什么措施来避免这个问题？

吕建中：页岩气能为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清洁能源，它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煤炭、石油都要低。但是页岩气的开发过程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环境风险，主要因为它使用大量的水进行水力压裂，并要用一些化学剂，存在着泄漏的可能，以及压裂技术在运用中可能会引发一些地震。但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现有的技术应该是可以防止这些环境污染的。

但是必须承认，它仍然是存在着水资源消耗的问题和对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探讨新型压裂技术，将来用二氧化碳、液化天然气乃至其他的非水、无水压裂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石油在开发页岩气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把凡是与环境相关的问题，都作为最重要的要素来考虑。从地面上讲，HSE²作为否决条件。凡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宁可不做。从地下来讲，我们采取严格的措施预防水力压裂过程中的泄露或者对地下水的污染。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保护措施，我们在国内页岩气开发中没有发生过一起环境污染事故。

记者：您曾说，中国页岩气发展是开放的，不仅对外国人开放，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地方企业都是开放的。这一点如何体现？

吕建中：从外国企业来讲，壳牌、道达尔、雪佛龙、BP 等国际油公司，还有一些技术服务公司，比如哈里伯顿等，都纷纷进入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市场。但按照中国的矿权管理法律，只有中国的企业才可以获得矿权，外国公司只能和中国的企业合作来进行开发。

对于国内地方、民营企业来说，在这几年的国家页岩气矿权招标中，地

²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近几年出现的国际石油天然气工业通行的管理体系。

方企业、社会资本积极性很高，也收获颇丰。他们最初的想法很好，进来之后才发现“水太深”。比如在重庆打一口井就要七八千万，民营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十分有限。其实对任何一个产业都是这样，开放了，不一定你就有能力参与。

记者：页岩气是否会有不同于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模式？

吕建中：页岩气有一个在生产上有别于常规气的特点，就是它的单井产量普遍比较低，主要依靠多打井来提高产量。针对这种情况，一些页岩气田可能不适用建设大型气管道，而发展分布式能源 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比如，可以把开采出来的页岩气压缩成 LNG³向外输送，也可以用页岩气在当地发电，用比较好的储能技术发展分布式能源。这当然是比较遥远的了，比较现实的就是在选择试验开发区时，尽可能地靠近现有管道和市场。

³ liquefied natural gas，液化天然气。

医保制度成本应该让老百姓负担得起

记者：孙丽



孟庆跃

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卫生部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卫生筹资主要考虑三个问题：资金如何筹集、如何管理和如何使用。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卫生体系效率、公平、质量和可持续等目标。」

记者：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致力于在 2020 年实现全民享有卫生保健，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哪些挑战和机遇？

孟庆跃：首先需要考虑我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2020 年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即所有人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并且居民不会因为得到这些服务而陷入经济困难，这是基本目标。如果分析我国目前目标实现的程度，可以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框架，即从人群覆盖、服务覆盖和费用覆盖三个角度来评估。全民健康保障，不仅仅是为人民提供制度，如现在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等，同时通过这些制度，能够提供足够的、比较合理的服务。这个制度不应该成本太高，应该让老百姓承担得起，使之不会因使用医疗服务而出现因病致贫的现象。若从这个含义出发，我国现在应该是进入人口高覆盖阶段，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公共卫生的基本项目（如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包括一些传染病的防控）覆盖率都比较高。但另

外两个维度，即服务和费用覆盖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服务在医疗保障制度中不能覆盖，质量有待提高；此外，因病致贫仍然存在。

虽然现在医疗覆盖面很广、覆盖率很高，国家投入很大，但是老百姓的疾病负担依然很重。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并不明显，因病致贫这一现象的改善情况也并不如预期那样好。从现在来看，只能说人群覆盖面已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服务的覆盖和疾病经济负担这两部分需要加强。所以需要在人群覆盖率较高的基础上，把服务做得更好、更宽，服务质量得到保证；从经济费用的角度，使得居民疾病负担真正有效地下降，特别是需减轻低收入人群因病致贫所带来的家庭负担。

记者：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不明显的原因是什么？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存在怎样的关系？

孟庆跃：因病致贫，主要针对的是低收入人群。

第一，我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就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和收入分配的层面而言，并没有较好地解决收入公平性的问题，使得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对消费、对医疗服务的脆弱性越来越敏感。

第二，在整个医疗卫生改革过程中有很多进步，其中卫生服务利用率提高非常快。从1980-2012年，住院率从2.3%上升到13.2%，门诊诊疗人次数从2.6次增加到5.1次。其中1980-2000年的20年来住院率以2%的速度在增长，而2000-2010年的10年内住院率以5.8%的速度急剧增加。医疗卫生费用的构成包括卫生服务的利用和单位价值，利用的越多，费用也就越多，因此利用的增加带来家庭疾病负担的增加。这对于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影响就更大，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保险还不能全面覆盖医疗费，虽然会给予补偿，但是自己仍然要付较大比例的医疗费，即医疗卫生服务利用越多，自付的那部分卫生费用也就越多。这是个政策矛盾，国家卫生改革的目的是既要提高卫生服务利用率，同时又要解决经济负担问题。但这两者是一对矛盾体，利用率增高可能带来的就是经济负担的增加。因病致贫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妥善的解决，肯定有多方面因素，但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总体来说，医疗服务的成本，控制得不够理想。近几年住院费、诊疗费等上升幅度很快，其中有一些增长是合理的，但有些增长却是不合理

的，如一些不必要的药品和检查，进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总医疗卫生费用，这肯定会增加居民的经济负担。

记者：如果让您把卫生经济改革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进行定位，您认为它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孟庆跃：卫生经济改革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卫生经济主要考虑三个问题：钱从哪里来、钱怎么管理、钱怎么用，这三个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最富的国家。需要、需求可能是无限的，人对健康的需要，是无限制的，但医疗资源永远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一些问题，钱怎么有效率得来，怎么公平得来，以及钱怎么有效率得使用。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使一个体系或一个社会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中做到有效率、有质量。卫生经济所研究的问题，如钱从哪里来，是自掏腰包还是为居民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或是通过税收，国际上有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亦各有优缺点。中国选择的模式，现在是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作为医疗服务的资金保障，税收的一部分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保障。

卫生服务费用上升过快，就隐含了一个问题，在卫生经费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合理利用，或者说没有把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产出有效的服务。有效的服务应该是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并改善他们的健康。另外就是在卫生经费使用的过程中是否考虑了公平性，是把大量资金用到城市的高档次高精尖的服务中，还是首先保证基本的医疗保障？是把公共资源首先用到贫困地区、更加需要医疗服务的地区以及更加需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人群身上，还是过多的用到发达地区、城市地区、富裕地区？这些很重要。

记者：关于“钱从哪里来”，您在“《世界卫生报告 2010》对中国卫生筹资政策的启示”中提到：“从烟草税和酒类税中明确卫生份额，建立卫生相关的基金等，是可以考虑的筹资渠道。”为什么？您认为这该怎样实施？

孟庆跃：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建议，出自于 2010 年的世界卫生报告，我国也一直在尝试做这个。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大家都十分重视怎样对危害

健康的产品进行征税。这样做的目标如下：一是降低对该类产品的消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让人们因为价格的升高，减少对烟草和酒精的消耗。这本身也是一个健康问题，减少了此类产品的消耗，会带来健康的改善。二是将此类产品的税收做成专项税，比如卫生健康教育的专项税，增加医疗资源的可拥有程度。这种税收本身是健康促进重要的手段之一。并且可行。我国的烟草税已经有过几次提高，虽然并没有明确把烟草税收的所有收入用到卫生专项中，但其实税收中的很多收入已经进入了公共卫生服务的预算中。即虽然名义上没有列卫生专项，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做了，这是体系问题。

根据国情做出的减排承诺才有意义

记者：陈依佳



潘家华

现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目前我国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做出绝对量减排速度和幅度的承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诺的是减少温室气体增加的幅度，发展零碳能源的速度、幅度和规模，发展低碳经济。国际气候协议谈判，不必要也不可能是一刀切的适用于所有经济体，要根据具体国情做出的承诺才具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

记者：今年 3 月 IPCC 发布的第五次报告在全球范围内定义了面临气候变化的脆弱人群、产业和生态系统。在中国现有的环境条件下，您对这种“脆弱性”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克服这种“脆弱性”？

潘家华：急剧的气候变化会使自然生态系统变得更敏感，更脆弱，加大各种风险。第一，我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都是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升高将对这些城市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第二，我国几大江河的源头都位于西部，气候变化不但影响西部的生态环境，也使东部环境逐渐恶化；第三，生态多样性的变化也是脆弱性的体现之一，短时间

内温度升高使生物难以适应，造成生物消亡，这不仅是生态系统脆弱的问题，更是生态系统崩溃的问题，同时若动物消亡人类也无法独善其身；第四，洪涝、干旱、热浪等极端事件频率增高、程度加大，对人类也有很大影响。比方说人对水的需求是刚性的，天然水量减少但人的需求不会减少，虽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工程手段例如南水北调进行水资源的空间再分配，但气候变化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水源地例如汉水出现水量减少而使得工程措施难以产生效果，无法应对气候变化。所以人类要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减少气候变化，让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和谐共处。

记者:此次报告中还提出过去 10 年，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能源需求增加以及全球燃料结构中煤炭比重的上升。您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

潘家华:温室气体减排有两个要点：一是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二是改变能源结构。目前我国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工业规模扩张都需要能源，没有能源无法进行，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对我们发展中国家在短期是不可行的，因此我们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增加可再生能源利用。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零碳能源发展规模大、速度快、效果好，比如中国低成本太阳能热水器的发展程度位居世界第一，这种非商品能源效果好、成本低，为千家万户带来便利。如今，太阳能发电的上网电价降至 0.9 元，风力发电的上网电价降到每度电 0.51 至 0.6 元，这些具有经济利益的清洁能源可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发展逐渐取代化石能源。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是煤，不是石油，而是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既能保证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2015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1.4%，国家对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十分关注，大力支持。

记者: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要求中国转换身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呼声不断加大，然而中国的实际话语权依然十分有限。根据您多年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经历，您认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新格局中应该如何调整定位与态度？

潘家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个排放大国、一个经济腾飞的国家，中国国际地位、谈判立场、合作伙伴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方向和原则是不变的，变的是如何减排的立场。第一，调整发展与减排的重要性。以前我们提倡发展优先，现在视发展与减排并重，以后可能减排更为重要，这都要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二，采取实际减排行动。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中国也有所响应，采取有效的减碳措施，使碳排放不断减少；第三，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经济发展等问题需要更多的交流，更频繁的合作；第四，向发达国家取经。对于发达国家，我们需要与发达国家对接，学习减排经验，以前我们对发达国家更多的是指责批判，现在要在追求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有效的合作。

总结起来，一，我们减缓气候变化的立场是不变的；二，我们国家的定位和态度要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做出适当的调整。

记者: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因此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应该和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对承担相同、定额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任务做出承诺”。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潘家华:各国都要为减缓气候变化采取有效的措施，做出自己的承诺。但是每个国家承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可以承诺减排，然而发展中国家有发展需要，承诺绝对量减排是不实际的，对不同的国家我们应考虑各国消费水平：对于消费者而言汽车是一个重要的消费指标，就汽车保有率来说，每千人中美国拥有 800 多辆，欧洲拥有 600 多辆，而中国只有几十辆。同时中国还有 2.3 亿农民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贫困，而能源消费增长对城市化、工业化、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因此目前我国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做出减排的承诺，我们应该承诺减少温室气体增加的幅度，大力发展零碳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承诺不是承诺相同的内容，要根据国情承诺才是具有操作性的，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今年 4 月 24 日新环境保护法进行第四次审议后得以通过，完成 25

年来首次修订，被视为“史上最严环保法”。这种“严”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家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一直在发展，从理念，到书面，到执行，再到严格执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经济差异，产生环境污染，这时我们需要法律的跟进，以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可执行。这就需要有更严格、更具可操作性的法律。“更严格”是指：第一，监管范围更全面。以前我们更强调终端治理，如今要求从源头、过程、终端做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第二，监管标准更严格。以前的环保法要求比较宽松，现在我们需要更高的标准，更严密的规则。第三，执行、惩罚更严厉。以前违法成本低，环保法约束力较弱；现在执行程度、惩罚力度加大。如今公众提高了对于身体健康、环境美好的关注度，这种更加严格的法律已到了执行的阶段。

记者：当前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扶持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您之前提过这种投资式转移是一种被动转移，可能会加重中西部污染。能不能请您就此观点具体介绍一下？

潘家华：国家扶持产业转移的原因有二：一，希望区域均衡发展；二，西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当说产业转移的想法是好的，但就现有情况看其执行效果是不佳的。第一，目前从东部转移的产业大多是遭淘汰的产业，不可能是先进的或者高效率低污染的产业。东部不可能转移高端产业，西部也没有能力承接高端产业；第二，西部在区位处于劣势。我国东部处于沿海地区，离世界市场近；西部位于内陆地区，离消费市场远，不存在区位上的竞争优势；第三，西部生态环境环境更脆弱。东部降水比较丰富，管理比较严格，污染治理情况相对较好；西部环境降水少，生态环境脆弱，管理不严格，治理能力比较低，若产生污染则更为严重更难治理；第四，西部是东部的屏障，是东部的源泉。我国有几大江河都源于西部地区，西部的污染顺着水和风传输到东部，将对东部再次造成污染。

记者：那西部应该如何发展呢？

潘家华：我认为西部不应该照抄照搬东部的发展模式，西部不具备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建设、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条件。西部要发展就靠资源输出，如西气东输等工程，既保障生态环境得到维护，又保证生活品质得到改善。转移大规模的人口、产业将对西部产生灭顶之灾，对东部也是慢性中毒。如果东部不肯转移高端的、先进的产业，那么所谓的承接是一种更恶化的转移。

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者：马妍娇



Peter Daniels

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地球和环境科学学院地理学教授，曾担任伯明翰大学副校长职务，欧洲服务业研究网络前任主席、创始人之一，梅林创业有限公司董事，英国地理研究所名誉秘书长。研究主题为服务产业地理，服务和全球化，服务产业的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化。

「当前的主要困难在于过分关注基础设施的供给，而几乎不考虑地点、时机是否合适，是否符合基础设施的用途要求。」

记者：我们今天主要谈论城市化和生产性服务业，那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生产性行业变化的？

Peter Daniels：这种变化非常迅速，但是相对于亚洲一些其他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体来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服务业占到就业的 70%~80%，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0%以上。而在中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约 42%，占就业总量的数值可能更小。虽然中国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还必须奋起直追。追赶的速度十分重要，生产性服务份额的增加也十分重要。诸如会计服务、设计服务和营销服务等服务形式往往会被一些制造行业应用于产品生产或服务生产这些服务都是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服务（或被称作现代服务业）。

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方向都是由行政命令引导的。例如，有些城市会调控劳工流入。有些学者认为，政府主导的模式非常武断，缺乏弹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帮助中国少走弯路的最佳途径。对此，您是怎样看待的？您觉得应该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Peter Daniels：我认为我们应该退一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发展进程仍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在这种体制内，中央政府对发展进程的影响比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内中央政府对其的影响要大的多。当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中国自 1979 年开放以来的一个阶段：要使中国发展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发展进程应该在中央指示、中央部门指导下进行。在这一阶段，私人部门的有限参与都值得称赞。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可能会期望中央减少介入，让市场更多的接管和控制，为发展模式做出更大贡献。

我认为当前的主要困难在于过分关注基础设施的供给，而几乎不考虑地点、时机是否合适，是否符合基础设施的用途要求。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包含铁路和高速公路，还包含了办公楼、商业园区、零售公司和其他中国城市和地区出现并高速发展的相关空间。但是从我参观过的许多中国城市来看，我感觉在各个城市，提供基础设施被放在了优先地位，而基础设施是否与需求相匹配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按照这种理论，如果我们在一座城市的郊区建立一个新中心，然后把一所大学搬过去，提供一些办公楼，建一些住房，这样就创造了一些条件，可以吸引和鼓励商业行业的蓬勃发展。但是似乎没有人问一下商业发展需要什么？市场或许可以更好地识别或者鉴定什么是更为需要的，也能鉴定基础设施选址是否合适？很多大型投资项目和住房项目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还是有一些政府是作为合作伙伴参与的？这些项目又有多少是空置的或者仅仅部分占用的？是因为它们位置不对吗？是时机不合适吗？还是仅仅因为它们与需求不匹配？

记者：您知道河南省郑州市吗？一些人称这座城市为鬼城，因为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区域很多先进的现代化办公大楼没有企业搬进去。

Peter Daniels：事实上，很多建筑物并不是完全空置的，只不过有可能从

没被使用过。所以，我认为这些可能是当前中央精英和政策规划指导下的城市发展体系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发现，这种体系会慢慢地向自由市场体系转变。届时，资源配置能够更好地同市场需求相匹配。据我所知，中国许多省份和省会城市的新建筑、新项目都是地方政客主导并发起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中央政府展示他们正在建设一些这样的项目。

记者：日前，我在《金融时报》读到一篇文章：世界银行呼吁中国继续增加城市密度（含人口密度和空间密度）。据我所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已经拥堵不堪，一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甚至已经不能正常提供服务。那您是怎样看待世界银行的观点的？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增加城市密度？

Peter Daniels：我认为如果继续增加城市密度，就某些方面来说可能会是好事，因为这有助于维持聚集经济带来的好处。只要基础设施到位，这能够使雇主和雇员都受益。如果保持密集度，那么问题也会出现：基础设施投资相对较低，但是还要保证高质量、确保高密度。继续增加城市密度的另一个缺点是环境的负外部性效应，比如对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管理的影响和其他负面影响。此外，如果对高密度生活的倾向持续增加的话，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必然增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断膨胀的房价都是这些问题的反映。

如果中国允许城市以低密度方式拓展，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在欧洲的经验是，当许多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负外部性开始显现，一些个人和企业就开始表现出往农村地区搬迁的倾向。某些情况下，政府会制定政策，下放权力。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业用地的丧失就相对不再那么重要，这也能够保持低密度的持续性。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中国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件大事，必须慎重考虑。在当前阶段，存在太多的维度，所以我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低密度和高密度之争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记者：据报道，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基础设施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在巴黎，每平方公里约有 133 个十字路口，在东京这一数

字达到 211，但是上海浦东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 17 个。所以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建造更多的基础设施并且增加密度。

Peter Daniels: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巴黎和伦敦与中国相比发展阶段不同，就城市拓展能力来说，交通设施发展十分受限。我不知道用巴黎的交点密度同中国的比较是否合理。这是历史问题。许多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道路发展基本上是依靠过去三十年间的交通技术，而巴黎市中心是十八世纪早期就基本定型，那时的科技和传输技术同现在相比是迥异的。

记者: 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处于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

Peter Daniels: 是的，我认为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你去问那些目前住在城市的人他们更倾向住在哪里，我猜很多人会更倾向住在一所房子里而不是住在公寓里，或许住在密度更低的农村地区更为合适，英国的很多家庭都希望住在农村不是吗？我不确定在中国是否也是这样。你要么住在农村，成为农村经济的一部分；要么移向城市，成为城市经济的一部分。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通勤对于城市来说至关重要，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也存在通勤，但是基本局限在市区内，不会往返于城市 and 市区外的地区。

记者: 但是人们确实在为城市工作。

Peter Daniels: 在欧洲，人们为城市工作，在城市工作，但是却住在乡村。举例来说，我在伯明翰大学工作（坐落在市中心），我居住的地方离工作地有 45 公里。我们希望居住在乡村，享受乡村的居住环境，也愿意支付往返两地的费用。拿伦敦来说，每天有超过一百万人通过火车和汽车上下班，很多人居住在离伦敦市区 80 公里以外的地区。因此，在这层意义上，你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落后于欧洲城市发展模式。最终，随着城市经济的日趋成熟，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选择居住地点和居住方式能力的增长，可能会有更多的城市居民会选择住在市区以外，依靠交通工具上下班。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市区外的居住需求增长会提高对土地资源的威胁。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记者：但据我所知，越来越多的上海人选择在附近城市买房（比如苏州、昆山），但是在上海工作。

Peter Daniels：真的吗？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城市生活的人会选择住在城市。但那些居住在农村的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搬进城市。也许这是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造城或者提高当前城市密度的部分原因。一旦户籍制度放开，城市压力会骤增。据我了解，初步放开的户籍制度是不允许人们迁移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但是允许人们向中西部的中小型城市迁移。这有助于提振西部经济，减小西部地区同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来说，西部地区超越了沿海省份，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另一个复杂问题是户籍制度放宽的作用。据我了解，中央政府已经表示会逐渐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看来，不论中央会不会继续鼓励现有城市扩大规模，提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都会带来一定后果。例如，扩大规模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土地短缺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你可能会更多的选择，但是想要去加强，还是会存在很多问题。

记者：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Peter Daniels：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的生产性服务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在这里他们能够接触到那些需要专业知识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客户。中国也不是不存在这种情况，至少随中国城市化发展起来的大型城市和快速发展城市都在为其维持进一步增长和关键服务活动的多样性的能力创造条件。

上海与香港，有竞争才有进步

记者：李梦馨



邱丽萍

邱丽萍，中国香港贸易发展局副首席经济师、研究副总监（大中华区）。

「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上海、香港永远是可以共同去发展的，而且两地可以有互通、互补作用。当然竞争是有的，但健康的竞争是好的。」

记者：您曾表达过，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寻求海外服务、海外合作伙伴的首选平台。您认为与其他外企相比，港企的优势在哪？

邱丽萍：其实，内地企业来香港，不是因为香港的企业比海外的企业好，而是因为香港是个服务平台和金融平台。而且，我们的企业向来做国际贸易，跟世界各地都有很好很强的联系。内地企业来香港，是将香港作为一个平台，来找需要的一些合作伙伴。在香港的外国公司，或者是香港一些银行、投行或者是会计事务所的客户，他们有一些项目，愿意找海外的投资伙伴，而且他们的项目可以与中国的企业有一些互补或对接的基础。所以香港在他们之间做一个中间人，把他们拉在一起。然后香港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其他的服 务，比如说他们在投资之前对海外市场的了解，并对企业进行评估，检查

企业财务状况怎样、有没有一些法律的问题还在诉讼当中、它的资产值多少。其实每家企业真正要做投资之前都要进行这些很审慎的研究审查。香港在这方面可以给他们很多服务支援。

当然还有投资的时候资金的流动问题。而且如果内地要审批一笔钱到外面投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以前跟一些内地的企业谈过，他们在与外企谈合作谈投资时，谈好之后外企觉得很快要决定了、落实了。中国内地要进行审批，需要时间，但外企不会明白，或者说不会等。所以内地企业的折衷做法是，先到香港投资一家企业，把钱汇过来。把钱放到香港，这样他们投资的话就比较灵活，具体操作可以快一点了。香港对他们来说是很方便的。所以你刚才问，香港的企业和外国的企业有什么优势的地方。内地企业选择香港，不是因为香港的企业有更强的优势，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香港企业可以给他们很多很专业的建议和服务。香港的企业比外国的企业更了解他们，跟他们沟通更加方便。所以香港是有自己的价值在里面的。

记者：那您觉得，自贸区成立后，这些优势会不会受到挑战？会不会给香港的经济地位带来威胁？有言论说香港不希望上海做自贸区，您怎么看？

邱丽萍：因为自贸区现在的主要方向是希望把投资管理都要放开，以及在金融方面多一些突破、发展。因为它在金融方面还是一个离岸的地方，跟在国内的资金市场和投资还是要分开的。所以现在吸引外国的企业来投资，用自贸区去作为平台的话，可能还无法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观察几年，才可以了解它对香港的意义。

当然，我们香港的企业也可以到自贸区去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且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服务平台，我们的服务对象很多是内地的。如果内地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可以做生意的空间越来越大，当然会给香港带来更多的生意的机会。那你可能又会问，他们是选香港还是选自贸区呢？竞争一定会有的。因为你知道自贸区是一个先行先试的地方。它希望用三年的时间，找到一个很好的模型，然后在全国来复制。那等于说全国都会在政策方面变得更开放，希望因制度改变而推动整体经济能发展得更好。拿我们常用的一个例子来说，现在分饼的时候可能是多一个人跟你分了，分不了

以前那么大。但是饼越来越大了，那还是好的。竞争是健康的。有竞争才是有进步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自贸区的模式可以向全国推广吗？IMF 副总裁朱民认为，上海自贸区一定是可以在全国推广的，如果它永远只在实验区内生存的话它就没有意义了。您是否同意？

邱丽萍：我想现在自贸区的特点与以前的保税区、经济发展区不一样。以前是用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现在，自贸区最重要的是希望用它作为一个试点，去改变政府的职能和管理企业的流程。用负面清单管理，就是希望更开放、更加与国际的做法接轨。企业在自贸区做事情更加自由，与政府打交道的的时间减少了，经营效率提高，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希望推广是可以的，但要多久就很难说了。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单是自贸区，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如果自贸区作为一个试点，在还没有完善的一些新的开放措施、还不能保证国内的经济安全时，他们在一个范围内去尝试，这是好事。但是如果长远来讲，没有人会满足于一个自贸区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自贸区试验开放成功以后，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再来复制，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就可以发展得更好。

单单自贸区这个市场太小了。离岸与在岸两者之间，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会放在在岸，如果只在离岸的小的地方，没有意义。香港这么小为什么可以吸引投资发展起来？其实很多企业它们不是单看香港，香港的市场太小了，香港之所以可以发展起来就是我们是个很开放的城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服务外面的、服务内地的。

记者：您曾说“近年内地经济结构更加强调转型升级，从外向为主到内外兼顾，香港作为服务中心又提供了新的平台。”您认为香港和上海在发展服务型贸易上分别有什么优势？在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看来，“下一阶段工作核心任务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您对此怎么看？

邱丽萍：当然有些服务是有地域关系的，我们服务有服务腹地这是很自

然的。上海面对的是长三角跟长江一带，香港当然是珠三角那一带，比如说，香港的工厂不会到上海去找一些日常银行服务，或者是找帮它设备升级、或者是做品牌的服务。它们都会找靠近他们的服务地，比较方便。当然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时候，因为金融是没有地域的限制的，所以地域的影响不大。但是金融是实体经济很重要的一个配套。中国的经济这么大，上海、香港永远是可以共同去发展的，而且两地是可以有互通、互补的作用的。所以我刚才说，自贸区对香港的影响怎样，当然竞争是有的，健康的竞争是好的，最重要的是，中国越来越开放，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香港通过服务内地，可以做生意的机会就更加多了。而且，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不单单是上海、香港可以作为服务中心，更多的服务中心也可以发展起来。

当然服务不是为服务而服务，它是为实体经济来服务的。因为所有实体经济的发展演变都很快，所以我们就要放开，让市场去主导。那自然就可以找到两者各自需要的，需要的他们会找到，没有的他们也会来发展，就是这样。

亚太经济合作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记者：沈大伟



唐国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前发言人，曾先后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大使馆、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中国驻捷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等职。

「 TPP 只是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形式，此外，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就是中国参与的 21P。我认为，21P 更符合亚太地区的实际情况。」

记者：2001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 9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根据当时通过的《上海共识》，贸易自由化已经被视为亚太经济合作的重点，《共识》还要求在 5 年内将贸易交易成本降低 5%，这一目标后来完成得怎样？

唐国强：这一目标实际上是实现了，后来在此基础上，APEC 又提出要把贸易成本再降低 5%，可以说也实现了。所以在 2009 年，APEC 提出了“Ease of Doing Business”这一新目标，即到 2015 年，要把 APEC 成员国间的商务和贸易状况改善 25%，包括便宜 25%、增速 25%、简便 25%。这一目标明年即将到期，目前各国也正在积极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APEC 成立 25 年来，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的研发与合作等方面提出过很多倡议和举措，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也提出过不少战略目标。

可以说，目前亚太地区还没有任何一个合作组织能像 APEC 那样，在推动亚太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当然 APEC 也有一些不足，比如根据 2010 年制定的贸易目标，发达国家要实现贸易自由化，但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有人批评 APEC 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好作用，但从总体上看，APEC 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记者：TPP，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 2002 年发起以来一直在探索多边贸易谈判机制，旨在形成贸易和服务在成员国间的自由化，有人认为 TPP 将成为一个涵盖 APEC 所有成员国的小型 WTO。您是否同意这样的预测，TPP 会取代 APEC 的地位和功能吗？

唐国强：应该说 TPP 只是亚太地区贸易安排一种形式，还不能涵盖所有的贸易安排。现在 TPP 只有 12 个成员国，而且其中不少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 TPP 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目的在于为 21 世纪的国际贸易制定一个全面、高质量的标准，并由美国来主导这一标准的制定，这是很明显的。但目前也不能说未来国际贸易一定会遵循这一标准，TPP 也不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WTO。不过，包括 TPP 在内的所有地区性的 FTA（Free Trade Arrangement，自由贸易安排）或 RTA（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地区贸易安排）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从长远来看，这些地区性的合作组织对整个世界贸易体系都是一种补充，而不应该是对抗性的因素。尽管从短期来看，多哈回合谈判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从长期来看，TPP 还是有利于 WTO 发展的。

记者：近年来，日本已经加入了 TPP 的谈判，韩国也正在进行加入 TPP 的谈判，有观点认为这是在争夺经济外交和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您认为这种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经济合作的主流？如果会，中国应该采取哪些积极的举措？

唐国强：TPP 门槛太高，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就进不去。TPP 的谈判之所以艰苦，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也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不少发展中国家都觉得发达国家提出的标准太高，一旦加入 TPP 可能

会遇到不少问题，甚至是冲击。因此，TPP 只是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形式，此外，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就是中国参与的 21P。我认为 21P 更符合亚太地区的实际情况。首先，它的参与面更广，现在已经有 16 个成员国。其次，它旨在把区域内已经比较成熟的 FTA 整合起来，包括 10+1、10+3 等，这就使合作变得比较方便。第三，21P 是高度包容性的，同时，它也建立在整个亚洲的工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之上。第四，21P 允许参与国有一段逐步过渡的适应期，而不是像 TPP 那样要求参与国在加入之初就 100% 得达到标准。21P 之所以有这样逐步过渡的安排，就是考虑到有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它们需要一个过程来慢慢适应 21P 的自贸安排。最后，21P 是公开透明的，不会对外保密谈判的内容，也不对 TPP 保密。反过来，TPP 是对外保密的，其他国家是不知道它的谈判内容和进度的。

记者：此次中国上海自贸区也在探索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经验，比如负面清单、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您认为中国是否会加入 TPP 或者其他类似的多边贸易合作谈判？

唐国强：中国会进一步与各有关国家开展自贸区方面的谈判，不仅是在本地区内，将来也会拓展到其他地区，比如中国提出要与欧盟签订自贸协定，也正在与美国进行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我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方面的谈判一定会继续推进，而且会有更多成果。但就目前的情况看，TPP 的门槛确实有点高，中国要想马上加入 TPP 是有一定困难的。另一方面，TPP 的现有成员国，尤其是美国是否同意中国加入其中，这也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事。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先做好自己的事，落实好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措施。中国人有句话叫“水到渠成”，到时候不管中国是否最终会加入 TPP，我们都已经达到了贸易自由化的标准，不管做怎样的决定都显得很自然。

记者：2001 年亚太经合组织在上海举行峰会时，中国将经济合作方面的主题定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今年的 APEC 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作为东道主，您认为中国是否会有新的关注点？

唐国强：APEC 在 2006 年提出了 FTAP (Free Trade Asia Pacific) 的构想，在 2010 年时它的目标变得更加具体了，即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全面、高质量的自贸协定，包括现有的 10+3、10+6、TPP 以及拉美的太平洋联盟等贸易安排，今后都可以成为 FTAP 的组成部分。今年正好中国是 APEC 的东道主，我们希望把 FTAP 从一种愿景带向现实。因此今年 APEC 的议题就是地区经济一体化，具体来说就是先要对 FTAP 的原则和路线图进行可行性研究。原则既包括 FTAP 的最终目标，以及它和其他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贸易安排之间的关系，比如 FTAP 和 WTO 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分哪些阶段逐步实现 FTAP 的目标，这就涉及到路线图的问题。

中国应该为所有青年提供免费或者 低成本中学教育

记者：刘书文



杨李唯君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暨亚洲研究所教授，亚洲研究所“变化的家庭”研究项目负责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主要包括美国和亚洲的家庭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目前，她正致力于研究亚洲变化的家庭、内部迁移对中国儿童的影响、亚洲人力资本及代际转移问题。

「 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中国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中国最好可以尽早推行素质教育，尽可能早的展开培训，不仅要专注学术训练还要更好地整合学校和劳动市场。 」

记者：您在 2014 上海论坛期间提到，失业和青年不充分就业是当前亚洲存在的主要问题。那您是怎样定义青年和成年的？总体来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问题？

杨李唯君：“成年”的定义往往是很随意的。很多国家把满 18 岁用作“成年”的法律定义，但是考虑到多数人 18 岁还在学校读书，很多情况下这一定义并不确切。我们通常把经济独立、心智成熟的人定义为“成年人”。很明显，你可以按照年龄或者其他特征来定义“成年”。关于“成年”并没有完美的定义，但是文献中对成年过渡期的概念基本达成一致：15 岁-24 岁/29 岁。

我们的文章主要探讨三个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他们的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和人口机构不同，但是青年的失业率都非常高，这对人力资本发展造成非常大的损害。一般情况下，高失业率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青年人缺乏足够的技能和人力成本。教育程度低是另一个原因，教育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另一个突出的因素就是经济危机。在经济衰退期，受到危害最大的就是青年人。他们往往成为最后一批被录用，第一批被解雇的员工。由于技能不足、经验缺乏，工资水平较低，他们最有可能被裁员。此外，各式各样的体制和就业政策也使得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东南亚的失业率最高，这主要是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高失业率造成的。我最关心的是青年如何顺利地地完成从学校到劳动市场的过渡。

记者：中国的情况怎样呢？

杨李唯君：中国的失业主要受两个教育层次的人群影响：一类是没有接受足够教育的人群，另一类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中入学率非常低：只有大约一半的青年可以接受高中教育。所以有很大一批低技能的青年人无法实现就业。这些青年人大多来自农村地区，也有一些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很多人来到这里却没有正式的工作合同，很多人从事低工资、低技能的工作，甚至失业。还有一些人虽然在工作，但是只是临时工作，工资非常低。他们的技能也没有得到更充分利用。因此，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失业率，不充分就业也是一个大问题。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是中国高失业率的另一类人。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招生规模从 100 万增长到 720 万。毕业生供大于求导致了失业问题。还有很多学生因为学校所学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失业。我们发现好多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他们满怀期望和抱负，但是来到就业市场却发现没有同期望匹配的工作。所以中国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低收入、低技能，另一方面就是高学历。

此外，中国女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男青年。然而，她们的职业地位和工资还是比男青年要低。这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性别平等问题在中国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要使青年人群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得到充分利用，其他机构和体制必须做出调整。针对青年夫妇的财政激励和高质量的儿童托管应该得到保证。

记者：我们可以先讨论第二类人群（那些接受高等教育却没有工作的青年）吗？您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太多吗？这是当前高失业率的部分原因吗？

杨李唯君：其实，参照国际标准的话，中国的大学入学率仍然非常低。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只有约 25%，比韩国（80%-90%），日本（60%），以及美国（80%-90%）要低得多。韩国的大学入学率现在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所以韩国大学毕业生也存在供过于求的问题。这也是韩国正在试图关闭部分学术性大学，建立更多职业学校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职业培训，而不是学术培训。事实上，自 1999 年以来，中国的职业院校和学术院校在同步增加。不论发展学术院校还是职业院校，对中国来说都十分重要。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大学学费现在十分昂贵。高昂的学费把很多低收入人群拒之门外（尤其是农村地区），这也拉大了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的生活机会差距。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大学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杨李唯君：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学生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学生缺乏指导（导师）。课程不仅应该包含知识型部分，还应该包含应用型部分。学生在学校所学应该同市场需求相符合。教育工作者应该花一点时间重新思考一下：在考虑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怎样为学生设置最合适的课程。

导师制是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大学生经常会陷入迷茫，他们搞不清楚应该学习哪些课程，应该进入哪些行业。大学里的导师可以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种导师体系应该在中学教育中应用，导师更多的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而不是决定学生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标准决定哪些人可以接受教育，这是社会本身固有的。但是这些标准如何设定却十分重要。标准不一定完全是学术的，也不一定完全是考试形式，所以导师必须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给予学生指导。

此外，教育体系应该保持灵活性。中国文理科之间的转换实在太困难，

间隔年⁴在中国也不是很常见。培养体系也应该同教育、培训和就业更好的结合起来。这里又出现问题：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课外培训资源。因此，政府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更多的资源，不仅要发展他们的学术技能还要提高他们的非学术技能（职业技能）。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要想取得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认真反思教育体系是绝对有必要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我们可以事先明确市场需求，然后根据市场需求培养青年人在这些需求领域工作？

杨李唯君：我认为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你所拥有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类型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你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反之亦然。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方式去培养人才，我只是想强调根据拥有的人力资源选择经济形式也是行得通的。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花一些时间做好两者之间的平衡。

记者：那些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会怎样？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杨李唯君：这实际上是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高中招生瓶颈问题。中国需要更多的人接受高中教育。如果有近一半青年人口没有高中教育背景，那么任何的行业和经济都无法向更高层次发展。然后需要消除教育技能水平不足带来的阻碍，重新调整课程，让课程可以更好的同经济发展需要相协调。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学位，所以即使在初中和高中阶段也可以为学生设立职业轨道。职业学校比学术性学校差的观点也应该改变。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德国，他们有一个双轨教育体系，学生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大量做学徒的机会。因此，德国的青年失业率非常低。这是一种值得思考的模式。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职业教育学费太贵，有时甚至比中学教育都要贵。所以，很多低收入人群负担不起，或者不

⁴ 间隔年（gap year），在发达国家非常流行，一般是指用一段较长的时间（通常是一年）去旅行或是从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最常见的间隔年包括高中毕业与升大学之间，大学毕业与工作之间，或者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很多西方人和朋友都有过“间隔年”的经历，学校和家长也常常对此持鼓励态度。

愿意为了获得技能投资教育。

记者：很多中国人（学生，家长，甚至老师）认为，中国当前的教育对未来职业生涯并没有多大帮助，并且建议我们不应该把这么多的精力放在学校教育上。对这种观点，您是怎样看待的？

杨李唯君：据我了解，中国很多学校都存在填鸭式教学，并且一些技能水平要求都非常高，比如数学学习就非常难。尽管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需要改善，但是学校教育仍然在青年教育中占据很大比例。很多的基本技能都需要通过学校教育习得，比如数学、英语、写作、社会运作了解、人文科学训练。可能这些技能的作用不会即刻显现，但是我认为这些基础技能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教育涉及多方面因素，学校不可能教会你一切。但是，青年在学校所学会同以后的职业生涯息息相关。有些人认为，在工作中也能够学到一切。然而，你要不断学习，重复学习，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学校还能够帮助青年完成从学习到工作的转变。当然，这肯定有改进的余地，但是你在学校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学到怎样学习，而学习能力对于任何人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如果想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成功，缺少了高中教育几乎是无法实现的：日本、韩国、台湾处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学入学率几乎达到 100%。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高中入学问题变成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有超过一半的青少年负担不起或者不愿意参加高中教育。高中课程应该更好地同市场需求相结合。台湾和新加坡的课程更加关注个性发展。相对来说，他们更重视体育，艺术，音乐和思想品德教育。整个社会对人文学科十分关注。

实际上，很多概念都不是这些文化中固有的。一些国家认识到只关注青年学业学习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后，新加坡等国吸取他们的教训并且向他们学习。政府根据新理念有意识地改变了政策，比如建立艺术院校，把更多的资源应用于职业培训，展开不同方面的技能培训。一定程度的政策干预和协调是绝对有必要的。否则，变化将会非常缓慢并且可能会作用不大。教育体系必须十分强大，这需要时间来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必须发生的。

记者：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造成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因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杨李唯君：我认为户籍制度需要尽快改革，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影响了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利用效率。这种制度也影响了人们的创新，不能让人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更糟糕的是，户籍制度抹杀了农村青年的抱负，让农村青年看不到接受高中教育的意义。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青年即使接受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他们还是不能找到工作或者实习机会。学校应该尽量使学生和就业网络联系起来，给学生更多的机会。

户口的登记功能还是有益处的，很多国家都有户籍登记制度。然而，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其公民拥有的不同机遇和公共福利。国家不能歧视来自农村的本国公民。希望户籍制度可以最终取消。接受大学教育不一定能够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保证农村青年成功过渡到成年，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户籍制度障碍的破除是当务之急，废除户籍制度也能够减少国家的不平等。

记者：对于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和不充足就业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杨李唯君：让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低成本的中学教育——不论是学术的还是职业的。眼下，中学教育成本高昂。事实上，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按照中学教育费用在中国人均收入中所占比重，中国的中学教育是最昂贵的。中学教育的高昂学费和机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使得他们最终选择放弃接受中学教育。如果青年接受中学教育的比例低于 50%，中国很难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必须确保所有青年都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培训。当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已经远远不够。韩国、日本、台湾等地处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时，他们的义务教育已经达到了 12 年。高中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的三年教育。高中教育对那些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接受职业培训的青年也意义重大。职业高中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学术性高中发展的重要性，必须引起重视。

对大学来说，主要做好与市场需求的整合和匹配。相关研究清楚地表明，

如果你早期有失业经历，那你的职业生涯轨迹会更加分散，你可能会更加容易遭遇失业，并且工资往往会低得多。早期的失业经历对行为也会有负面影响。那些有工作的青年，出现行为问题的概率也要小很多。

总体而言，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中国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中国最好可以尽早推行素质教育，尽可能早的展开培训，不仅要专注学术训练还要更好地整合学校和劳动市场。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为所有青年提供免费的或者低成本的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来说，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匹配学生所学和劳动力市场所需上，为来自农村的弱势人口群体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中国政府应该放权，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谢光钰



吴明泽

台湾大学经济学博士、国科会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金融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当前主要研究中国大陆金融问题。

「来自台湾的经验强调，政府放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所有经济改革的落脚点，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促发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带动资本类的生产率的改善，实现结构转型。」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近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亚洲绝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度逐步超过日本，有外媒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全面提升的明证，您怎么看待这份报告？

吴明泽：我同意这份评价。从引力理论来看，中国大陆作为如此大的经济体，必然会吸引周边经济体的趋靠。现在中国大陆取代日本扮演了经济“磁铁”的角色是很正常的，毕竟中国大陆维持了大规模的 30 年经济高增长，进出口贸易依赖中国大陆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是没有异议的，关键是如何去维系这样的增长，我一直强调不要只看数字，要关注民众从 GDP 增长中得到的福利。

记者：中国经济这几年在滑落，2014 年第一季度到了 7.4%，您怎么看这

种增长速度的下滑？

吴明泽：我不觉得这个数字有什么问题，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没有国家能够维持那么久的高速增长。台湾在延续了 20 年高速增长之后也就滑落了。真正要考量的问题是高速增长之后的代价是什么。台湾 90 年代面临的问题是污染严重、城乡发展不均，现在大陆也有这些问题。

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是一个数字，不代表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要关注的是民众有没有从 GDP 增长中获利。经济发展应该追求“最适”，但“最适”不是“最大”，不能只追求单一的经济指标，否则就会忽视其他的发展。

记者：那您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是周期因素为主还是结构因素为主？

吴明泽：2008 年经济危机导致的下滑是周期因素，但是在政府 4 万亿的刺激投入后，导致了一系列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危机，故 2008 年之后的下滑是结构因素为主。当时的 4 万亿刺激都用在国有企业投资上，所以产能过剩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这点也可以看出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导致低效率的问题。

记者：就您提到的国有企业问题，去年针对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也有关于“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争论，您的看法呢？

吴明泽：就统计数据来看是国退民进，但我做了一定研究后发现是国进民退。从产业关联表的角度看，产业关联系数高代表该产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大。在抓大放小过程中，放掉的小产业大多是产业关联性很小的产业，抓的大部分产业都是关键性产业，所以抓大放小之后的一大问题是国企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综合来看是国进民退的。

记者：过去地方政府同质化的投资和恶性竞争导致基础性产业产能过剩、整体结构失衡的问题，在“土地财政”推动下愈发棘手，您怎么看？

吴明泽：这就是政府主导的高投资低效率的结果。地方政府提高 GDP 最快的办法就是投资基础设施，虽然看起来让 GDP 很高，但是之后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地方出现债务危机，然后继续借贷继续开发，陷入恶性循环，一边债务增加，一边产能过剩更严重。

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主导，但是没有产业一体化就没有办法发挥产业经济的规模。

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调整不能由政府来做。例如台湾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只是提供平台，建立技术法人辅助企业科研开发。中国大陆的企业是有独立研发能力的，政府不能主导研发方向。另一个重点是技术标准，统一规格能提高效率、带来规模经济。中国大陆有 13 亿多的规模庞大的市场，是有能力制定技术标准的，这样才能成为未来国际经济的主导者。

记者：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可谓是今天讨论下来所有学者的共识，有学者特别提到结构失衡背后严重的是收入失衡，您如何看？

吴明泽：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是失衡的。中国大陆产品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是要素的市场化还很低。户籍制度在整体社会管理层面来看有其必要性，但必须要尽最大力量减少户籍制度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比如工资待遇差异、福利待遇差异等。

大陆的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导致了资源投入和需求不匹配。此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让市场来解决，政府不要对城市与乡村的规划进行太多行政干预，政府要放权，肯定会有阵痛期，但是要有信心。

记者：您提到人口要素，现在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有争论，有些评论认为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而也有认为劳动力“总体过剩、局部短缺”，您认为呢？

吴明泽：我认为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不重要，毕竟不可能一直依靠低技能的劳动力，大陆蓝领工人的贡献是被低估的，随着农村福利的提高，东部自然就“劳工荒”了，而同时产业结构没能调整。所以我觉得就算人口红利结束也不是坏事情，重要的是产业得到升级转型。

记者：5月10日《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关于影子银行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存在危机，但如果监管到位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您如何评价呢？

吴明泽：影子银行是一种金融创新，它是在金融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一种资金借贷方式。只要合理监管，不会出太大问题。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风险都集中在银行，容易产生风险过度的问题。

台湾很早就放开了利率管制。台湾债券市场风险不大；股票市场大部分是散户或基金、机构进行投资，这分摊了银行的风险。大陆若要谋求改善，需要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并规范银行间交易市场，不能把很多的“篮子”放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可以利用互联网做交易，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证券市场中资产证券化也可使间接金融比重降低。

记者：2014年强调“政府放权、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上海自贸区可谓是中国经济的试验田，您如何评价这个尝试？

吴明泽：政策的方向是很好的，但是具体运行起来似乎在走回头路。例如股票发行的IPU制度（从审批制过渡到注册制），最近有紧缩的现象，今年大陆要完成注册制还是比较难。上海自贸区是个很好的尝试，目前为止发展不错，也希望不会走回头路。

记者：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是“亚洲转型：寻找新动力”，您认为新动力根本而言是什么？

吴明泽：最主要的还是人力资本的改善，即劳动力生产率、劳动力附加值的提高。人口红利的解决方式已经过时，现阶段应关注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问题上，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如何提升资本的效率才是问题。而这需要去除垄断，在工资、劳动力、土地使用成本、利率、融资成本上，让民企与国企平等竞争，才能使资本配置更加合理。总之，根本还是在于政府放权，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与狼共舞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记者：相惠莲、吕笑月、王玮亮



谢湧海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第12届上海市政协委，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一批大的投行，把对冲基金培养起来。与狼共舞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必须做好一旦开放外资就会进来的准备。」

记者：目前上海自贸区是人们关注的大热门，出台了许多新制度、新政策，但在税收优惠上没有给予很大的力度。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谢湧海：税务上没有给优惠政策实际上是国家自信的一种表现。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到经济特区投资的外商可享受“两免三减半”，即头两年免税，后三年交一半。这种优惠条件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中国加入WTO。刚去掉以后，外资税率明显低于中资，直到七年前，终于一刀切了。中国经济到了一定规模，觉得外资自己会来，不需要靠便宜的税收来吸引外资，所以自贸区不再有这种优惠。

记者：那么您觉得外商看中自贸区的是什么，自贸区吸引外商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谢湧海：外资看中的就是自贸区开放的政策，什么都可以投资，到大陆的其他地区就不行。另外一个就是很便利，而且少了很多灰色的东西。过去开办公司需要一层层去搞定，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托关系、吃饭、送礼，对于整个政府的运作也有好处。以后也有一个针对政府负面清单，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厘清其权力。因此，负面清单不只是针对投资，行政方面也会有。

记者：除自贸区之外，目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前海开发区。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谢湧海：前海跟自贸区不一样，它是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实验示范区。这两个定位不一样。前海有很多金融试验，上海自贸区有一些金融只是在结算、投资等方面，不是说全面的开放和试验，没有这个责任。杨雄市长讲得很清楚，自贸区的金融试验仅限于服务实体经济、贸易等相关的政策，不是纯粹的金融试验，因为它以后要克隆到全国去。但前海可以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因为它是一片空地，成功当然好，不成功也没有损失。上海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如果金融上出了问题那就是个大麻烦，金融风险是很大的。必须有顶层设计，有预案，有次序地来做这件事。

记者：金融风险在我国目前的对外开放进程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湧海：第一，完全没有准备好就开放。日本在开放的过程中就没有完全准备好，商业银行内部的整个市场运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就开放了资本市场。中国不能盲进，要开放，但什么时候开放，不要随意地设一个时间表，要一步步来做。资本市场开放，要看国内的经济结构是否已经调整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目前就不那么健康，房地产和股市都很容易被炒作。

第二，监管不到位，投资银行没有准备好。中国商业银行有 150 万亿资产，证券公司只有 1.5 万亿，是大银行、小券商、小投行。银行每年放贷占融资的 90% 的贷款，很少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这也是我们呼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稀释银行贷款、增加直接融资的原因。直接融资使利率有标的，又可以进行利率市场化，进行市场经济的整体市场运作。这套机制如果没有

建立起来，开放以后经济会受到冲击，这些问题会成为外来热钱冲击的对象。我们证券公司太小，能力不如人，美国大投行炒股票、债券、衍生产品、金融市场、房地产，它有很多对冲基金，且有能力炒汇率，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与此相关。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一批大的投行，把对冲基金培养起来。与狼共舞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不能老老实实在地一个个被一行三会管得像小绵羊，必须做好一旦开放外资就会进来的准备。

第三，金融贷款中涉及到的一些房地产的贷款和一些银行资产的价格非常重要。房地产也好，房地产相关产品也好，包括目前炼钢、水泥等供大于求的行业都需要整顿，到位了才能对外开放。

记者：您提到要建立大投行，哪些因素阻碍着这个目标的实现？

谢湧海：这与分业经营有关。美国在大萧条之后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进行分业管理，因为此前的混业运作造成了金融危机。但是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发现分业又不行了，到了克林顿时代就否定了当时的法案，认为可以成立金融控股，下设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用混业方式来运作。

企业需要贷款、上市、发债，在混业的情况下，一家银行可以给他们提供综合服务。对于客户也是如此，他们原来有钱就存银行，只知道拿利息，但现在会有购买股票、债券、保险、基金的需求。

我们现在处于分业阶段，当然分业很安全，但是不便于做大，证券公司做来做去这么点。从 1990 年内地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到现在，银行资产翻了数翻，但是证券公司做不到，因为这两个目前还是完全分开的状态。如果银行也可以办证券公司，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银行的客盘大。有人说，证监会又担心银行下面办证券公司，那不是把证券公司的业务都抢过去了吗？我认为应该说是增加了被监管的对象，银行办证券公司依然是归证监会管，这样就有机会做大了。应该让金融机构之间能够互相控股，这样的话便于做大，否则资本金都不够。

150 万亿的银行资产、8 万亿的保险公司资产、15000 亿的证券公司资产，这样一个架构根本不行，一定要平衡发展。另外还要把评级公司做起来，同时要让人民币在国际上要有更多的结算功能、投资功能，家里的事情都跟着

做好，这样才可以开放金融。

记者：再来谈谈顶层设计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监管机构？

谢湧海：金融是很复杂的，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没有顶层设计的金融改革是很危险的。比如说互联网金融出世之后谁来监管？老百姓只看重利率，不在意实际产品是什么。背后的逻辑是，如果是保险产品，那么归保监会管；如果是基金产品、信托产品，就归证监会管；如果是一个集约式的存款，那么归银监会管；利率则归中央人民银行管。

到底谁来管？必须有一个超级的金融监管机构。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是一刀切的划分方式，在国际上已经落伍了。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的出现，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在没有超级监管的情况下，影子银行已经在进行运作，商业银行也在混业运作，只不过在绕来绕去地做这些事情。

时机已经成熟，超级监管呼之欲出。可以进行分业监管，但是必须有一个超级的监管机构，下面可以分头去管，属于一个体系之后，协调起来就会很容易。分为几个机构，它们互相之间还存在矛盾，这就比较麻烦。

中国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

记者：徐倩宇、程彤辉、施晓蕾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目前主要从事有关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政策、人口与就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社会保障、员工福利和工程咨询等方面的政策研究。

「我们喊出的“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口号是虚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着适合的聚集度、适宜老百姓居住的城市环境。」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怎样的城镇化布局？如果单靠以工业聚集带动城镇化的模式难以为继的话，您认为城镇化有何出路？

杨宜勇：中国城镇化的布局实际上应该是市场、老百姓、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以个人意志或者政府意志为标准。如果现在政府有一个城镇化的政策，那我们应该关注市场的主体和老百姓怎么反应，最后综合所有才能制定出下一步的政策。我希望最终能够呈现一种更加公平、人和人的权利平等的城镇化。我们可以利用产业化来带动整个城市的城镇化，给予第三产业、服务业更多的重视。

记者：上海新型城镇化规划主张必须打破城镇化发展以工业为主的传统思路，您如何看待上海采取的这种思路？您认为现阶段在中国，还有哪

些地区可以仿效上海这种新思路来促进城镇化？

杨宜勇：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肌肉经济”的带动，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苦力活。但我们的经济正在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赚钱的方法就需要改变——提高自己的技术，加快转型。

中国的发达地区可以效仿这种思路。上海通过服务贸易向内地或周边国家辐射，靠知识和大脑赚钱，这和美国所谓的“智慧经济”相类似。美国的经济是通过想法、概念、技术和创新来不断向前发展，这种智慧经济在很多方面都占有领先地位，所以我們也需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

记者：论坛提到城镇化就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底特律经历了经济资源的消亡带来的城镇化滞缓，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城市是这样的，您认为这是城镇化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吗？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杨宜勇：我认为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就是一种“产城融合”，即产业的布局 and 城市的布局互相融合。一个城市的发展没有产业来推动是不行的，过去传统的模式就是运用第二产业。现在第二产业有一点乏力了，就需要加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产业就像是新型城镇化的皮，人口就是毛，这就像我们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城市必须要有吸引人口的产业，给人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水平，才能够吸引人口的聚集来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底特律是老城区出了问题。老城区在城镇化后期地价攀升，工人罢工，治安混乱，因此升级后的产业大多搬到老城区以外的地区发展。底特律的故事值得我们国家大多数的老城区借鉴，比如东北的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国目前确定的大概有 69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城市目前面临升级转型问题。随着资源的消耗，城镇化减缓是符合规律的，我们可以寻找其他资源和产业来替代原先的资源并且发展第三产业。我们需要未雨绸缪的意识，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存在着考虑不长远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消耗资源的同时就想到后续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

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和“半城市化”现象？这句话的实现需要满足什么具体要求？

杨宜勇：半城市化的问题主要针对农民工和外地人。中国的城镇化需要劳动力，不要“人”。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福利水平和工资水平不同，有些无形的权利是外地人和农民工所享受不到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主要实现的是经济权利，而文化、社会权利相对缺乏，而政治权利在他们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假设城市里面的外地人口占 40% 的话，那么这些人口对应的人大代表的数量也应该占到 40%，但是实际上城市里面代表这些人口的人大代表只有几个人，所以公共政策、公共福利实际上是向本地人倾斜的，就是这儿出了问题。

解决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人大代表的构成要反映城市里面常住人口的形态构成，所有在城市中的常住人口在正常情况下都应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只有自己代表自己是最可靠的。城镇化的核心是：在城市里面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人的权利分四种：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它们应该是一体的。经济建设是要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的经济权利，这不仅仅是要增加财富和福利，更要通过经济权利的实现来保障其他几个权利的到位。

记者：我国城镇化面临一些重要矛盾，您认为哪些矛盾是最需要解决的？

杨宜勇：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最需要解决。比如北京的雾霾治理需要城市中的每个人努力，需要大家少开车、少用车。只有每个人都把这种环保意识和城市建设的意识装在心里，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并非那么简单，里面可能会有各种冲突，比如有车的人和没有车的人、有一辆车的家庭和有两辆车的家庭等等，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各不相同。

记者：您认为“千城一面”的问题应该如何避免或改善？

杨宜勇：所谓“千城一面”其实就是城镇化的过程太快、太廉价。城市设计的图纸都一样，基本不用重新设计。如果想要千城不一样，就需要放缓

建设的速度，慢一点，在设计上多用心。但是让已经建成的城市在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已经不太可能，只能从小的地方做一些改变，尽量变得个性化一些。

记者：财政部称将利用 PPP 模式募集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您怎么看待？您认为资金的来源主要应该来自哪里？

杨宜勇：公私合营是一种新的筹资模式。过去城镇化大多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补贴，而这种公私合营模式改变了原先的状况，可以让企业来出资拿钱，让企业来建设和运营。老百姓有钱，就可以借助老百姓的钱，透过融资来解决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

杨宜勇：我认为还是市场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过去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政府。上面也提到了 PPP 模式，所以现今发展的趋势应是不再单单指望政府的作用，而是通过金融市场杠杆来调节，市场的作用需要放大。过去用政府一家的钱，现在可以增加资金的来源，把城镇化搞活。

记者：今天在讲座中提到了“城市系统”，您认为城市间、城市地区间合理联系的程度与物质、能源、人口、信息流动的程度应该如何控制？

杨宜勇：我拿北京来做例子，过去一个城市都想要大而全，但是现在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就不一定非要追求成为经济中心。北京的企业可以向其他城市迁移，把特大城市的功能疏解一下，避免城市负担过重，也能够避免旁边的城市发展过缓，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之间良好和谐、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们需要提倡一个舒适城市的概念。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我们喊出的“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口号是虚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着适合的聚集度、适宜老百姓居住的城市环境。人是第一位的，每个城市能够容纳多少人需要一个指标。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

记者：王震宇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系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城镇本身的定义就是人口和经济聚集的地方，而城镇化就是两者聚集的过程。新一轮城镇化的核心就是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相匹配。」

记者：您认为中国过去城镇化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又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

张车伟：过去的城镇化主要暴露了三个问题：

第一是以工业聚集带动城镇化的模式难以为继。以前城镇往往以工业企业而兴，因工业园区设置而扩张，但是，这种模式的代价日益沉重，工业带动的动力也逐渐丧失。

第二是“人”的城镇化不完全，存在“半城镇化”的问题。外来人口不能共享基本的公共服务，不同群体之间公共产品的配置不均，而城镇规划对生态和居住功能不够重视，这类问题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违背了经济发展和推动城镇化的初衷。

第三是依赖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引发了众多问题。以往基础设施的修

建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分配和出让土地，而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造成产业发展扭曲，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矛盾激化，寻租频发。新一轮的城镇化不能继续走这种城镇扩张的老路子。

过去的城镇化也有两个值得汲取的经验。首先，中国的城镇化模式是产业化的经济活动聚集带动人口聚集。即通过经济活动的产业化和组织化，形成规模经济属性，而使人口聚集与产业聚集相符。这是今后应当遵循的城镇化规律。其次，中国采取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的城市扩张模式。这既为城镇奠定了发挥生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基础，又为进入城镇的人口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是值得肯定的做法。

记者：您认为新一轮城镇化的核心是什么？

张车伟：新一轮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相匹配。不相匹配就是不完整的发生不相匹配的情况，如人口聚集了，但经济未聚集，那么就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口，而这一类不相匹配而引发的问题是很难靠后天解决的。

记者：国际上有许多传统的工业城市正面临着城市转型的难题，您认为这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借鉴？

张车伟：国际上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底特律的破产。作为美国传统的工业中心，底特律的问题在于，兴盛的时候没有想到没落的时候，没有想到一个城市的经济产业过于单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当它失去汽车制造业优势，同时却没有其他产业提供转型的可能，那么衰落就是必然的。升级转型是任何城市都会面临的问题，单一产业是不可持续的，这都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升级转型。这项进程如果跟不上，就会被淘汰。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工业型的城市，过于依赖制造业，而在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优势就要失去时，今后怎么发展，向哪个方向转移？未雨绸缪是不行的。

记者：您认为我们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在哪里？

张车伟：我认为，这种转型还是应该由市场来主导，不能由政府来主导。因为政府不知道转型的方向在哪儿。直接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企业，它们对经济的变化最敏感，它们知道哪个方向更赚钱。实际上，转型就是往更赚钱的方向转变。制造业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优势不再，没办法赚钱了，竞争力下降了。而所有这些，市场的主体最清楚，企业就是市场的主体。

政府需要给予鼓励，为企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扶植。比如有些盈利前景非常好的新型产业，初期需要大量的投资，但企业在资金上却比较困难。这时候政府就应该在政策上给予企业支持，让这些企业能够承担起转型的责任。

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不能过度干预，这在中国尤其需要注意。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政府做的还是太多。另外，有的国家过度的市场化也有问题，我不赞成，但是过多的政府干预肯定是不对的。

记者：您认为一二三线城市应该怎样协调以实现共同发展？

张车伟：一线城市的人口和经济高度聚集，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向高端化聚集的阶段。其重点产业就是生产的服务业、高端的服务业和创新型产业。这三个名词，就是指科研、保险、金融、产业研发等创新类产业。一线城市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因为它们工业上的比较优势已不存在了。他们现在的优势在于为生产提供创新性的服务，如科研、IT、产品设计的支持。一旦这类城市有了明确的产业定位，政府就应该鼓励相应的人才聚集于这类城市。

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尤其是三四线的城市，显然仍是人口聚集、经济聚集不足，需要找到相应的经济活动来带动人口的聚集。整体来看，中西部地区经济聚集不够，而东部地区则属于经济高度聚集，但人口聚集不够。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地区流动到东部。虽然我们的城镇化率已经很高，但从匹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还是人口的聚集度不够的问题。因此现在中西部具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但经济聚集不够，就需要通过推动产业转移等方式来带动。他们的重点产业仍然是工业和制造业。因此，所谓中国已经完成工业化，不需要发展工业的看法，我觉得是错误的。

记者：您的论文曾经提到，中国是否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扰将主要取决于城镇化速度和劳动力素质改善的步伐，您认为根据现有的条件，我国最多能承受多快的城镇化进程？

张车伟：我认为可以维持现有的城镇化速度。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每年的城镇化速率都超过 1 个百分点，这个速度可以和日本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速度相提并论。虽然从总人口的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了。但中国的人口总量还是很大，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大量农村剩余人口逐渐进入城市。所以，我对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不是担心。只要政府的政策合适，舍得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让劳动力接受良好教育，掌握好的技能，那么我们的城镇化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进入城镇的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不能满足城镇发展的需要，那么这些劳动力的进入就不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城市化的一个动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动力，城镇化也不可能健康地发展。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只要我们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转型，中国未来保持一个快速的城镇化增长应该没有问题，而且这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所在。

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

记者：段伊戈



中兼和津次

日本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是较早开始关注新中国经济问题的海外学者，研究跨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在中国的工农关系、中国模式问题、中日经济关系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

「撇开国情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吸收和吸取发达国家过往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对中国当今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记者：在讨论日本经验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模式论”。现在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争论好像销声匿迹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中兼和津次：我认为，“中国模式论”已经过时了。近些年来，中国模式已经被中等收入陷阱取代，不久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又提出“转型陷阱”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曾写了一本批评“中国模式论”的书，他认为中国模式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而且在不同的时代是变化的。

我认为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仅有两点：一个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政府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另一个是渐进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再讨论“中国模式”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我说“中国模式论”已经过时了。

记者：您提到的这些问题中，有些日本也曾经历过。近年来（尤其是去年冬天）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环境污染了。中国曾提出“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但现我们好像也没走出一条新路。您认为，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是必然的吗？

中兼和津次：很多年前，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曾就环保责任发生过冲突。发展中国家说你们都已经污染了，我们也有权利污染。照这个逻辑，“先污染、后治理”是可以被认作是必然的。但我认为“先污染，后治理”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更多地是一个借口。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又治理污染又发展经济是可能的。所谓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虽然这种曲线肯定存在，但是很多研究表明，它的弧度是可以通过可操作的手段压下来的。我们虽然不能做到完全不污染，但可以尽量减少污染的损失。

记者：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我们好像实际上没有成功吧？

中兼和津次：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钱引进技术、治理环境，大家在还没达到那么富裕的时候，对经济发展更加关心。不过我们要乐观，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中国也许到了顶点，马上面临下降的阶段。

日本当时也如此，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日本把它称为公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日本的解决方式，我认为第一个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方面现在中国与日本非常相似。比如化工厂的建造，在中国已经有地方上的环保人士反对。第二，媒体的报道是非常有效的，通过曝光可以促使国家和政府采取新的办法推动污染的治理，包括推动产业升级。所以，我觉得中国借鉴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记者：您觉得环境污染问题，以前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哪个更严重？

中兼和津次：我是 1964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感觉当时在东京的空气污染没有北京上海现在这么严重。

记者：您觉得政府推动产业升级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中兼和津次：产业升级有两种，一个是市场引致的。比方说，人们的收入提高以前以吃粮食为主，收入提高了就要吃更多的肉，然后又要吃更高级的食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这是个非常自然的市场过程。另一个是政府政策的作用。政府倾向于刻意发展或引进某个产业。产业升级是以上两种因素的合成。

我担心的是，中国考核 GDP 的激励机制，可能反而会阻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地方政府之间会攀比 GDP，他们会拼命投资，投资“大”而“快”的产业，或者进行土地开发。就产业类型上说这会更偏向传统工业制造业，而不是现代服务业。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会导致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单一化。A 省做汽车、B 省也做汽车。一方面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汽车，另一方面农业、物流、公共服务什么的，反而全都没有人做了。

记者：下面我们讨论关于教育的问题。近日我国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未来高等教育将以职业教育为主。目前看来这有助于缓解目前的中国劳动力的结构性失衡，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技工荒。对此，您怎么看？

中兼和津次：其实我不是很认可将职业教育划入高等教育这种说法，我认为所谓职业教育应当既有中等教育，也有高等教育。在日本，学生们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进入那些工业高中、商业高中，他们开始的才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高中毕业以后进入大学或者研究院，主要做一些 R&D 开发、法律支持、经济管理的培养等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职业教育是应用性的，高等教育则主要是培养教养、发展更高级的知识。另一方面，除了学校，企业也有职业教育的力量。职业教育应当是面向企业、面向生产的，因此也可以让企业来担当。

再说高等教育。以前我们把大学叫“象牙塔”，意思是大学是一个独立王国，我们的目标不是与职业和产业的结合。但日本现在也不是这样了。大学的研究成果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大学的繁荣。

记者：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与未来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趋势是矛盾的，不利于实现产业高端化。您认为这样的担忧有必要吗？

中兼和津次：这个是可以避免的。虽然说职业教育应当以中等教育为主，但是中等教育培养技术型工人，高等教育也培养职业性的管理者，比如医学人才、金融人才。

记者：也就是说，未来将同时存在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中兼和津次：是的。

记者：最后，我们讨论一个农业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力度。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一个对农业进行高额补贴的国家，请问对于中国和日本，通过补贴发展农业是否是一个好的、可持续的选择？

中兼和津次：我个人的看法是暂时需要，长期进行这种政策，对农户的发展是不利的，就像长期地对小孩子一味保护是不好的。农业应该慢慢放开，逐渐走向市场。

记者：有人认为日本的补贴是为了保护国内的高价农产品，而中国的补贴是为了鼓励农民种粮，因为农民种田的收益不如打工高。一个是“富农”，一个是“贫农”，请问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

中兼和津次：这个差别应该是来自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制度。这种问题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刘易斯经济。上世纪 60 年代是日本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之前日本农村劳动力比较丰富，大量进入城市、工厂。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了，城乡差距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现在日本农民的收入——包括在打工收入、种田收入，统统加起来——是高于城市市民收入的。这种现象在日本叫做农民兼业化，农民不仅仅靠种田为生。在日本，专业的农户是很少的。另外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人口的人均资本提高了，人均收入也就增加了。同时，因为自动化机械的发展，很

多日本老年人也可以下田劳作。中国和日本都是精耕细作的农业，这一点也是中国可以学习的。

不要越俎代庖的城镇化

记者：薛姣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产权与合约、制度变迁、管制与管制改革。

「这届政府很重视城镇化，也很重视行政机制的改革，如果把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实现健康的城镇化，那么我们就对城镇化有信心。」

记者：从您的很多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对于中国城镇化的经济潜力还是很有信心的，您能否能对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的城镇化建设情况做一个点评？

周其仁：中国目前工业化指数很高，但是城镇化指数相对还比较低。所以，进一步城市化的潜力应该不小。但是潜力能不能挖得出来，要看“以行政等级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会不会改变，因为人口流动和资源集聚是难以用行政主导来完成的。人到哪里去最好，项目到哪里去最好，在哪里的集聚效应较强，这个过程跟我们现有的行政架构不一定匹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城镇化的品质就会很差，就会出现有的地方建完以后人气不足，有的地方则投资严重不足。这届政府重视城镇化，也重视行政机制的改革，如果把这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实现更健康的城镇化，那么我们就对城镇化有信心。

记者：在中国城镇化建设中，您对于成都经验表示了高度的认可，但是也表示出这种经验虽然适合大城市但是不适合中小城市，您对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有何建议或者意见？

周其仁：城市要降低行政力量对于城镇化建设的强力干预，要顺势而为，不要以为自己的城市够级别，就非要折腾成什么“中心”，那是做不到的。做不到别人那样，把环境搞好、能源搞好，把各式各样的小集聚搞得像样一些，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要以为招商引资可以把任何城市建成工商业中心，这个是脱离实际的。很多中小城市，没有大量人口流入也可以好好建设，把环境搞好，把农业服务搞好，建设宜居的环境，等等，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行政主导的问题就是步伐太整齐，别家修大马路我也要修大马路，别家建高楼我也要建高楼。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从实际出发，降低行政的不当干预，不要强拧着来。当年我们工业化过程中自上而下定了很多点，成功的不多，很多都消失了。城镇化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不要以为行政权力在手，无所不能。

记者：那么您觉得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

周其仁：政府首先应该把自己的权威放在保护老百姓基本权利上面，比如迁徙权、财产权、转让权、创业权等，这需要政府保护，没有强有力的保护，民间纠纷、合约纠纷就得不到及时的料理，各方合作的成本太高，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化，都没有可靠基础。但是城市到底建多大规模，怎么安排城市生活，有大量复杂的自发互动，像任何有机体的成长一样，不能用集中的权威下命令来做决定。不要把强制力和权威用错了地方，该用的地方不用，不该用的地方乱用。

我们需要政府做的是很多的，需要政府保证公民和企业的财产安全、合约自由，需要维持基本的经济秩序，特别是公平交易。但不能靠政府直接配置资源，那是市场的职能。政府应为市场的确立和运行提供制度基础，不是越俎代庖，替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直接解决人往哪里聚，产业往哪里集中，以什么形式应时而变等问题。

记者：中国的城镇化跟土地改革是分不开的，您之前也提到过“土地的问题和改革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不改革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城镇化。要把改革放到城镇化的核心，这样才能走出健康的城镇化道路”。是不是就意味着土地改革要先于城镇化建设？

周其仁：现在不少地方的“城镇化”，就是政府把农民的地一下子拿过来“造城”，这个不行。要逐年减少征地规模，允许农村的集体土地入市，由一个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来配置城市化中的土地资源。现在要去掉那些强来的因素，因为它不但损害农民权利，也会害了政府自身，似乎只要土地在手，要钱有钱，要项目有项目，想建多大的城市就可以建多大的城市。违背了经济规律，最终要受到惩罚。现在所谓不良地方债务，追下去与此有关。强征强拆导致官民紧张，对社会稳定没什么好处。政府要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维护一个公正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如果带头与民争利，不要说经济增长，还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翻船。

记者：十八大改革决定提出了农民集体的建设用地可以入市，但是现实推进中阻力很大，这种既得利益的阻挠可以冲破么？

周其仁：一个文件念一遍是不能够变成现实的，要改革就要有人去“拱”，把既得利益的网给拱开。也不要相信，既得利益强大到不可攻破。一定要看到，中国这么大，总会有地方这里拱一点，那里拱一点。以农村土地入市来看，很多地方其实早就入市了。另外，也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一律坚持“唯征地制”，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口子让农村集体土地入市。

所以首先，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对；第二，要有改革的勇气，要敢于试验；第三要讲技巧，不要一讲既得利益，就觉得问题是不可解决的。我们要看到哪些地方拱开了，积累了一些地方经验，然后去粗取精，逐渐完成全局性的变革。我们在做调查时就看到很多地方就把原来的体制拱开。成都、重庆、长沙、嘉兴、温州、上海郊区、深圳等地，到处有改革的尝试，有农地农房入市的地方经验。当年傻子瓜子、蛇口改革、外贸企业改革开始都是压力很

大困难重重的，但只要允许试，后来都解决了。

记者：最后，您能否谈谈农民市民化和进城以后的融合问题？

周其仁：过去老上海，苏北来的很多人住在一起，开始穷得不得了，产生了很多的棚户区，慢慢再融合进城市。融合这个事情，方向要对，但不能理想主义，以为可以一蹴而就。很多城市的融合是一到两代人的事情。

当前要把一些社会性的、制度性的歧视去掉。首先要让农民可以进城；第二就是来了以后要创造条件把他们在原地的一些社会福利，可携带过来，比如安徽农民的社保、医保，可以异地享受权利；第三就是建立全国性的保障体系，到哪里该有的社会保障一样可以得到。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要从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大的方向不能错，与现代化、市场化、民主法治的大方向一致。至于什么时候、达到什么程度，总要有点弹性。

至于农民与市民的融合，一定要有耐心，一下子做不到。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比如新加坡政府的组屋，就规定不同族裔的居民要按比例入住，这样孩子们成长起来以后，就相对容易融合，避免了族裔之间的紧张。首先不要人为设置障碍，把最严重的隔阂与体制障碍去除。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教育与社会政策的配合，趋向于文化融合。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65642354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